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台灣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Art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路線與國家認同
之比較觀察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Ideological Lines and
Nationalidentity among
Weng, Zesheng, Li, Yingzhang and Xie, Xue-Hong

洪世才

Shih-Tsai Hung

指導教授：李筱峰 教授

Advisor : Shian-Feng Lee, Prof.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June, 201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路線與國家認同
之比較觀察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Ideological Lin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Weng, Zesheng, Li, Yingzhang and Xie, Xue-Hong

本論文係 洪世才 君 (109937026) 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台灣文化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陳翠蓮

(口試委員會召集人)

張宗憲

李筱峰

(指導教授)

何義麟

(簽名)

所長：

論文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 日

謝辭

筆者寫這篇論文不是偶然的選擇，而是因李筱峰教授對台灣深深的愛和行動，在課堂上化為台灣歷史文化教案所感動，所以選擇了李應章、謝雪紅、翁澤生三個不同類型人物的觀察比較，以客觀和實際歷史案件，強化了台灣獨立選項的重要性。

在寫作的過程中，面臨素材的整合與呈現的問題，經李筱峰教授三言兩語的點撥，而有大幅度且正確方向的改變，才有了論文高分通過的基礎。

筆者還要感謝所長何義麟教授主動要幫忙看稿，並且教導了論文寫作技巧，不吝撥空指導的用心，真的非常感激。

不能不提的是方真真教授，她雖然沒有直接對這篇論文提供意見，但在筆者投稿「台灣近代戰爭」國際研討會的一篇論文，獲得她仔細地指導，不但讓筆者順利錄取，而且奠定了論文寫作的基礎。沒有那一篇研討會的論文寫作經驗和修正，這次的學位論文寫作，必定加倍困難，實在太感激了。

陳翠蓮教授是筆者還未到台灣文化研究所就讀以前，就對其學術成就非常敬佩的學者。所以，只要筆者知道有陳教授參與的研討會，不論路途多遠，筆者都設法克服參加。筆者這次論文中重要的香港會議問題點，以及台灣的問題觀點，受到陳教授的影響。雖然，陳教授不知道已經潛移默化了筆者，這次論文寫作的成功，還是要感謝陳教授。

台灣文化研究所在思想領域和條理分析能力給了筆者很多教導，這是筆者難得的學習經驗。沒有翁聖峰老師文學分析的教導、張炎憲教授的台灣史歷史見解和分析、李筱峰的台灣文化與台灣史、方真真的歷史寫作分析與教導等等改造了筆者，就不可能有這篇論文的誕生，真的非常感激。

今後，將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努力，不負所學。

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路線與國家認同 之比較觀察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是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三者的鬥爭人生與對抗，以及所反應出的文化背景因素與人格特質；探討的是他們的鬥爭路線與國家認同，並試圖找出台灣問題與前途的障礙和解決辦法。

由於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出身背景與教育的不同，思想路線有別，在日本殖民的統治下，雖然一樣舉起鬥爭反抗的大旗，但鬥爭方法與目標卻大不相同。

謝雪紅以台灣民族路線出發，奮鬥的目標，首要的是台灣的解放和獨立自治；翁澤生以愛鄉愛國的中華民族論為根底，以革命的熱忱，專心一意要實踐中華民族的復興；李應章則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殖民統治下的社會關懷，力求體制內的正義，但被迫走向革命之途。

謝雪紅、翁澤生、李應章三人，經歷日治時代與國共鬥爭，前期的抗爭主要是對外來政權鬥爭，後期有明顯的中華民族與台灣民族認同問題，因而導致的路線與奪權之爭。

三人的路線、認同問題與外來勢力的介入，導致的矛盾和衝突，其形態一直都是台灣前途發展的障礙。台灣人是否能突破這一台灣發展關隘，解決台灣社會的認同悲劇和找到台灣的出路，前人之鑑或許多少也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

關鍵詞：台灣文化、台灣共產黨、謝雪紅、翁澤生、李應章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Ideological Lines and Nationalidentity among
Weng, Zesheng, Li, Yingzhang and Xie, Xue-Ho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combat and struggle lives of Li, Yingzhang, Xie, Xue-hong and Weng, Zesheng in terms of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respective characters and traits. It mainly explores their power struggle lin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Moreover, the problems or obstacles Taiwan is facing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re also discussed.

Owing to different backgrounds on family, education and ideology, their goals 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power struggle are different even though they all stood up and organized or participated in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main objective of Xei, Xue –Hong is to seek autonomy and liberation of Taiwan which is based on Taiwan identity. However, Weng, Zesheng is devoted to the revival of China. He cares about his motherland and embraces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 . As for Li, Yingzhang , an intellectual of bourgeoisie, deeply cares about the social issues and has been dedicated to seeking justic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but is eventually forced to walk toward “revolution”.

They all go through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Nationalist-Communist Civil War. . They initially fight against the so-called “ Foreign Power”. But later,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identities- Taiwan identity or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 emerges, which leads to the struggle of the ideological lines and powers.

The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arise because of the distinct ideological lines, different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invention of foreign powers which have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Whether people in Taiwan can breakthrough the dilemma, settle the tragedy caused by different concept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pave a smooth path for the future of Taiwan seems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task. Finding a way for Taiwan is what we have to work on.

Key Words : : Taiwan culture , Taiwan Communist Party, Xie, Xue-Hong, Weng, Zesheng, and Li, Yingzhang.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2
二、文獻回顧	3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8
四、預期研究成果	9
第二章 身分標記及抗爭歷史	11
第一節 李應章	11
一、李應章身分背景	11
二、李應章抗爭史	16
三、李應章的抗爭思想	21
第二節 翁澤生	25
一、翁澤生的身分背景	26
二、翁澤生抗爭史	29
三、翁澤生的抗爭思想	34
第三節 謝雪紅	37
一、謝雪紅的身分背景	39
二、謝雪紅抗爭史	43

三、謝雪紅的抗爭思想	56
第三章 革命路線	61
第一節 革命方法與路線	62
一、翁澤生的路線	62
二、謝雪紅的路線	64
三、李應章的路線	74
四、翁澤生、李應章和謝雪紅的交互關係	76
1、李應章、翁澤生的宗派關係	77
2、謝雪紅、李應章的宗派淵源	77
第二節 革命目的	82
一、李應章的革命目的	82
1、日治體制內抗爭期	82
2、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	83
二、謝雪紅的台獨目標	85
1、階級意識覺醒時期	85
2、台共時期	86
3、中共時期	87
三、翁澤生的革命目的	88
1、振興中華民族	88

2、實行共產主義政策	88
第四章 國家認同的比較觀察	91
第一節 國家認同的心路歷程	92
一、政治主權、民族文化	93
二、李應章的國家認同	94
三、謝雪紅的國家認同	101
四、翁澤生的國家認同	106
第二節 國家認同的比較	108
一、李應章國家認同特色	109
二、翁澤生的國家認同特色	111
三、謝雪紅的國家認同特色	112
第五章 不同立場的評價	115
第一節 謝雪紅的評價	125
一、國民黨眼中的謝雪紅	125
二、中共黨員眼中的謝雪紅	127
第二節 翁澤生的評價	134
一、純正的中國共產黨員	134
二、翁澤生對台共認知的變化	136
第三節 李應章的評價	142

一、中華民族意識的李應章	142
二、走向鬥爭的第一步	146
三、中共解放台灣的旗手	146
第六章 結論	153
參考資料	155
附錄	163



表目錄 (文中附圖如無特別註記資料來源者，均為筆者自行整理)

表 3-1 翁澤生系宗派圖85

表 3-2 謝雪紅關係圖87



圖目錄

(文中附圖如無特別註記資料來源者，均為筆者自攝)。

- 圖附-1 李應章在廈門鼓浪嶼開設醫院舊址洪世才攝。198
- 圖附-2 二林國民小學文化走廊李應章紀念碑文。199
- 圖附-3 1938年8月在漳州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白區秘密工作，...199
曾任中共城工部廈門市委會常委 洪世才於2010攝於其廈
門住宅。
- 圖附-4 影響翁澤生思想至深的廈門區集美中學 洪世才攝。200
- 圖附-5 陳炳基夫婦於2010年在台中烏日高鐵站留影 洪世才攝201
- 圖附-6 陳炳基夫婦於2010在彰化二林鎮二林國民小學歷史走廊李應
章碑文前留影 洪世才攝。
- 圖附-7 簡吉兒子簡明仁和農民組合旗幟(農民組合旗幟在簡吉與台灣...202
農民運動研究室成立時由簡明仁正式交還農民運動發起地所
代表的二林蔗農協會，由筆者代表接收)。 洪世才攝。
- 圖附-8 2010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研究室」在交大成立 洪世才202
攝。

- 圖附-9 二林國小禮堂前李應章之女李玲虹。203
- 圖附-10 謝雪紅彰化老家住宅小西向福德祠。203
- 圖附-11 謝雪紅彰化舊居已經變成窄巷 洪世才攝。204
- 圖附-12 李應章女兒李玲虹（住北京，年輕時任對台播音員），2011年...204
在二林國小筆者書寫的李應章碑文前留影 洪世才攝。



第一章緒論

日治時期的台灣，由於日本的同化殖民政策，台灣人的民族自覺以及國家認同，有了劇烈的角力。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又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歐洲民主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蘇聯初步成功等的影響，台灣也跟進學習產生了變化，而相繼有台灣文化協會喚起民族主義及政治民主自治主張的成立；農民運動的震盪、台灣共產黨主張台灣獨立運動等的興起。台灣人角色的重新定位和選擇，台灣的前途何去何從，有了不同藍圖。

李應章、謝雪紅和翁澤生等在其一生之中，正好分別扮演了這一時期台灣人民族與政治思想的選擇與台灣何去何從的不同主張者，其反抗日本殖民的抗爭路線，以及台灣國家認同的分歧，在這一時間彼此展開激烈的競合關係。

李應章、謝雪紅和翁澤生之會有分歧的國家認同和鬥爭路線，固然有日治時期殖民政策及國際思想潮流的影響。不過，台灣的移民歷史，其實也佔有一定養分。這就牽涉到台灣移民文化與原鄉文化的拉扯，所產生的氛圍對李應章、謝雪紅、翁澤生的影響。

由於台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種族群組成以及不同時代背景而有多面向呈現的「台灣文化」，是同時兼具有最早的南島、漢族文化，以及後來的日本、歐美國文化等的特色。

「台灣文化」這個名目與指涉，如果以李喬在其《台灣文化批判》下的定義：「大量的台灣居民，在長期久遠生活於台灣島嶼，由於人與自然、與他人、與團體，還有與自己相處、適應、調適的過程中，接受一些物理原則的限制，形成台灣人或台灣社會特有的習慣、風俗，各種規範、法律觀、道德觀等。」在這樣的定義下，可發現「台灣文化」是一個複合體。「台灣文化」不是本質地存在於「自然台灣」；而是「台灣人社會」所經營實踐創造出來的。而不同台灣人帶來「原住民文化、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外省族群文化、南洋移民文化，」形成「台灣文化。」這也就是形成台灣民族的必要條件和過程，有別於華人社會繼承自中國

文化後不斷演化，發展而成的中華文化。其特徵是以中國的儒家文化與天朝思想為其骨幹而發展的文化及民族。

由於「台灣文化」有「中華文化」的基因，台灣文化並未完成為「自主文化體系」(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的建構。亦即一個文化體系中，從基層的習慣風俗，規範法律道德、感覺方式、思考、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宗教行為、價值觀、愛情觀、人生觀、生命觀，以至於文化哲學等上下不矛盾、和諧，而且完整；不需要依靠其他文化體系來維持其功能的延續。因此，台灣人民的行為表現，就受到「中華文化」的牽扯，表現出不同的效忠，影響台灣人的一致性，使得台灣一直在紛擾痛苦中經歷悲劇。

李應章、謝雪紅和翁澤生的生活背景和人生經歷，就在台灣的特殊環境之下有了不同的發展。其影響所及，為現代台灣的統獨問題，開了一扇台灣獨立的可能櫥窗，以及個人錯誤的國家認同選擇後果的好壞評定。

壹、研究動機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雖然經歷了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長達 20 年的努力，仍然沒辦法擺脫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爭執，台灣的統獨論爭始終是台灣邁向現代國家的障礙。國家定位不明的台灣，不只是這一代台灣人的悲哀，更將禍及子孫，成為台灣人世世代代的痛。

只不過是數十年前的台灣，台灣人透過台灣文化協會、蔗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及台灣共產黨的抗爭表現，就曾經歷了文化認同的台灣移民問題，導致台灣人在外來勢力影響下彼此鬥爭，以致於台灣再陷於外來勢力比畫的目標地，台灣人又在紛擾中彼此指責，台灣何去何從又轉入迷障中。

台灣人在這長達卅多年的努力中，一直存在反殖民統治的台灣何去何從迷失，這固然有強權勢力很難撼動的困難，但根本的癥結，卻在於移民所逐漸形成的台灣文化與祖籍地中華文化的角力。

那個時期的有志之士，在反抗運動中參與的團體及其扮演的角色，就反應在移民歷史所形成的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拉扯中。謝雪紅、翁澤生和李應章，三人的家庭環境、教育及經歷，剛好可分別代表中華文化、台灣文化及社會問題的不同層面，以致在他們的矛盾與鬥爭中，推展出台灣人認同過程的悲劇。

本文期待以謝雪紅、翁澤生、李應章為例，探討他們生長環境文化因素，帶給他們的價值觀，導致他們的信仰鬥爭中，台灣問題再度無解的病因。希望因而開闢出一扇解答之窗，讓台灣的自主權利，到底要以什麼方式的主張和行動，才可以撥雲見日，早日有可能的解決方法。做為台灣再度出發的參考。

貳、文獻回顧

探討台灣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组织發展，及其路線與宗派紛爭不勝枚舉。在討論台灣歷史的過程中，也有許多文化影響的論述。文獻探討將就歷史研究與史料兩大項，列舉數篇著作為例。其餘有關台盟文件、口述歷史、中共對台灣的滲透、韓戰的決策對「解放」台灣的影響、台共與國際共產黨的關係、馬克思主義在台灣的影响、兩條路線論述、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等等重要著作，將於論文實際寫作中分別加以探究與引徵。

一、歷史研究相關著作介紹

〈一〉陳芳明，2009，《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出版

謝雪紅評傳書寫的內容分四部分，一是顛覆傳統女性書寫的謝雪紅成長過程，二是台灣左翼運動史的整理，三是台共、中共的分野與糾纏，四是寄人籬下的苦悶。

本書分析台共的建立過程和困境，突顯台共建黨時日共自顧不暇，委託中共協助的做法已肇禍端。中共的鬥爭經驗，反客為主的主導了台共領導權與鬥爭方法與路線之爭，導致台灣人之間彼此互相鬥爭，種下盲動主義的禍害¹。

1930 年左右，台共發展還太薄弱，中共的介入，反而讓日本殖民統治者更加

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2009，頁 119。

心生警惕。在封閉與燥進的雙頭競爭中，被殖民者一網打盡。1945 年以後，台共的謝雪紅雖然東山再起，中共華東局也透過李應章的安排，不斷遣送地下工作人員，藉著台胞戰後返鄉復原潮機會，在台灣布置鬥爭力量。只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驗證了中共在台灣的力量還沒有成熟，國民政府反而藉機鏟除中共在台組織。

謝雪紅轉而離開台灣，成為沒有根的浮萍，再也沒有改革奮鬥的施力點。她的晚年悲慟，在權力之爭與路線之爭的餘波下，成就了他歷史的悲劇英雄角色定位。

〈二〉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南方家園出版

這是一本將農民運動帶進政治訴求，為反殖民與幫助弱勢而奮鬥一生的簡吉人生介紹。

本書從鄉村教師的簡吉如何成為農民運動的領導者寫起，在左翼與社會運動充斥的時代，台灣農民如何透過自身的體驗，以及知識份子的教育，成就了農民運動進步到社會運動的成果。

本書的重點，在於知識份子同情弱勢，進而幫助農民的覺醒，以及台灣共產黨透過農組的領導，為共產主義理想所做的鬥爭。這是一本領導農民運動的簡吉，透過領導農民運動的過去，成就其社會主義的信念。

〈三〉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草根出版

本書從台灣共產黨成立的根由與建黨經過，台灣共產黨的演變和毀滅，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與中共的關係、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關係等等，討論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

本書貫穿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成立及其演變，解析了台灣共產黨的建立與過程的複雜性，分析了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史。

〈四〉何池，2004《翁澤生傳》，福州：海風出版社

本書在記述翁澤生走出大稻埕，邁向革命的旅程。創建台灣共產黨以及奉命成為中共中央巡視員，標榜翁澤生對台灣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貢獻，以及如何與謝雪紅路線不同的鬥爭，是本書的主要重點。

由於翁澤生曾師事瞿秋白²，因此，翁澤生在領導台灣共產黨的組織與鬥爭方向，秉持了瞿秋白的冒進，並為其不同於謝雪紅的路線主張有深入分析。

翁澤生被捕移送台灣之後，謝雪紅與翁澤生在台灣監獄中有否出賣組織的表現，成為謝雪紅後來與李應章路線之爭的關鍵。翁則生與謝雪紅在法庭的供詞，展現了誰擁有共產主義信念的純潔性，也凸顯了他們之間對於共產信仰的差異。

〈五〉張傳仁，2004，《謝雪紅與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湛江：廣東人民出版社

本書就謝雪紅早期加入台灣文化協會，開始反日行動到國民政府來台發生二·二八，謝雪紅不畏危險領導軍事起義失敗，最後不得不潛逃出境到上海。為了解放台灣，謝雪紅與楊克煌、蘇新等聚會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本書的重點在強調中國的民主黨派與中共合作，接受中共領導的歷史意義。

〈六〉連溫卿，1988，《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香鄉出版社

本書以日據以前之政治運動與日據以後之政治運動做一概述，但以日據以後之政治運動為主要介紹。本書介紹重點有「日據時期之政治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台灣民眾黨之政治運動、「資產階級之政治運動」、「青年男女之政治運動」等，並以之討論這些政治運動傾向。

本書有三點史學價值，一、第一部由台灣左派知識份子所寫的中文台灣史，二、連氏手稿是一本回憶錄史料，三、手稿揭示了日治末期台灣人的一些政治動向。

本書的序言「台灣民族性的一個考察」，以及終章「台灣文化的特質」，是瞭解連氏台灣歷史觀，以及他對荷蘭以迄日治時代諸運動總檢討，剛好構成一部台灣近代史，有重要意義。

² 瞿秋白，原名瞿雙，後改名瞿霜、瞿爽。江蘇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國語學校學英文，後到北京謀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讀書。1919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同年11月參與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初，參加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曾為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與陳獨秀同為中共成立後第一代、第二代領袖，並一起共事5年多，共同領導了第一次大革命，為早年共產黨成長和中國革命的發展做出貢獻，但因冒進而下台。陳鐵健，《瞿秋白傳》，上海：紅旗，2009。

二、史料

〈一〉許文辛，2008，《心血留痕》，香港：香港通行出版有限公司

《心血留痕》是中共建國前活躍於廈門、金門的地下黨黨員許文辛一生的經歷和感想，其中有許多國民政府時代中共地下黨的故事。其中，有對李應章的介紹和李應章組建金門地下黨的經過。

本書是由 230 篇許文辛經歷的廈門地工、上海時期對台鬥爭、對內領導宣傳等等事件所組成。許文辛金門縣人，1921 年 7 月 8 日出生。2010 年 3 月 4 日筆者拜訪他的時候，他已高齡 89 歲〈再過四個月零四天就是 89 實歲〉，但他還能上下三層樓的階梯，身體之健康令人羨慕。當他贈送《心血留痕》親筆簽名書的時候，流露出對自己一生的驕傲與留念，讓人印象深刻

〈二〉蘇新，1993，《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本書雖然從荷據開始書寫外來政權對台灣的欺凌，但重點擺在 1895 以後的台灣形勢，講述的是日本的侵略、二·二八、美帝國主義在台灣以及二二八以後的反蔣反美運動，時序只到 1949 年國民黨遷台前。

本書處理了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以後的台灣島內形式，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以及台灣的「統一戰線」在台灣活動的情形，更重點提到「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一台灣人在中國成立的反國民政府組織。

很巧妙的是蘇新將「台灣人管台灣人的台灣高度自治」的「台盟」綱領及口號秀了出來。其口號二十條：「全省人民團結起來，爭取台灣自治！」二三條：「台灣人民自治萬歲！」隱藏了玄機。

〈三〉葉紀東，2000，《海峽兩岸皆我祖鄉》台北：人間出版社

本書充滿了對台灣的愛戀，但也提供了謝雪紅在大陸時鬥爭的見解，以及他對舊台共路線爭議的看法。

葉紀東在文革中的處境和反應，相當程度反應了他的思想和對文革的看法。葉紀東對台廣播實事求是的做法，說明了他對中國大陸的冷漠。顯露他對擁有台灣人身分的驕傲。

〈四〉李玲虹、鞏晉珠，2006，《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北京：台海出版社

本書由李應章之女李玲虹介紹她父親年輕時所從事「二林蔗農事件」發生

始末的背景、原因及過程，並有專章介紹二林蔗農事件重要領導人李應章、詹奕候、蔡淵騰、陳萬勤、劉崧甫的一生及其特色。由於李應章與林獻堂的關係，以及台灣文化協會對二林蔗農組合文化教育幫助，也專章介紹林獻堂政治活動的過程及其參加過的相關組織。本書的編輯與介紹雖然有點凌亂，但因是第一本介紹全面二林蔗農事件的書，有其價值經緯

〈五〉蘇新，1994，《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台北：時報文化

本書除了再次重申反蔣的立場，也持續了蘇新對台灣的關懷和想念。對於台灣的文化、台灣的新文化有些比較評論。譬如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時代的教育問題有精闢的觀察；對新文化的保釣運動，又有溢美之詞。他與友人的通信，關心同志之情溢於言表。政經報的補餘，對時事的關心非常詳盡，很有歷史價值。

〈六〉蘇新，1993，《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時報文化

本書的蘇新自傳出自蘇新口述，對蘇新的成長歷程及為何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相當參考價值。本書也針對20年代及30年代的台共歷史的殘缺有相當的感懷，可惜未能完成這部重要回憶錄。不過，葉芸芸附錄了「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相當有參考價值。

〈七〉洪永固，2010，《李玲虹〈玉惠〉的人生歷程》，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0.4

本書寫的是李應章之女的一生過程，觸及了李應章家族、李應章的歷史事件及李應章子女在中國的生活情況，適當反應出李應章在中共的歷史地位，對研究李應章及其和中共、台共的關係，中共對台的統戰，有相當研究價值。

〈八〉簡吉，2005，《簡吉獄中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本日記的內容，是從1929年12月20日簡吉被宣判監禁一年開始，到1930年12月24日出獄為止，共約370天。獄中日記是1920-30年代台灣農民運動的產物。

日記包含獄中生活點滴、來往書信、讀書札記，其內容含蓋日本時代的監獄問題、政治、教育、農工貿易、礦產調查等等各方面，日記所涉及的相關人物，包括古屋貞雄、石塚英藏、江賜金、吳丁炎、李應章、周渭然、松田源治、侯朝宗、張行、張滄海、張道福、陳何、陳崑崙、陳德興、楊春松、趙港、齋藤實、簡娥、顏石吉、顏錦華、譚廷芳、蘇清江等和農組、共產主義、反簡吉的反幹部人士等等，對了解農民運動及共產主義在台灣的活動有幫助。

〈九〉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出版

本書是謝雪紅生前口述，其同居人兼秘書好友筆錄的遺稿，是講述謝雪紅出生到台共二、一二事件為止的謝雪紅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經過。由於編者楊翠華的特殊尷尬身份〈楊克煌的女兒〉，本書能夠出版，彰顯了台灣主體性的重要性，以及楊翠華克服私人感情因素，對「知」的無私和對台灣史的重視。

本書對翁澤生與王萬得急進的作為有所抨擊，對他們批評謝雪紅的穩健做法稱之為「閉門主義」也有不滿。並進而與翁澤生和王萬得清楚地劃清界，並標示著謝雪紅對台灣這塊土地及台灣共產黨屬性的堅持面。

參、研究方法與架構

「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衝突與融合的多樣性，牽引著台灣歷史的走向，也形塑了不同理念和典型的「愛國人士」。有的以「中華文化」為根底，一心要為大一統的中國國家主義努力，做一個大中國的「愛國人士」；有的看清中華文化一統觀念的問題性，希望以內含海洋文化開拓性的「台灣文化」，創造多樣性的台灣前途；更多的是徘徊於兩個文化牽引的知識分子，既有中華文化的原鄉影響，又有台灣文化的環境因素，價值的判斷呈多樣性，既愛中華又愛台灣。

不論是哪一傾向的台灣人，都是根據他們的信仰，愛他們所愛的國家和人民，也深信他們的信仰最終對台灣是有益的。但果真如此嗎？結果如何還不知道，但不同文化信仰衝突的過程，對台灣的傷害很大。

本論文將以文化信仰，就「歷史回顧」、「謝雪紅、李應章與翁澤生的矛盾與鬥爭」、「國家認同的觀察」、「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革命形象」四大部分，探討台灣問題的癥結。

「歷史回顧」是就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三人的出生背景與學經歷及不同方式的鬥爭過程。回顧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台灣由日治殖民時期到國民政府類殖民引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台灣婦女的社會地位、環境價值觀的變化與傳統觀念壓力等對謝雪紅、翁澤生、李應章的影響，讓他們走上各自的道路和堅持。

「謝雪紅、李應章與翁澤生的矛盾與鬥爭」則將討論中國共產黨階段性的對台政策及手段對台灣共產黨發展的影響。由於台灣共產黨的發展，不論前期謝雪紅被稱為「閉門主義」時期，翁澤生、王萬得等路線給予的質疑，還是後期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謝雪紅與李應章路線之爭或宗派之爭的干戈，對台灣共產黨的發展，甚至台灣共產黨的屬性都產生意義，必須予以探究。

「國家認同」是他們的價值觀，討論他們的國家認同，等於讓他們的信仰浮出檯面。

至於「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革命形象」，探討的是不同文化信仰鬥爭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對台灣的影響。

本論文也將探討台灣人的性格面向，期能借古鑑今，探討出解決台灣的處境及對應方法。

四、預期成果

臺灣是移民之島，臺灣歷經了荷蘭、鄭王朝、清帝國、日治及國民政府時代，臺灣人民的歷史表現，總是分裂與彼此攻擊的特別多。臺灣經歷日治時期，接受了日本明治維新轉自歐洲的國家觀，因而蛻變成有一點國家觀念的「台灣族群與文化觀」。但是，受到外來者影響而分裂的情形沒有改變。這是「台灣的國家目標」³還沒有完全確立，「文化認同」還在飄移所致。

日治時代的反殖民運動，台灣知識份子的文化宣傳與群眾抗爭，因為觀念與步驟和策略的不同，劃分成體制內的改革與體制外的抗爭兩大部門。這兩大部門內部還有分歧，產生最嚴重對抗的首推謝雪紅的台灣共產黨，以「蔗農民組合」為外圍的所謂「閉門主義」，以及王萬得「消滅文協，使運動左傾化」的鬥爭⁴。這兩派的鬥爭，其實已隱約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路線與「台灣共產黨」領導路線的競爭。如果以所屬成員都是台灣籍，則其因文化信仰的差異，又有「宗派之

³ 許慶雄，《台灣的國家定位》，頁 12〈國民國家觀〉。

⁴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118。

爭」、「中華民族論、台灣民族論拉扯」的影子。

路線之爭或宗派之爭，在日治時期已經影響到「台灣共產黨」的發展。而在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台灣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翁澤生死後，繼翁澤生之後蔡孝乾的變節說，成為謝、翁兩派在中共旗幟下取得代表台灣發言權的關鍵，導致雙方陣營更是如同水火。在 1950 年代，更是持續發酵，把李應章拖入漩渦中。

本論文透過〈台灣文化、中華文化〉的探討，以及「中國共產黨」這一外來勢力對「台灣共產黨」的影響，藉由李應章等三人的路線與國家認同觀察，導正李應章等三人被各取所需過度吹捧的歷史表現，並為台灣的將來，提供多元可能的想像空間。



第二章 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身分背景及抗爭史

台灣反抗運動的發展，自進入政治反抗期以後，因為日警的鎮壓，以及各類思想的啟迪，終於發展成三條路線，造成思想與教育體系的文化協會分裂。這三條路線是一、連溫卿及王敏川組成的社會主義思想運動。這一派以無產階級與農民組合為代表；二、受中國國民革命影響的全民主義派，由蔣渭水領導。它集合了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企圖在工農運動中維持統一的民族主義形式；三是蔡培火代表的溫和民族主義運動派。⁵

翁澤生、謝雪紅、李應章的抗爭歷史，雖然有中共及台共的發展策略立場，但也都在這三條路線中偏左或偏右的發展。

由於出身環境與教育的不同，處於殖民環境台灣的李應章、翁澤生、謝雪紅，發展出的抗爭歷史也有極大差異。

第一節 李應章

截然不同的出身環境與教育，使得同樣在殖民統治的台灣出生的李應章、謝雪紅、翁澤生發展出不同的歷史觀，刻畫出台共的路線鬥爭和國家認同分歧。

李應章在三人之中不但屬於知識分子，而且是資產階級。以這樣的身分從事殖民地的反抗運動，顧慮身家財產的安危，是比工人之子翁澤生、謝雪紅多，鬥爭的方法與結果也會不同。

一、李應章的身分背景

李氏祖宗來自山西省介休縣（位於山西省中部，太原之下，臨汾之上，太嶽山之西），約於西元 1100 年遷到福建同安縣新店鎮浦園居住（廈門東北方）。1403 年元朝時有李應祥公移居金門，傳下“古寧”一族。17 代祖李森浮公則於 1841 年 16 歲時隨父親移民臺灣二林，傳下順培安德一脈。

⁵ 盧修一，《日據時代 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43。

李應章祖父李森浮生於 1825 年，于 16 歲時隨父李滋約從唐山福建同安縣馬巷廳翔風 14 都浦園林厝鄉來台，定居于臺灣二林庄。

李森浮來台後在洪姓人家的中藥店幫忙，後娶老闆的女兒洪蒂，並且繼承岳父祖業，中藥店命名保安，並育有李炎練、李炎能、李炎榮、李炎續等四個兒子。李應章父親李木生（李炎榮）繼承祖業行醫濟世，李應章受其影響，自小學習中醫典籍，後來又進醫科學校學習西醫。

1895 年臺灣割讓給日本，此時正逢明治維新末期，日本建立新的典章制度，對醫學有一定的規範，因而李炎榮的自學中醫經常會被統治者騷擾。又因臺灣是被殖民統治，被殖民者欺壓也是常態，李應章祖母洪蒂親身感受⁶，自然非常痛恨日本殖民者。她曾經這樣說：⁷

「我死後，骨頭要搬回唐山去。」

由於李應章自小被祖母疼愛，受祖母影響頗深。因此，李應章可以說自小就被祖母灌輸仇日思想，並且教導李應章要有民族氣節。李應章後來不惜犧牲優渥的醫生收入，冒著生命危險幫助農民，還被關入獄，卻仍然堅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到底，後來還加入中國共產黨，對抗腐敗不得人心的中國國民黨，以追求更廣泛的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全國社會的解放，是有其家教淵源⁸。李應章的祖母洪蒂，甚至叮囑兒孫，死後歸葬唐山家鄉是她的願望，可見其對日本統治的憎恨。

李氏家族自開台祖李森浮以降，二代李炎練的次子李增牛，其大兒子李錫坤是耳鼻喉科醫生，開設保安診所，在二林的名聲響亮。其子李鴻謨、李中仁、李文正皆留日醫學博士，已經移居日本數十年；二代祖李木生（李炎榮）子李應章開業保安醫院；李炎能子李增鑾的兒子李錫地留日，開業順安診所；其子李子麟醫學院畢業，繼承二林的順安診所行醫濟世。

⁶ 洪蒂，李應章的祖母，開基祖，生於 1830 年，卒於 1910 年。

⁷ 李應章口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

⁸ 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頁 2。

李氏家族堂號的一首增慙公聯文，順安就在其中：⁹

順命聽天繩其祖武、培其本固其株枝葉雲初綿世澤

安居樂業貽厥孫謀、德有鄰仁有里箕裘克紹繼前徽

李家自 1836 年移居臺灣二林，經歷一百多年，子孫散佈臺灣各地，也有移民日本、美國或嫁到瑞典。

1904 年至 1906 年 5 月，李應章入私塾學漢文，回家後再由他的父親李炎榮（木生）及大堂哥李增慙補習四書、孟子、詩經、古文等等。由於李炎榮嚴格管教，1906 年 3 月入二林公學校後學業成績猛進，1911 年 3 月得以跳級提早一年畢業。¹⁰（為首屆校友）

李增慙（1880 年生，大李應章 17 歲）非常疼愛李應章這位堂弟，1946 年 9 月 20 日李應章回到他闊別 15 年的臺灣，並於 4 天後回故鄉二林，李增慙特地作詩三首歡迎他：¹¹

①解放離家十五春，懸壺濟世滬江濱；

能揚醫德光先緒，網載歸來慰至親。

②申江台廈久揚名，世業蒸騰醫術精；

光復沙山多贊翼，故園蓉菊笑相迎。

③日寇死灰敢複燃，負隅持槍肆兇殘；

臺胞屈殺上書訴，不忝公推代表團。

李增慙詩作字裏行間，有對李應章滬江行醫的驕傲；有對臺灣的光復感到高興；但也有以日治時期臺胞反對壓榨的不公不義，隱喻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暴行。總而言之，李增慙是看重李應章這個小堂弟到中國大陸後的表現。因此，常常會跟兒孫談起李應章。

根據李增慙的孫女李清蓮說¹²：「爺爺說，李應章小時候非常頑皮，人又聰明，他的父親李木生固然高興他的聰慧，但對他好動調皮（志註）的行為也傷腦筋，

⁹ 李子麟，《李氏祖譜》。

¹⁰ 二林國小一百週年慶紀念冊

¹¹ 李增慙詩稿（其曾孫李根培保存，李根陪是筆者表哥）。

所以對李應章管教特別嚴厲。想不到李應章稍長，女性緣又特別好，他又敢作敢當，當時的民風較為保守，著實讓長輩擔心」。

李應章小時候的形象不是很好，所以李增塹對他是很擔心，所以也會碎嘴講給孫女聽。其實，不只筆者母親轉述他祖父對李應章的擔心；李子麟也說他父親李錫地對李應章年輕時風流事蹟也不以為然。

對照李應章逃避日警逮捕，搭帆船前往廈門。在船上詠了一首「別台灣將之大陸感賦」的七言律詩¹³：

十載杏林守一經，仍然衫鬢兩青青。

側身瀛海豺狼滿，回首雲山草木腥。

潮急風高辭鹿耳，鷗鳴月黑出鯤溟。

揚帆且詠歸來賦，西望神州點點星。

其行為舉止大不同於年少無知，李應章已經是端正有想法的人，難怪李增塹會在李應章從中國回台灣時的身分地位有那麼大的感慨。

李應章在二林公學校和謝悅及蔡淵騰兩位好友結為拜把兄弟，謝悅後來在教育界服務，是二林農校第一任校長¹⁴，在地方素孚眾望。蔡淵騰則是二林政界名人¹⁵，其兒子蔡慶欣連任多屆二林農會總幹事。其孫蔡詩傑是現任二林鎮農會總幹事，在二林政界舉足輕重。

李應章二林故居的斜前面就是媽祖廟，是二林的市中心。其住宅後面是二林溪，是明清唐山過臺灣開發二林的重要水道。媽祖廟廟前廣場是鎮民最重要的集會場所，同時，也是政治與宗教中心。自古以來，二林有要事都在媽祖廟廟前廣場通告周知，也在這裏演戲或雜耍賣藝。二林蔗農組合的演講與組織，媽祖廟廣場是最重要的地方。臺灣文化協會的理事長林獻堂，就曾在二林媽祖廟廟前廣場演講，人潮擠得約三百坪大的廣場水泄不通。

¹² 筆者母親，李應章姪孫女。

¹³ 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13。

¹⁴ 今國立二林工商高級職業學校

¹⁵ 二林鎮第一屆鎮民代表。民國 35 年元月籌備，3 月選出鎮民代表。

因父親沒有中醫執照而被日本人欺負，以及祖母不滿日本據台之初的高壓統治，很早就已經埋下了仇恨日本的種子。¹⁶又因家庭教育很重漢學，也培養了李應章的民族意識思想。1914年上了彰化商業實業科，因為環境及個性活躍使然，開始接觸課外讀物，還閱讀了新青年雜誌，這是北京出版的一本雜誌，他的思想開始有目標。這時候的李應章已經關心社會現象，組織“藝吟社”和社會人士作聯吟詩互動。對1915年8月發生日軍警大屠殺的噍吧嘍事件，李應章忿怒之餘更有尖銳的反應，因而還寫了一篇「嗚呼慘矣哉」¹⁷的文章被校長叫去訓誡，幾乎被退學。

18

青年期的李應章，是思想建設逐漸成熟，行動力有效展現的年代。但是，這個時期的李應章是溫和的，也是謹慎摸索前進的反抗者。這可以從他順從家長要求他回家開業，照顧家庭和家族事業，可看出他對抗爭、對革命事業的軟弱。不過，因為二林蔗農事件李應章被關，其父親憂傷而死，以及莫名火災燒燬祖屋的家恨，這個時期的李應章，也是反抗鬥爭由溫和轉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¹⁹，步蔣渭水之後，走向中間偏左路線時期。

總結李應章的青年期，由於他考上了醫學校，視野更加寬廣，接收更多的前進資訊。因此，李應章的思想飛快躍進，行動也更加積極。李應章就在行動中，順應需要而認識了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臺灣近代文化、思想與政治領袖。由於彼此交互影響，李應章有了階段性學習的對向，因而脫胎換骨，改變了他的思想格局。

要不是李木生的死，在臺灣時期的李應章，長期所做的反殖民統治工作，主要是教育性質，是要通過演講等教育方式，喚起臺灣人的民族意識與當家作主的覺醒工作。針對殖民壓榨不合理的經濟剝削與政治的不平等，李應章是採取理性

¹⁶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3。

¹⁷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4。

¹⁸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2。

¹⁹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13。1930年10月，台灣民眾黨在彰化開會，李應章應謝南光邀請，參加會議，在會上反對日本殖民當局要該黨修改階級鬥爭綱領，發表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言論。李應章的母親謝愛是謝南光的姑姑。

的談判，據理力爭。所以，早期的李應章，就和蔣渭水與林獻堂走得比較近。因而，李應章也在臺灣議會期成的體制內改革簽名。顯然，他對壓榨與不公的殖民統治，雖然義憤填膺，但卻像有教養的紳士般，不敢太得罪日本殖民當局。

李應章的離開臺灣，是不得已的權變。他在 1930 年冬，為了團結廣大農村的各界人士，反對日本殖民統治，開始籌組「保甲協會」²⁰，並且邀請謝南光共同策劃。不料，二林的員警受臺北的員警署直接命令，突然搜索李應章住宅，並警告不得再發表言論，如有違背，立即逮捕。

1931 年李應章拜訪在能高郡的老友江川博通員警課長（與日共有關係的社會主義同情者），得知日本當局有意最近要逮捕李應章。江川課長秘密告知李應章，最好早日辦理護照離境較好。

其實，1931 年的大逮捕，台灣共產黨者、工會、農民組合、文化協會關係者及其他被牽連者達三千多人。²¹當年，老家在芳苑鄉路上村的謝春木一家，已舉家遷往中國。謝、李兩家相距不到四公里遠，又是表兄弟的李應章，聲氣互通，又有內線通知，李應章才在這個情況下，不得已由基隆離開臺灣到廈門。

二、李應章抗爭史

李應章的抗爭歷史，比較不同的是可清楚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32 年以前，他還在台灣的時候，他是以中產階級的身份，主要以反抗日本殖民的農業政策為重心。這時候的李應章，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應邀在台灣民眾黨彰化會議演講，他的殖民抗爭思想，是緊隨著林獻堂的資產階級體制內改革路線前進，因牢獄之災和父親的憂急死亡，才緊跟著蔣渭水的蛻變，逐漸走向中間偏左路線。

這時的李應章，最激烈的言論是應謝南光的邀請到台灣民眾黨演講。謝南光

²⁰ 明治 31 年 8 月，台灣總督府以律令 21 號公布（台灣保甲條例），並以府令 87 號頒佈〈台灣保甲條例施行細則〉。此係參考清制，並依需要設壯丁團以為附屬。其職務包含搜捕罪犯、調查戶口、取締出入口、管理測輻標、處分違反規約等。壯丁團則擔任盜賊及水災警界與救護。

²¹ 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頁 161。

原名謝春木，筆名追風，他在 1923 年著有〈無知的「神秘的自制島」〉²²，是對日本殖民最大的控訴。而李應章的母親謝愛是謝春木的姑姑，在他父親憂憤而死後，原本在台灣文化協會是中間偏右立場，跟隨林獻堂、蔣渭水理念的他，也跟蔣渭水後期開始向中間偏左的激進路線前進，政治路線則逐漸和表兄弟謝春木一樣走向共產主義。

李應章的抗爭歷史第二階段，是 1932 年他到中國廈門以後，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展開對國民黨的鬥爭。

李應章的兩段鬥爭史，其主要鬥爭對向和性質不同。如果更深入分析李應章人格特質，則會發現他的抗爭歷史是溫和的，有資產知識分子的理性和妥協性。在台灣，他可以主導所做的最大限度是體制內改革的工作，他不願意冒著生命財產的危險，硬碰硬的去抗爭。在中國，不論在廈門或上海，他都是先創業後加入革命行列。所以，他能自主做的革命事業不多，主要的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做地下掩護等工作。

李應章經歷了體制內台灣民主議會政治的訴求；也在中共的領導下，經歷了中華民族論對台灣收歸中國版圖的過程。他的一生都在中華圖騰裡找到知識分子的定位，去做社會改革和國共鬥爭的抗爭工作。

李應章在台灣時最重要的抗爭，是二林蔗農事件。二林蔗農在李應章等人的領導下，原本希望在體制內得到日本統制者的善意回應，減少剝削蔗農。哪裡想到資方的強行收割甘蔗，導致無預警的爆發二林蔗農事件。

自李應章回鄉關心蔗農利益，開始幫助蔗農到爆發二林蔗農事件，每一個過程其實都可觀察到李應章的立場和思想：

²² 《神秘的自制島》述說一個叫做「無知」的人在東海上的「自制島」觀光心得。無知在自制島上看到人們全在脖子上帶著像枷一般的東西，上面寫著「自制」兩個字。這個東西能使人不想吃飯，凍了不想穿衣，不知疲勞，不知恥辱，不必要什麼新學問，感受甚麼新思潮」。自制島上的人都對這個東西相當感恩，他們日子照過，對自制的枷鎖沒有任何的懷疑和不滿。謝南光諷刺的是台灣被日本殖民的現況，他的民族思想和對日本殖民的不滿以反諷書寫。

一、以感性與知識為後盾進行體制內改革

李應章在《台灣民報》〈其鳴也哀〉有一篇〈蔗農爭議的回顧〉大意是這樣寫著²³：「一個蔗農因為工作過勞生病去李應章的診所看病，病人昏倒被李應章急救甦醒過來，他醒來後看到妻子在那邊哭，急著罵她哭什麼，還不快去雇幾個粗工去蔗田工作，要趕緊收成。這甲地大概可收九萬餘斤的蔗，還給肥料錢和借金，或許還有一點錢可繳納醫藥錢。如果不夠的話，請李醫師讓他欠著-----。沒想到這個病人隔天就死了。這個病人是在蔗園裡剝蔗葉起病，是宿疾過勞而死。-----像林格這樣努力一生但也窮困一生的蔗農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我是因為有這樣的感慨，才會跑到講演台上訴說幾句農民得苦狀，講幾句農民的悲哀。這就是我們農民運動的出發點。」

因此，李應章從 1923 年 9 月起，就邀集地方人士進行農業調查研究，搜集資料，算出各種作物種蔗收成比較表、各地物價和每年糖價比較表、多少甘蔗軋出多少糖、糖廠利潤和蔗農收入比較表，讓蔗農知道被製糖會社剝削的嚴重性。另一方面開始組織「農村講座」、「農村夜校」，下鄉作巡迴演講會，直接與農民接觸，讓資訊閉塞的農民知道捍衛自身的權利。同時還編寫〈甘蔗歌〉²⁴教農民歌唱，喚起蔗農的悲情。由於他們敢公然地批評日本政府和糖廠的種種不是，在農民受盡欺壓、屈辱的時刻，當然獲得熱烈的回響。

二、面對殖民力量的軟弱

李應章及蔗農組合幹部們積極為蔗農奔走陳情，成立第一個蔗農組合，但在二林蔗農事件發生時，組合幹部缺席了。李應章在他的自述有提到被警方欺騙，以為真的要以談判解決爭端，所以出差到沙山看病，不在現場。為李應章自述整理的蔡子民，以賴和寫的一首詩《覺悟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作為二林蔗農事

²³ 李應章，《台灣民報》，昭和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一百五十三號。

²⁴ 洪長源，《二林蔗農事件》，頁 81。

件驕傲的註腳：²⁵

覺悟下的犧牲，
覺悟地提供了犧牲，
唉！這是多麼難能！
他們誠實的接受，
使這不用酬報的犧牲，
轉得有多大的光榮！

（以下8段從略）

—編者

但是，賴和的另一小說作品〈豐作〉，質疑組合幹部的膽怯無能，被選擇性的忽略。對於蔗農組合幹部交涉的失敗，〈豐作〉寫到：²⁶

「幹！攏是那些人的變鬼，叫人去死，自己一點也不敢露出頭面。」

「講起來攏是組合的人不好，都無奈人何，偏要出來弄鬼。險惹出事來，像二林那一年，不知害著多少人。」欠訓練的民眾，尤其是無理解的農民，講話卻似乎真有情理。

雖然，這樣的寫法有欠公允，組合幹部在蔗農事件發生時是不在現場，讓蔗農面對強橫的警察，這一點李應章也承認。但是，組合幹部是不是只會叫人去死，自己躲得遠遠的呢？這恐怕也未必。事件發生後的那天下午，包括李應章在內的組合幹部都出面設法解決問題，讓事件不要擴大：²⁷

「當我初診回到醫院，農組、群眾圍在那裡，又興奮又緊張，給我說了與日警衝突的情況，提出要襲擊警察局，奪取武器起義。我們農組幹部急忙阻止大家說“千萬不要亂動，不能白送肥肉餵老虎。”使大家平靜下來。

對照李應章的說法和賴和的寫法，凸顯了幾個重點：

²⁵ 李應章，《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 12。

²⁶ 賴和，〈豐作〉，頁 176。杜昀珩，《歷史記憶的現身與缺席：以二林蔗農事件中的蔗農組合幹部與蔗農為例》《文史台灣學報》第五期，頁 220。

²⁷ 李應章，《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 11。

一、二林蔗農事件發生時，組合幹部不在場。

二、組合幹部不想和警方正面衝突。

三、理性的訴求是組合幹部要走的路。

從以上三點結果論分析，在李應章領導下的蔗農組合，自始至終都是循著體制在做請願的動作。所以，為蔗農的利益奔波是事實，賴和的詩《覺悟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反映了蔗農組合的努力。賴和的小說〈豐作〉，描寫蔗農事件發生時組合幹部不在場，只點出組合幹部超出其體制內陳情的無力感。

李應章在中國和在台灣不同，李應章在大陸的革命行動則可分為三個段落，前一個段落是廈門的革命工作期，是以神州醫院掩護共產黨革命同志，以及為游擊區出來的受傷、生病的同志治病。比較特別的是，1933年中共市中心市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壞，先後被捕20多人，40個黨部只剩7個。李應章臨危受命，負責開闢金門縣新區，在那裡成立金門共產黨組織。²⁸

第二個時期是上海抗日工作期，這個時期的前半段，李應章沒有找到共產黨組織。1934年底到1937年有兩年多時間李應章只在上海開診所及研究戒菸方法，從事戒菸醫療，賺了很多錢，還因診所不夠使用，搬家開設偉光醫院。²⁹這麼長的時間，李應章沒有搭上中共的線，在他的自述，也沒有提起關心農民組合的事。蔗農問題並沒有因他離開而解決，但他卻像斷了線的風箏，不再關心蔗農和蔗價的問題，令人納悶。

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上海福建同鄉會讓李應章負責救護組的訓練和傷兵醫療工作。後來李應章又組織了台灣革命大同盟，並且在救亡日報發表宣言和綱領。

根據李應章自述的說法，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在報上發表宣言和綱領，找到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而工作重點，是組織慰問團去慰問那些被國民黨反動派監禁而釋放出來的同志。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上海隨即發生八一三事變，這是

²⁸ 許文辛，《心血淚痕》〈李應章（李偉光）向金門撒播紅色種子〉，頁30。

²⁹ 李應章，《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16。

中日淞滬會戰的開端。李應章組織台灣革命大同盟，不是應該針對日本嗎？不是要反日讓台灣解放嗎？但他一心一意只在乎中國共產黨，令人費解。

後半段是李應章透過組織台灣革命大同盟找到共黨組織，並在組織領導下為新四軍勸募藥品，以及蒐集日軍情報匯報聯絡人吳成方。

第三個時期是 1945 年日本戰敗後國共競爭期，這個時期的李應章，透過同鄉會送流落大陸的台胞回台機會，一併成為輸送共諜到台灣的聯絡站。另外，還掩護了許多共黨地下黨員和地委幹部。據原台盟總部秘書長徐萌山回憶：³⁰

「1948 年營救和掩護了當時參加學生運動而遭受逮捕或追捕的台灣籍學生鄭晶瑩、江濃、張碧坤、林梅英等；掩護了從台灣撤回大陸的地下黨員張程浩等；經李純青介紹，收留、掩護福建地下黨遭破壞流落上海的地下黨員張連等十人；安全安置李先念部隊突圍出來的一批地委幹部，並移送到解放區。」

李應章的抗爭事蹟，除了在台灣的時候是站在明處的領導抗爭，在大陸時期都在暗處，做掩護、輸送及供應醫療用品等工作。李應章在大陸時期的工作都是在幫助其黨內同志，所以人緣特別好。這也使得謝雪紅在上海和李應章的鬥爭，吃了苦頭。

李應章的抗爭歷史，第一階段在台灣的目標，是在認同日本對台政治勢力後的尋求體制內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有私人的利益和社會正義併存的鬥爭。但在中國時期，思想與民族的鬥爭是李應章主要的方向。但是，1934 年至 1937 年回歸單純的醫療生涯，其實也反映了他是資產階級的心態，以至謝雪紅後來以資產階級成份控訴李應章，讓李應章不得不捐房產。

三、李應章的抗爭思想

李應章的抗爭思想奠基於中國民族主義，不論是向殖民統治的日本當局申訴農作的公平正義，還是不滿意國民黨統治的貪污腐化，他都是為中國民族興起的

³⁰李應章，《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 22。

意志中去抗爭。不過，兩階段的抗爭內容不同，其思想的轉換與價值認同也有天淵之別。

李應章的第一階段，是對日本當局申訴農作的公平正義。由於殖民統治的族群差異，台灣總督府以政策保護資方剝削台灣蔗農，一方面增加資方利得，另一方面取得廉價蔗糖供應日本母國居民。所以，李應章只好尋求團體的力量，爭取公平的對待。

台灣民報於大正十四年六月十一日，登載了〈蔗農組合的準則如何？〉，其內容透露出蔗農組合的目的非常單純，只是在不公平的殖民統治下，被殖民者要求合理的對待被殖民的蔗農而已。李應章和蔗農組合，是要在殖民體制中尋求救濟的行為：

「台灣的製糖會社，靠著大資本家和政府的特別保護迄今刻薄小農民的罪責、不要再喋喋了。但是會社自身既然沒有一定的蔗園、那末年年的原料是不得不向農民買收的。但是向來會社所對待農民的經過都是在農民方面沒利益、所以蔗農隊會社的反感和不喜歡植蔗這是當然的事。藉政府的特別保戶來強制農民植蔗、在於民權發達的今日已經是難得成功的。所以會社讓農民植蔗、對雙方的利益分配要公平些兒、使農民有利才行。-----。但是在特別的事情也不得不植蔗的、譬如小作農不植蔗的時候會社便向業主增加嘆耕、致使小作農無地可耕、所以恐怕會社奪取耕地不得已也要栽蔗的。既然如此、雙方變難免紛爭了。然會社有才、農民哪得和他爭議。所以在這裡農民只好團結、於是蔗農組合的組織是很必要的事了。」³¹

蔗農組合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團結在一齊和資方談公平收購甘蔗的條件，以及蔗農間互相研究耕作改良方式。任務單純，沒有超出體制外的運動和想法。

蔗農組合所編的甘蔗歌，很能代表李應章社會關懷的胸襟和蔗農心聲：

³¹ 〈蔗農組合的準則如何？〉《台灣民報》，大正十四年六月十一日，第三卷第十七號。

種作甘蔗無快活 風台大水驚到大
燒沙炎熱也得行 一點蔗汁一點汗
咳哟哟 有蔗無吃真壞命

甘蔗咱種價咱開 公平交易才應該
行逆搶人無講價 將咱農民做奴隸
咳哟哟 舍人甘心做奴隸

蔗農組合是咱的 同心協力救大家
兄弟姊妹相提攜 不驚青面和獠牙
咳哟哟 出力得合齊得合齊

今村義夫不認為二林蔗農組合的訴求有政治因素，他覺得只是在要求增加甘蔗收購價格。二林蔗農組合後來會有政治傾向，這也是資方對蔗農的要求處理不當，蔗農不得不提高層級，向官方陳情。因此，官方對農民的訴求是不以等閒視之，否則恐怕步俄羅斯農民反政府的後塵：³²

「本島蔗農的運動、集團的進行的、而且具備農民運動形態的、是大正十二年末的對林本源製糖的二林庄蔗農民的甘蔗收買價格增家要求的運動。爾來至今日、雖有二三地方蔗農民的買收價格增加運動、或是對於等級制買收價格的反對運動總是勿論哪個運動、他們的原因無不在經濟的理由的。然最近二林庄農民對林本源製糖的買收價格增家要求運動、由那結果之何如漸漸的會呈現政治的色彩的傾向、這是不可開却的事情了。」

「那俄羅斯農民對貴族所做的經濟運動、因為官憲的對貴族保護和農民抑壓、逐煽起農民的反政府熱、至於惹起政治革命的流血慘事、像這樣的事情是不

³² 〈蔗農組合的準則如何？〉《台灣民報》，大正十四年六月十一日，第三卷第十七號。

妙的、所以台灣的蔗農民運動、已經變成對官廳的請願運動、使事太容易誘至複雜紛糾之域的傾向 的今日、官憲的態度是最要公明正大的。」

二林蔗農組合提出的改善要求請願有四點：

一、將原料代價提高和鄰接會社同樣的買收價格、或是二、依法分糖、或是三、以會社、農民、和官憲、三者的合議、來決定收買價格、或是四、撤廢原料區域、承認原料的自由買賣。³³

這四點請願要求，前三點都是純粹的經濟要求，只有第四點稍微帶有政治的性質。而第四點的目的，其實也是經濟性質，只不過為經濟目的，不得不觸犯到殖民統治的政策。其實，只要符合前三點的任何一點，就沒有第四點的困擾。因此，二林蔗農組合的成立，還是一種在體制內對殖民統治不公平對待蔗農的抗爭運動罷了。雖然有被殖民的民族意識覺醒的況味，但沒有逾越殖民統治的行政框架。

李應章第二階段的抗爭，是加入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鬥爭。自 1932 年李應章到廈門參加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的白區做地工，就和國民黨展開鬥爭。尤其 1945 年日本敗戰以後，國共鬥爭加劇，李應章扮演的角色更吃重。李應章會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他剛到廈門的時候，看到國民黨統治大陸的腐化，引起他的反感。他跟台灣老鄉張水松談論的一段心聲，很足以反應他的思想狀況：³⁴

「在籌備神州醫院期間，台灣老鄉張水松經常來幫忙，我們一有空閒，就談起台灣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還談到國內形勢，對紅軍、對國民黨的看法，當時我表露追求共產黨而不得的心思，-----。」

李應章的第二段鬥爭型態，前一段是在國民黨統治的白區，主要是為中國共產黨的生存與發展，在和國民黨暗鬥；後一階段是為消滅國民黨解放台灣，而在中共領導下對台輸送地工而鬥爭。

李應章的第二階段鬥爭，主要是以行醫做為掩護，為共產黨員提供醫療、隱

³³ 〈台灣農民運動〉《台灣民報》，大正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三卷第十五號。

³⁴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頁 14。

蔽、情報蒐集等工作。

不論是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的鬥爭，李應章醫院的經營都有聲有色，非常成功，賺了不少錢。在第一階段台灣時期的鬥爭，李應章被關期間醫院火災全燬，但他出獄後僅兩年時間，就重建被焚毀的醫院，醫院還蓋得壯觀漂亮。而在第二階段，他向台灣文化協會的老朋友林木土借了 500 圓，在鼓浪嶼開辦神州醫院，到轉赴上海開業，短短幾年間，他能以醫院掩護工作，以醫院所得支援地下工作經費，又能購置房產，醫院事業開展得非常快，其致富的能耐很厲害。

因為李應章有錢是事實，謝雪紅在整風運動時就曾指控李應章是資產階級，逼得李應章把自己賺錢買的泰安路療養院的地產捐了出去。

2010 年筆者到廈門找李克世，李克世對這一捐贈的事情還忿忿不平。據他估計，此一房產目前的價值超過一億人民幣。而這是李應章辛苦賺錢幹革命的節餘錢，花了二十根金條購買的地產，也是為革命工作所需，掩護了許多地下黨重要人物，如上海市第一任副市長荻秋、北京衛戍司令溫玉成、新四軍師及地籍高級幹部、台委會組織科長王錫珍、作家田漢等等，謝雪紅逃離台灣後也在那裡躲藏過。³⁵

綜觀李應章的抗爭過程，從家庭教養的民族主義出發，有意識的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去關心弱勢蔗農，抗爭的對象是日本殖民當局，做的是體制內的改革運動。到了中國大陸，理想性的民族振興，使他在偶然機會參加了共產黨的活動。不過，觀察李應章於 1934 年 11 月離開廈門，直到 1937 年抗戰開始，才又展開活動的過程，李應章參與共產黨對抗國民黨的腐化積極性顯然不夠。對台灣內部體制內改革要求也失去興趣。這三年期間，他專注於事業的開展，有了成就。不過，抗戰開始，李應章再起鬥爭的民族精神表現，卻也反映了知識份子難能可貴的民族大義。可是，經營事業三年，對台灣日本殖民當局的抗爭，以及反國民黨貪汙腐化的鬥爭都停擺，暴露了知識份子的隨機搖擺的特性。這一點他和翁澤生及謝

³⁵ 李克世，《台灣醫生李應章》，頁 322。

雪紅專心投入革命，義無反顧的革命家精神有所不同，反而貼近林獻堂的資本家彈性作風改革手段。

第二節 翁澤生

翁澤生從小的家庭教育和環境都有民族主義與大中國思想氛圍，一生都在中共領導下，從事中華民族復興的奮鬥。他是堅貞的中國共產黨員，也是大中國主義者。

一、翁澤生的身分背景

翁澤生出身於商業區，父親是為人作嫁的店員，是勞動階級，不同於李應章的資產家境。

翁澤生的父親翁瑟士，福建同安縣溪邊村人，生於 1861 年 6 月。二十世紀初，中國軍閥混戰，苛捐雜稅，漳泉一帶人民紛紛渡海來台，投奔早年遷台的鄉親。翁瑟士也帶著弟弟和幾個鄉親來台北大稻埕的“鴨寮街”，定居在同安鄉親多的永樂町十八番地。

這是一條經營南北貨、乾果、茶葉的商業街道。由於翁瑟士在同安老家曾在安溪茶商經營的茶葉行當伙計，熟悉茶葉經營門道。來台後很快就被家附近一家由同安人合開的“發記”茶行聘為茶師。一年後，已四十出頭的翁瑟士經人介紹與小他十六歲，生於 1877 年 3 月的鄭水河姑娘結婚。1903 年 10 月 14 日，翁澤生就誕生在俗稱“鴨寮街”的永樂町二丁目十八番地。³⁶

由於陳少白與良德洋行司帳楊心如³⁷都在大稻埕的貴德街一帶活動，談論時局與政治在所難免。小時候的翁澤生討人喜歡，大家都叫他“阿澤”³⁸，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耳濡目染長大，讓他從小就聽過許多日本統治台灣的殺戮事件，無形中灌輸

³⁶ 何池，《翁澤生傳》，頁 3。

³⁷ 1897 年孫中山派陳少白到台灣進行革命活動，秘密組建興中會台灣分會，會址就在大稻埕的貴德街，負責人楊心如。主編邱錢牧，《中國政黨史》，頁 21。

³⁸ 王萬得談翁澤生。1984 年 8 月 16 日肖彪等採訪王萬得實錄。《翁澤生傳》，頁 3。

他反抗的精神。

翁澤生聽了很多抗爭故事，但大部分都是以前的歷史，雖然也有很深的同仇敵愾感受，但總不如在翁澤生十歲的時後發生的“苗栗事件”。³⁹這一事件被捕被殺的有翁澤生認識的叔叔、伯伯，⁴⁰所以感觸特別深。

翁澤生上太平公學校，原名大稻埕公學校，創立於1898年。在公學校六年的學習，奠定了翁澤生日語和漢語的基礎。由於有漢語能力，方便他回祖籍繼續升學，使得他吸收馬克思主義學說更為方便，並進而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的日語文基礎，讓他及早在日文報刊看到了蔣介石有意發動“四·一二”⁴¹的清共消息，讓共產黨員有隱匿與撤退時間。

1915年7月9日的西來庵事件，日軍屠殺村民的慘狀，刺激了翁澤生的民族意識，使得他在學校舉行的“六·一七”始政紀念儀式上和同學鄭石蛋、高兩貴、胡柳生、周和成等同學，拒絕按規定喊“日本帝國萬歲”，並且在課堂上不以日語回答，終於發展成為聞名台北的“太平公學校事件”。

1920年夏天，翁澤生自太平公學校畢業，其父原本安排他進實業學校，學習實用技術，以後好養家活口。但翁澤生沒有興趣，剛好翁澤生的六叔帶來老家浔尾大社有一「過番」⁴²新加坡華僑陳嘉庚⁴³兩年前回鄉創辦了集美中學，免學費又辦得不錯。這季剛好又增加秋季招生，翁澤生就回祖籍升學，邁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同安位於泉州、漳州、廈門三地中心地帶，隸屬泉州府，管轄範圍北至著名

³⁹ 苗栗起義事件 事件背景 在中國漢民族的覺醒，反滿清帝王統治的辛亥革命遂告成功，並改元民國（一九一二年）。中國的革命成功，對台灣抗日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啟示作用及影響。羅福星住新竹廳苗栗，他在台北、基隆、桃園、新竹等地準備發動抗日。因事蹟不密，未起義前已被徵破，被逮捕兩百餘人。

⁴⁰ 何池，《翁澤生傳》，頁7。

⁴¹ 1927.4 蔣介石即將發動反共政變，4月3日國民黨右派在福州召開“擁蔣護黨大會”，新編第一軍二師五團一營黨代表方毅在台上與之理論被殺害。接著，四月九號廈門總工會負責人羅揚才和楊四寧被捕，四·一二中國國民黨清黨活動正式展開。

⁴² 「台灣諺語」：「過番」，指古時候到外國做生意或打仗。大約在三百多年前，唐山的生活很辛苦。天災人禍不斷，百姓被生活所逼造反。一些人為了要生存，為著要過較好的生活，所以決心要離開唐山，到新的地方去開創新天地，面對不可知的未來，他們用一種很樂觀的態度來面對。

⁴³ 陳嘉庚福建同安人 1990年僅17歲的他飄洋過海到新加坡創業，成為東南亞著名的橡膠大王。

茶鄉安溪，東至泉州南安，西連漳州、長泰，南接廈門，濱臨東海。翁澤生 1920 年 7 月初已在同安集美中學註冊⁴⁴，隨即跟著採購茶葉的父親回到廈門轉坐帆船到潯江灣東溪雙溪碼頭的溪邊村，阿澤的父母經常提起的故鄉舊居“溪邊街 25 號”。

集美中學的老師有許多著名專家學者，有孫中山的戰友胡漢民、朱執信，著名學者魯迅、馬寅初、蔡元培、林語堂等。翁澤生進集美中學就學之時，正好是“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集美中學延聘自北京的學者帶來北京學生痛懲賣國賊，逼迫北洋政府拒簽《巴黎和約》⁴⁵，導致從日本與德國手中收回青島和膠濟鐵路主權，讓翁澤生深受感動，萌生更強大的中國主義思想。

集美中學允許學生自由討論各種思想、思潮、主義。1919 年“五四”運動前後，各種進步思想、西方社會思潮已在學校傳播，許多思想在此碰撞，翁澤生也在此環境中完成思想與學潮的洗禮。當時的學生對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有興趣，翁澤生也對這兩種主意有進行認真的比較。最後，翁澤生還是傾心於馬克思主義。⁴⁶

由於集美中學學風及各種思想資訊的灌輸，圖書館各類藏書雜誌的滋潤，翁澤生的革命理念快速成長。尤其在 1922 年 10 月，《集美周刊》登載了中學四組學生顏玉潤的一篇文章：“倒不如去做和尚好”，引發全校師生的迴響討論，讓翁澤生受益良多，使得人生日地的眾多學說，有更明確的輪廓，祛除了許多模糊觀念，奠定了人生方向。

⁴⁴ 集美中學由遠赴新加坡創業開闢橡膠園有成的同安人陳嘉庚所創。1913 首創集美兩等（初等、高等）小學。1918 年 3 月 10 日又在集美大肚創辦集美師範和附屬於師範的集美中學。學生免費入學，是當年少有的興學。

⁴⁵ 1919 年 1 月，美、英、法、意、日等 27 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政府派代表出席會議，並提出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取消“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收回山東主權等正當要求，遭到帝國主義的拒絕。5 月 4 日下午，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朝陽大學、民國大學等 13 所學校的 3000 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

⁴⁶ 翁澤生傳頁 20。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紀工人運動實踐基礎上而創立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主要以唯物主義角度所編寫而成。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包括三部分，即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分別是馬克思、恩格斯受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創立的。

進入上海大學以後，在瞿秋白主持的社會學系，翁澤生通過學習馬克斯基本原理的教育，學習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私有財產及國家起源、社會科學主義課程，全面了解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⁴⁷此後，翁澤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一直受到瞿秋白的領導和影響。

二、翁澤生抗爭史

翁澤生的抗爭歷史，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是民族主義的對抗；二是籌建中共共黨組織，為中共反國民黨而努力。

〈一〉太平公學校事件

翁澤生在集美中學的學習和思想粹煉，終於在台北“太平公學校事件”和創建台北青年會活動展露頭腳。

1923年7月30日，太平公學校舉辦歷屆畢業校友同學會，翁澤生、洪朝宗、高兩貴、鄭石蛋等商量好去參加，要藉機宣傳文化協會宗旨，翁澤生並首先上台演講，以台灣人應講台灣話的語言問題，以及介紹集美中學自治會組織所標榜的同學會應有自治權的理念，引發同學們的高度興趣。由於日籍校長上台制止日本當局認為的“不穩言論”⁴⁸，引發與翁澤生、洪朝宗、高兩貴、鄭石蛋等人的口角衝突，導致會場陷入混亂，日籍校長趕緊宣布散會。台灣總督府立案偵查，稱之為“太平公學校事件”。⁴⁹

〈二〉台北青年會

因為“太平公學校”事件，萌發翁澤生組織“台北青年會”作為文化協會指導下的青年團體念頭，並得到蔣渭水的支持。翁澤生在向蔣渭水報告“太平公學校”事件的第二天，就在蔣渭水家舉行會議，商量創會事宜，通知到會的有30人，文化協會核新人物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蔣渭川、許天送等人也參加。

⁴⁷ 何池，《翁澤生傳》，頁47。

⁴⁸ 凡攻擊政府或宣傳主義，或者散布未經當局核准的言論，日本當局稱之“不穩言論”。

⁴⁹ 王思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篇》，頁327。

因為台北青年會屬文化協會下屬組織，日本當局認為台北青年會在“言論過激”的文化協會幹部領導下，恐怕誤導青年前途，而根據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 2 項，下令禁止結社。⁵⁰

〈三〉台北青年體育會

翁澤生等人不甘青年會未能辦成，在蔣渭水於 8 月 15 日為返回集美上課的翁澤生、洪朝宗等人送行的餞別宴上，約定要以另一方式繼續活動。後來，高兩貴、鄭石蛋、楊朝華等人以“專事提高體育之目的”于八月底成立台北青年體育會。翁澤生與洪朝宗則於中秋節學校放假回台北，與蔣渭水商量後用另外名譽將青年會改為“台北青年讀書會”獲批准。後來，讀書會與青年體育會在文化協會讀報社內聯合設立事務所。不久，讀書會又被取締。寒假回到台北的翁澤生與蔣渭水商量對應方法，決定改用“台北無產青年”名稱取代“青年讀書會”。

〈四〉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

春節過後翁澤生、莊泗川、洪朝宗返回集美，找到廈門大學的李司禎、王慶勳、同文書院的許植亭、中華中學的江萬里、郭丙辛、英華書院的肖文安等商量成立“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1924 年 4 月 25 日，閩南學生聯合會假廈門長受學校操場舉行成立大會，並研究創辦《共鳴》雜誌，翁澤生推薦莊泗川、張治中共同負責刊物編務。1924 年初春，台北無產青年舉辦打破陋習講演會，日本警察禁止開會，並拘禁在場講演的高兩貴、胡柳生、黃成枝等人。日本總督府對此一講演會的評議記載是“借詞打破舊陋習，實則從是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宣傳”。

翁澤生就在台北無產青年會舉辦講演會被禁止後，於 1924 年 6 月，從集美中學畢業，進入廈門大學念書，開展另一階段的共產主義洗禮和革命事業。十月，翁澤生在校園圖書館《民國日報》看到一則上海大學招生啟示，他被啟示的內容所吸引，決定轉學到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的前身是私立東南師範專科學校，校址在閩北青雲路。上海大學是

⁵⁰王思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篇》，頁 329。

國共合作初期由國民黨創辦，共產黨支持的一所培養革命人才學校，於 1922 年 10 月 23 日正式成立，于右任當校長。

〈五〉日人殘殺同胞雪恥會

1924 年 5 月，上海日本紗廠工人抗議日商紗廠聯合會無理取締工會，紗廠工人舉行罷工，工人顧正紅被槍殺，八個工人受傷。翁澤生參加中共地委組織的“日人殘殺同胞雪恥會”、紗廠工會舉行的顧正弘烈士追悼大會，參加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地委聯席會議決定組織的講演隊，上街向群眾講述工人顧正紅被日人槍殺真相，宣傳上海學聯提出的懲辦、賠償、收回公審工廩、取銷領事裁判權、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等。⁵¹此次紗廠工人抗爭事件，最後演變出五卅慘案的發生。翁澤生和洪朝宗在中共黨中央的支持下回到台北，向台灣青年學生介紹‘五卅’運動情形，激發台灣學生、工人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翁澤生則因經歷五卅鬥爭的考驗，於 1924 年 7 月底獲准成為中國共產黨員。

〈六〉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非基大同盟

1925 年 12 月 20 日，翁澤生、蔡孝乾、洪朝宗等人組織了“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翁澤生並踴躍參加上海“非基大同盟”。一年之後，翁澤生在漳州省立二師開展學生運動，也從“非基”運動開始。台灣文化協會決定 1927 年 1 月 3 日召開臨時理事會，改組文化協會，翁澤生在漳州與台灣籍同志研究，促使文化協會左翼化的具體對策。⁵²1927 年 1 月，翁澤生聲援國民政府收回漢口租借的遊行示威。之後，翁澤生在漳州又蘊釀了打擊土豪劣紳的活動。1927 年 4 月，翁澤生從一份日文報讀到一則“蔣介石即將發動反共政變”的新聞，讓共產黨有時間準備避難隱藏。

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決定由翁澤生協駐台共建黨工作，中共江蘇省委通知翁澤生，將由吳碧玉（謝雪紅化名）直接和他聯絡。11 月 16 日，翁澤生與謝志堅在上海閘北青雲路恒業里 23 號迎接到吳碧玉，並由吳碧玉傳達—創建台灣共產黨

⁵¹ 何池，《翁澤生傳》，頁 57。

⁵² 何池，《翁澤生傳》，頁 104。

的任務。⁵³

〈七〉讀書會

1927年11月下旬，因為日共中央一定要謝雪紅到日本討論成立台共問題，謝雪紅臨走前帶翁澤生見“國際赤色救援會”成員朝鮮人旅運亨，台共建黨經費就由翁澤生直接找旅運亨，由翁澤生負起更大的建黨任務。為了盡快培養台灣共產黨所需要的幹部人才，在謝雪紅赴日後，翁澤生擔任起組建“讀書會”的重任。1927年11月底，“上海台灣青年讀書會”在上海閘北天庵源源里成立。成員有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左派青年江水得、揚金泉、林松水、劉守鴻、張茂良、陳粗皮、黃和氣、陳氏美玉等人。⁵⁴

在翁澤生的主持下，讀書會機關報《屋內刊》於1928年1月出版。《屋內刊》在發表讀書會會員學習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體會及學習文章，宣傳台灣革命運動發展情形及有關信息動態，向在上海的台灣革命青年散發。翁澤生一邊在讀書會培養人才，一邊也寫信給在台灣的蔡孝乾及在廣州的王萬得到上海，共同籌化成立台灣共產黨事宜。

因為蔡孝乾要返台當《新台灣大眾時報》記者，無法參與台灣共產黨建黨籌備，翁澤生請他回台以後聯系洪朝宗、莊春火、林日高、莊泗川等人，要他門派一個人來上海參加台灣共產黨籌備工作。蔡孝乾又推薦在廈門已經參加中共共青團的潘欽信到上海，翁澤生也同意了。這也使得翁澤生在上海有很多班底，成為台灣共產黨建黨的人才庫。

〈八〉台共一大籌備會

1928年2月上旬，謝雪紅偕同林木順、陳來旺由日本東京回到上海後，在翁澤生住所召集會議，傳達她和林木順在日本草擬台灣共產黨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草案情形，並正式成立“台共一大籌備會”成員有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王萬得、謝志堅、潘欽信、陳來旺。

⁵³何池，《翁澤生傳》，頁144。

⁵⁴何池，《翁澤生傳》，頁147。

1928年4月14日，台灣共產黨成立預備會議，以“台灣共產主義者積極分子大會”名，在翁澤生住所舉行。參加會議的有謝雪紅、翁澤生、林木順、謝志堅、林來旺、林日高、潘欽信以及讀書會的張茂良、劉守鴻、楊金泉及中共代表彭榮⁵⁵。

〈九〉台共成立代表大會

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租界霞飛路（金淮海中路）與羅勃神父街（金瑞金路）交叉口的金神甫照相館樓上召開，出席的有中共代表彭榮，朝鮮共產主義者代表呂運亨，林木順、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謝雪紅、翁澤生。⁵⁶翁澤生在會上宣讀了他起草的《青年運動提綱》。提綱內容分“台灣青年的痛苦與其革命性”、“國民革命過程中青年運動的戰略”、“關於共產青年團之促進”、“青年運動當前的任務”、“口號及宣傳鼓動”五部分。⁵⁷

1928年4月20日上午，台灣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在謝雪紅住處召開，出席者有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這次會一任務是繼續討論修改工人運動綱領，審議通過《台灣共產黨成立宣言書》，選舉委員長，進行委員分工，翁澤生被派駐上海與中共中央聯系。

〈十〉中共中央巡視員、全國總工會秘書長

“四·二五”事件謝雪紅、張茂良、劉守鴻、林松水、楊金泉五人被捕，重創剛成立的台灣共產黨。緊接著又發生“二·一二事件”，許多農民組織和文化協會中的台共黨員和優秀幹部被捕。繼之在日本又發生“四·一六事件”，日共重要幹部多人被捕，日共中央喪失了指導台共的能力，台共不得不直接在國際共黨和中共中央的指導下開展工作。翁澤生原本就是負責在上海與中共中央聯系，現在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又成為共產國際遠東局聯絡員，雙重身分不但加重身上的責任，後來也成為台共內部發展的矛盾。⁵⁸

翁澤生在指導台共開展活動的時期，又接受中共江蘇省委派遣參加上海工會

⁵⁵ 鄭晶瑩，《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愛國主義情操》。何池，《翁澤生傳》，頁154。

⁵⁶ 《警察沿革誌》，頁590。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62（翁澤生沒有參加，參加者雖血九人，但人名只有八個）。何池，《翁澤生傳》，頁157（有翁澤生參加）。

⁵⁷ 何池，《翁澤生傳》，頁158。

⁵⁸ 何池，《翁澤生傳》，頁196。

聯合會的工作，又是東京《新台灣大重時報》駐滬特約記者。1928年6月上旬，翁澤生與林木順籌畫在滬台灣學生反對六·一七始政紀念日的鬥爭計畫。1931年11月，翁澤生又奉派中共中央巡視員，赴兩廣省委開展工作。之後，翁澤生奉派全國總工會黨團擔任秘書長。1933年3月4日，翁澤生被國民黨逮捕，經法庭鬥爭轉送台灣。翁澤生於1933年3月中旬被遣返台灣後被關在台北監獄，是日本台灣當局1931年6月以來，展開對台共大搜捕最後補獲的要犯。

三、翁澤生的抗爭思想

翁澤生的反抗思想則有兩大支撐，一是中國歷史特性形成的中華民族統一觀；二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人生觀。

中華一統的觀念有其獨特的「天下中心」或「中華一體」的表現。中國人承襲了所謂的文、武、周公的道統，成就了內外有別的華夷觀，亦即以中國力量所形成的天朝體制（Pax Sinica）的思想。台灣居民大多來自中華道統的福建、廣東，承襲的是中華文化。因此，在日治時期，翁澤生的祖國觀讓他忽略了台灣文化發展的重要性，自然要以中華一統的華夷思想觀念，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在對台灣共產黨的認知上，也要擺在整個中華體系的國共鬥爭來看，不可能讓台灣共產黨的台獨思想創黨宗旨，另豎一幟無限期的延續。

翁澤生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人生觀，是他在集美中學，經歷了當時各種思想的碰撞和學潮的洗禮之後的選擇。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馬克思主義強烈的革命進取精神，感染了翁澤生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時代觀的基本觀點，是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終究會被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所取代，時代的每一次轉換都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

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⁵⁹

因為馬克斯時代觀的革命進取精神，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前景，鼓舞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鬥爭意志和勝利信心。翁澤生在動盪屈辱的時代，在教學領域開放的集美中學，受到來自當時學術精英魯迅、蔡元培、林語堂、胡漢民、朱執信等的影響，走上了馬克思革命人生觀的道路。

翁澤生的思想養成，可分家庭教育、集美中學的思想碰撞、上海大學受瞿秋白影響等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如果沒有中華文化的牽絆影響，就會像沒有根的浮萍，找不到施力點。由於有了中華文化這個黏著劑，翁澤生的革命人生努力才有標的。

家庭環境是翁澤生接受中華文化薰陶的最先也是最重要地點，翁澤生幼年經常聽到父親翁瑟士的朋友陳少白，良德洋行司帳楊心如談到發生在台灣的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故事。翁瑟士在回答好奇的翁澤生問題，也會趁機灌輸祖國論的大中華思想：

「我們台灣自古是中國的一塊寶地，是被‘四腳狗’在戰爭中強行占領的，台灣人要反抗，‘四腳狗’就要殺害反抗他們的人。」

「中國在哪裡？為甚麼會輸給‘四腳狗’？台灣人都反抗‘四腳狗’他殺得完嗎？」

「中國是我們的祖國，管中國的政府在海那邊的唐山，那是一片非常非常大的美麗土地。」⁶⁰

這種故事和消息，以及父親樸素形象的語言，在幼小的心靈裡，播下了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反抗日本侵略的種子。

翁澤生是其家族移民的第一代，對祖國的想像還很深。尤其他的父親，交往的最好朋友陳少白是孫中山派到台灣秘密組建興中會台灣分會的人，楊心如則是興中會台灣分會的負責人。在這樣環境長大的翁澤生，在祖國文化洗禮改造後走

⁵⁹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 275。羅文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新論》，頁 24。

⁶⁰ 何池，《翁澤生傳》，頁 5。

向改革之路，再自然不過了。

集美中學的校訓是“誠毅”，即忠誠祖國、剛毅頑強。這一愛祖國、愛家鄉、愛學校的思想教育貫穿在課堂教學中，成為集美學校的教育主線，促使學生萌發愛國主義思想。

翁澤生處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秋的時代，又有愛國主義的薰陶，加上集美中學是一個允許自由討論各種思想、思潮、主義的寬鬆言論環境，以及集美中學學潮的社會鬥爭實踐的磨礪，翁澤生的共產主義思想得到進一步的養分。在這樣的環境裡，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集美學生最感興趣的討論題目。翁澤生到底如何和同學討論無政府主義，已經無從得知。不過，經歷了思想的碰撞，翁澤生最後選擇馬克思主義。

翁澤生選擇馬克思主義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俄國十月革命為勞苦大眾帶來的翻身的實踐意義；二是同學的一篇“倒不如去做和尚好”的文章引發的討論。

由於當時的中國社會苦難與俄國一樣，俄國革命後的社會改革成功，替馬克思主義做了最好的宣傳和說服力。所以，列寧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也影響了翁澤生的方向：

「無政府主義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這種思潮，在無產階級奪權前，直接破壞工人運動和暴力革命，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是對無產階級的反動。」⁶¹

由於有這麼一段無產階級思想的辯證，翁澤生後來還被謝雪紅指控是無政府主義者。

將翁澤生的思想凝聚，並且化為行動，是“倒不如去做和尚好”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是翁澤生同學顏玉潤於1922年10月刊登於《集美周刊》第38期的一篇文章。其大意是：

「想來想去都不得人生真正目的來，現在雖然求不出真正目的來，我卻相信

⁶¹ 何池，《翁澤生傳》，頁20。

一天不脫離世界，就是在那裡和那些鬼頭鬼腦、爭奪權力的人一塊無趣的生活-----簡直就是倒不如去做和尚好！」

這篇文章引起的正反討論，釐清了翁澤生人生目的的觀念，翁澤生認識到頹廢退縮解決不了問題，改變不了社會現狀而積極走向革命的道路。

翁澤生到了上海大學，跟隨他仰慕已久的老師瞿秋白學習和工作，才奠定他一生的革命人生。

上海大學創立於1922年10月23日，1923年秋天，瞿秋白從蘇聯回國後，被陳獨秀派遣到上大擔任教務長。社會學系是1923年設立的學系，鄭中夏、瞿秋白希望上大在社會科學方面獨樹一幟，而以馬克思思想武裝學生。翁澤生是於1925進入上大社會學系，在社會學系有系統的學習馬克思主義。

由於黃仁事件⁶²後瞿秋白遭受通緝，瞿秋白已經不在學校任教，轉入地下工作。但瞿秋白回校的一場演講，卻深深影響了翁澤生。自此而後，翁澤生在瞿秋白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也在瞿秋白同意下改變了台灣共產黨的領導和方針。

第三節 謝雪紅

謝雪紅一生所表現的堅韌性、鬥爭性，應該是來自於她早年悲慘生活經驗的磨練。因為悲苦生活體驗，讓她更嚮往公平社會和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政治體制。只是，身為女性，在女性意識才剛抬頭的20年代，又沒有受過教育，要在思想鬥爭與政治行動詭異多變的年代，掙脫男性沙文的鄙視，台灣地位的困境，達到他的理想政治目標，本就是很難的志業。

一、謝雪紅的身分背景

由於謝雪紅的養女身分，對台灣的殖民環境感受和傳統習俗對婦女的壓迫，

⁶² 黃仁事件發生於1924年10月10日，是國共和合作革命統一戰線早期內部鬥爭的反應。何池，《翁澤生傳》，頁92註9。

有更深的感受和迫切改革的願望。

謝雪紅誕生於台灣經濟的轉型期，經歷傳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社會的改變陣痛。由於自身的出身背景經歷，謝雪紅體驗了台灣下層社會的巨大苦痛與不公不義，更是備嘗台灣婦女在傳統社會的弱勢和卑微。這些親身體驗，讓她在社會變動的洪流中，更能體會社會必須改變的因素，知道台灣社會躍動的發展方向，導引她終身為下層社會利益著想的社會運動坎坷道路。

謝雪紅的祖籍福建同安，她的父親謝匏生於 1857 年。因為家貧，謝匏在年幼時跟隨祖父、伯父渡海遷徙到台灣，在鹿港登陸後定居在和美附近的新埔地方墾荒務農。謝雪紅 1901 年生，在家排行老六，取名「假女」。其父已在她出生前搬到彰化，改當搬運工人。

謝雪紅六、七歲時就要幫忙做飯、送母親幫日本人洗的衣服，還要帶小弟泉吉，幫日本人帶孩子。大約十歲時，謝雪紅每天除了幫忙家事、做飯、洗碗、餵豬、檢柴草、種菜外，主要是敲林頭絲的工作。11 歲那年，謝雪紅的父親病了，家裡沒錢，不得不把剛滿 17 歲的二姐送給台中後龍仔的年約 60 歲左右地主。不久，謝匏去世。隔年，謝雪紅母親也去世。為了還母親的喪葬費債務，謝雪紅被賣身還債，當了台中洪家的童養媳。

謝雪紅的養父洪仔喜原本是種田人家，但有文化，漢文不錯。她被洪仔喜以 160 元買來當童養媳，準備將來許配給養父的大兒子。謝雪紅到洪家以後工作非常忙碌，養母對她非常虐待，17 歲時謝雪紅就逃離洪家，回到彰化兄長家中。後來，又由兄嫂做主以 320 元賣給張樹敏為妾，隨張樹敏到日本神戶、中國青島、上海等地經商，見識了 1918 年日本「米騷動」⁶³、以及青島人抵制日貨等前所未見的震撼。1921 年離開張樹敏，謝雪紅進入勝家縫紉公司，隔年和她的三嫂合作開設嫩葉屋裁縫店。受到「臺灣議會期成同盟」蔡惠如、林幼春被判刑入獄盛況的感召，自此而後謝雪紅就常去聽臺灣文化協會的演講。1925 年 6 月間，由安存真、

⁶³ 楊克煌註米騷動，《人民日報》，1972.4.3。

宣中宣介紹，謝雪紅在杭州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⁶⁴。同年8月，黃中美到上海謝雪紅住處宣佈謝雪紅已是共產黨員。⁶⁵隨後進上海大學社會科，受業於瞿秋白、鄧中夏、張太雷等，10月底奉中共中央派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共黨革命理論與實際鬥爭方法。

1927年10月，謝雪紅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奉國際共黨命令回國組織臺灣共產黨。1931年的全島大逮捕，瓦解了台灣共產黨在台灣的努力，謝雪紅也被捕入獄，象徵台灣整個抗日運動的終止。

二·二八事件謝雪紅以武裝鬥爭對付國民黨政權，失敗後潛逃出臺灣，在香港組織臺灣民主聯盟。1951年至1957年的宗派之爭，隨後的文化大革命，延續著台灣人的內鬥，重創謝雪紅的身心，她終於病倒，被送進北京隆福醫院，診斷為肺癌末期，於1971年11月5日1點30分病逝。

二、謝雪紅抗爭史

貧困出身養女命的謝雪紅，她的抵抗人生又和資產階級出身的李應章大不相同，也和擁有堅強中華民族觀的翁澤生差別很大。

謝雪紅出生於貧困的農工家庭，她由不識字的養女，走向對抗日本殖民主義的道路，進而成為臺獨的燈塔，被視為一代奇女子。其人其事，見證了她的獨特身影。

活躍於日共和國共兩黨統治下的謝雪紅，有說她是抗日英雄，有的說她是台獨運動的領袖先驅、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徒，或是陳儀眼中的暴徒。其實都是，但非觀察謝雪紅的全貌。謝雪紅的根底，就在於他對不幸社會環境的救贖，是她善心與兼愛，又能不怕困難，以社會主義為理想，力求上進的表現。

謝雪紅一生精彩，她一生面對了窮困的家庭、傳統社會不良舊習的制約、社會環境大變動的衝擊、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層面的對抗、中共內部鬥爭的影響。她

⁶⁴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 台魂淚》，頁177。

⁶⁵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 台魂淚》，頁180。

的抗爭過程可分為四個面向觀察：

〈一〉女性意識

謝雪紅小時候家庭環境不好，爸媽盼望生男以增加生產力，改善家庭經濟，可是卻生個「假女」謝雪紅這個女娃。她的父親在世時全家都還稱她「假女」而不名，可見得父母原本希望她是男嬰，不料大失所望，只好以「假女」名之自欺。

⁶⁶重男輕女存在謝雪紅那時候的社會，也影響了許多家庭的想法。

謝雪紅的父親生病時欠了很多醫藥費，家庭收支也不平衡，就把剛滿十七歲的謝雪紅二姐賣給台中後龍仔的六十歲左右的大地主江仔笑。不久，謝雪紅的母親也死了，家裡又借了許多錢辦喪事。因為，鄰居和家人都認為母親生了那麼多孩子，應該給她辦一個像樣的喪事。

但是，喪事辦過之後，向別人借的錢還是要還。謝雪紅口述這麼說：⁶⁷

「沒有別的辦法，家裡唯一可變賣的、值錢的東西只有我，於是家人就在我身上打主意了。那時我剛過十二周歲，前六年間家裡養我，後六年間我為家裡勞動、掙錢。可是，此時我也不能埋怨兄弟們，她們也是不得已啊！按照舊道德觀念來衡量，賣身葬母——也是合該的。唯一要控訴的是那萬惡的舊社會，勞苦人民才會遭遇到這種賣身的事，而且在出賣身體以後，還要遭到更悲慘、更長期的苦難。想到父母剛亡，主觀上我是不願意脫離這個家庭的，但此時此刻我的事竟不能由我拿定主意了。」

此時的謝雪紅是不甘願、無奈，但又無能為力的。她的思想裡有舊道德「賣身葬母」在支配著她必須配合家裡兄弟的無奈，但又不甘心舊社會這一套吃人的倫理，而又僅能控訴舊社會對勞苦農工的剝削，物化女性的不平等。

雖然舊社會的規範壓抑著、逼迫謝雪紅不得不思考著「賣身葬母」的舊社會倫理。不過，謝雪紅的心還是不甘，是有反抗這種以女性抵債的荒唐事想法。因此，在她的母親死後沒幾天，當有人要買她當養女的時候，她反抗了，而且短暫成

⁶⁶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頁 23。

⁶⁷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頁 64。

功了。謝雪紅特別提到舊社會養女的社會環境：⁶⁸

「當時，臺灣的“養女”有幾種情況：第一種是買來真正當自己女兒的，和自己親身女兒一般看待，有錢的人也會栽培她上學等，長大了也給她出嫁。這種養女大都是在出生幾個月就抱來養的，通常不讓孩子知道誰是她的生家父母。第二種是完全買來做工的，一般稱為查某嫻仔，長大了也讓她出嫁或招婿，都是為了賺錢為目的；第三種是前述兩種的綜合。」

謝雪紅雖然娓娓道來這段「把女性當物品買賣」的可惡社會，以表露對「舊社會」這種傳統鄉愿觀念的鄙夷，但她的行為又是積極反抗的。所以，她大哭大鬧，聲言寧願投井自盡也不從這門親事。只不過，她還是擺脫不掉「賣身葬母」嫁人為妾的命運。

一段謝雪紅的自述最能表現她內心對舊社會的控訴了：

「因為他們的經歷和遭遇也反映了萬惡的舊社會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之罪惡事實的一部分，可以作為寫我的歷史的一部分社會背景：同時也算我替他們對人吃人的舊社會的一種控訴吧！」

還沒有受過教育啟發的謝雪紅，雖然感受到社會的病態，也想要反抗社會的不平。但是，她的力量是微弱的、無力的。眼看著辛苦工作的勞動階級，全都瀕臨無法生存的可憐境界，受到資產階級的嚴重剝削，但卻無力反抗。婦女更是沒有社會地位，只是社會的工具，或是男性沙文主義下的物品、情慾和生殖的道具。謝雪紅痛恨，但又不敢怪罪家中兄弟，她把責任推向舊社會的罪惡。

還有，只因為生養多，就要厚葬的習俗觀念，全然不顧勞動家庭生活的艱難，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事，謝雪紅有不屑，但也有受到儒教忠孝節義的影響，以致無法處理的困擾。這樣的舊習，卻又要女性付出身心代價作為平衡，謝雪紅有不平之鳴，但也只能認命。

只是，謝雪紅終究是不平凡的女性。她的人生際遇，讓她學習，讓她成長，

⁶⁸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頁 64。

最後，終於讓她打破欺壓女性不平等和舊社會的桎梏。為了解放家鄉天空開，為窮苦農民勞工爭取應有的生存環境，謝雪紅在眼界大開，有了思想和接受教育以後，開始她不平凡一生的反擊，為了理想而奮鬥的人生。

〈二〉民族的覺醒

「本島人」是一種現代國家觀念下，帶有公民權利及種族意涵的觀念。它相對於「內地人」（「日本人」）的一種身份。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因為現代國家的發展，有了範圍較大的文化團體、以及以整個台灣為單位的（本島人）觀念產生、甚至有更大的國家想像和認同。這些現代性的新認同雛形，對二戰後的台灣的社會發展有相當重要影響。

日本將台灣帶入現代國家的發展與社會分歧的轉化有下列幾個步驟：

- 1、1895年日本開始統治台灣後，帶入現代國家領土、主權、公民的觀念與法律制度。1895至1915年「西來庵事件」為止，日政府逐步將武力收歸政府，日本政府也嚴禁民間分類械鬥。這些措施使得原先強化人群分類（團體衝突時的動員）的重要機制再也無法發生作用。
- 2、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人口與土地作了精確的統計和丈量。在人口統計上，日殖民政府以「種族」的分類區分台灣的住民。主要分類內地人、本島人、外國人，使得以往的漳泉、嘉應惠州潮州之分，漸漸被較大的閩粵之分取代。
- 3、日治後斷絕台灣到中國之例行途徑，要求人民必須在兩年內決定是否遷回中國，增加了人民對台灣的適應和投入。台灣社會也在日治時期由典型的「移民社會」慢慢轉變為「定著社會」。「地緣認同」慢慢取代「族籍」關係或認同。

謝雪紅生於日本殖民初期，台灣的社會的分裂關係已經在日本現代化統治下有所改變，本島人的認同感在不知不覺中生根。其實，這也要歸功於謝雪紅年輕時沒有上過傳統漢學私塾，在小時候的成長過程中，沒有受到太多中華文化洗禮，卻生活在改變中的日本殖民社會，養成本島人生命共同體的印記。

1920 年以後，台灣受到世界民主思想、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影響，促成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進一步的經由文化協會的活動啟蒙，逐漸由本島人觀念，再伴隨著日本同化主義、皇民化運動而進化升級，奠定了「台灣民族」初級信念。

69

1922 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的蔡惠如和林幼春被判刑入獄，謝雪紅從人群衝出去和蔡惠如握手，並說：「妳們為台灣三百萬同胞，太辛苦了，……，敬佩得很。」⁷⁰ 這時候的謝雪紅，顯然已經沾染了台灣民族意識，邁向民族覺醒的道路。

〈三〉文化的衝擊

中國儒家文化與天朝思想為發展的中華文化，對於謝雪紅這樣的貧困家庭，作用力不大的原因，在於移民社會的窮困人家，原本求生存的本能勝過原鄉的文化羈擾。從台灣移民社會的進程觀察，貧苦農工移民，為日常生活的操持已經費盡心力，更無多餘的財力與時間，從事原鄉的文化活動。事實上，像謝雪紅的父祖輩，在原鄉的經濟狀況就很差，生活都過不去了，經常吃白薯過日子，沒有受過教育，被中華文化薰陶的機會少。就算是移民台灣第三代的謝雪紅，還是文盲，她說：⁷¹

「我家的兄弟姊妹都沒有上學的機會，全是文盲，只有二姐買了幾本《三字經》、《昔時賢文》、《千字譜》等來跟潘厝有學問的人學一些字，但也只是念冊歌式的。小時候我也跟二姐瞎念“昔有文賢，宜爾以孫”、“蘇州婆，假有心，假有意，用薑母，擦目屎”等冊歌。」

直到 1921 年，她還為沒有受過教育時這麼說：⁷²

「想當這樣的職業婦女對我來說最困難的一點是自己沒有文化。我未曾進過學校，到離開彰化時，只跟日本人學了幾個日本字，在石頭攤時代同樣沒有甚麼

⁶⁹ 施正鋒，〈台灣民族主義〉，頁 38。

⁷⁰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頁 148。

⁷¹ 《我的半生記》，頁 34。

⁷² 《我的半生記》，頁 143。

學習的機會。到這個時候，自己還未曾拿過筆在紙上寫字。」

因為家貧所以沒有機會讀書，謝雪紅的出生和成長都只有在地的生存勞動經驗。所以，她以後學習新知的回饋，就在於她的本土環境，這也是一種土著化的效果反應。⁷³

1919年，一張白紙的謝雪紅到了日本神戶，經歷了與她柴米油鹽的困苦日子截然不同的生活震撼「米騷動」事件。⁷⁴四月的青島行，遇上中國正展開五四運動，聽到了學生們介紹了一些俄國十月革命的情形：⁷⁵

「他們給我們看了一些俄國革命的照片和圖繪。他們說，俄國的工人、農民和士兵起來打倒俄國皇帝，又推翻了反動的臨時政府，終於取得革命的勝利；如今，俄國工人、農民不再受壓迫和剝削了，每一個人都過著自由幸福的生活。我聽了他們講這些生動的故事，又看了一些真實的相片，感動極了。自由、幸福的生活，這是我多麼渴望的社會啊！」

在剝削的資本殖民統治下過生活的謝雪紅，對俄國革命工人、農民翻身的描述特別感同身受。原本只是在舊社會中無法掙脫無知枷鎖的謝雪紅，一下子開朗起來，還跳躍式的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洗禮，改變了她的生活態度，引發了她的自主意識。

已經具有自主意識的謝雪紅，就像一塊海綿，當她遇到學習的機會，豈肯放過。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文化協會的活動包括：一、會報發刊；二、設置讀報社；三、舉辦各種講習會；四、開辦半夏季學校；五、文化講演會；六、文化化劇運動；七、「美台團」放映社教電影。謝雪紅因當了職業婦女，又拚命幹活上報受到林獻堂、楊肇嘉的注意而認識。後來受到蔡惠如、林幼春被關的感召，謝雪紅一有機會就去聽文化協會的演講，逐漸了解台灣，受到台灣文化初步的薰陶。

所謂的文化，是與人民的思考、理念、價值觀、世界觀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謝家在1870年代才移民台灣，她的父親是移民第一代，還在艱困過著打拼的生活

⁷³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土著化。

⁷⁴《我的半生記》，頁128。

⁷⁵《我的半生記》，頁130。

中，她小時候的印記，僅屬於小西街成長地的經驗。由於她沒有受過教育，她的價值觀、她的思考都是在地的體驗。在她的口述中，就有許多移民社會的台灣特有或較多發生機會的案例：

「在台的客(客家人)福(福念河，即河洛人、閩南人)人之間，以及漳泉人之間的械鬥激烈，促使遷台的福建人大多是同鄉、同姓聚居在一起以策安全，尤其在鄉下。」⁷⁶

「我十三歲被賣給台中洪家當童養媳時，他們都叫我素蘭，這個名字是我養父洪喜給的。」⁷⁷

「我六、七歲時，在附近孩子們中已是一個頭頭，扇紅仔牌仔、造屈仔都不認輸，也喜歡欺負那些富戶人家的孩子，他們都比較笨。」⁷⁸

「恰巧那個時候，彰化城迎媽祖，人家叫我去裝藝。」⁷⁹

「1907年，母親最後生了泉吉，他出生後幾個月就被賣給楊家做養子，我常到楊家同他玩，有時也背他回家，直到他與楊家人熟了。」⁸⁰

「當時一般的台灣人都認為替日本人買東西就是要賺他們的錢，這可能是對日本人的一種反抗和報復心裡吧！因此，木匠落屋(才千ヤさん)每次叫我替他買煤油、酒時，我大多少給他買一點，以變賺他一點錢，如叫我買一毛錢酒或煤油，我就只給他買八分錢，從給他的錢賺兩分錢；但是，如果叫我買「敷島或朝日」香煙時就無法賺錢了，因為它有一訂價格。」⁸¹

「我七、八歲時，大兄被徵去當壯丁，發了一套壯丁服、一頂帽子、一雙腳綁。……。當年壯丁的主要任務是地方發生火災時去救火，遇到水災、地震時去救災，萬一人民發生暴動時也會被抽調去協助警察鎮壓人民的反抗。」⁸²

「替日本人背孩子的時候，我學會了簡單的日語，他們還教我幾個日本字，

⁷⁶ 《我的半生記》，頁 16。

⁷⁷ 《我的半生記》，頁 34。

⁷⁸ 《我的半生記》，頁 35。

⁷⁹ 《我的半生記》，頁 35。

⁸⁰ 《我的半生記》，頁 39。

⁸¹ 《我的半生記》，頁 43。

⁸² 《我的半生記》，頁 48。

我用小竹枝在地上學習寫，這是我學一點文化的開端。」⁸³

「我十一歲時，由於父親生病的醫藥費和蓋房子等等欠人家錢，使得家中負債累累。加上為了維持生活，聽了媒人的介紹，家裡就把剛滿十七歲的二姐賣給台中後龍仔的一個地主，名叫江仔笑。他是一個年紀比我父親還大、近六十歲左右的人。」⁸⁴

謝雪紅的童年往事，環繞著的都是台灣移民社會的特有現象，生活往事都是台灣的特殊環境經驗。台灣是她生命的根源，原鄉只不過是想像，在拚搏的社會低層環境求生存，是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空間留給空幻的中華文化浸潤。

開啟智慧之門以後的謝雪紅，僅僅接受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薰陶，顯然不夠，謝雪紅盼望受教育的心願日深。為了受教育，她結束嫩葉屋的營業，跟隨張樹敏到上海。可是到上海後，張樹敏一點也沒有要謝雪紅去念書的想法。所以，她回台以後就積極賺錢，準備日後有機會自己到中國念書。

兩次的上海行，讀到書的機會其實不多，僅有在上大的短暫四個月學習，這對於一個幾近文盲，剛自台灣來的女孩，是否能夠吸收課程，顯然大有疑慮。⁸⁵因此，她在中國的學習，只有共產革命的震撼，帶給她的收穫多。

謝雪紅的中國學習，從歷史分析，只能算是政治的啟蒙，加強她對共產國際社會政策的嚮往。真正讓謝雪紅紮實的學習，充實她的文化內涵和共產革命理論與實踐，是俄國東方大學的學習訓練。她說：⁸⁶

「到日本班後，東大才發給我們學生證，還去領了筆記本等文具用品，開始正式上課了。筆記本每年發給好幾次，兩年間，我領到許多筆記本。上課時，看到許多同學都拚命做筆記，我不會做筆記，也懶得做，又擔心比人家落後，所以，上課時就拚命注意聽課。結果，我這辦法很好，因為東大兩年間未曾舉行過筆試，都是老師平時在課堂上隨時叫同學起來口答的。這樣一來，老師能馬上掌握學生

⁸³ 《我的半生記》，頁 46。

⁸⁴ 《我的半生記》，頁 57。

⁸⁵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39。

⁸⁶ 《我的半生記》，頁 209。

們對他的教學理解了多少，又可即時測驗出個別學生的理解程度和實在的學習成就。做筆記反而不能集中精神聽講，且做了筆記依我看來過後也很少有人再去翻閱。何況，筆記也不能帶回本國。不過，我不做筆記使我寫作和認字的能力不能進步，一輩子我就吃這個虧。」

謝雪紅的台灣文化洗禮，就因為東大課程的共產國際理論給予的台灣殖民地獨特性而增強。台灣因被日本殖民，所以，謝雪紅在東大的學習歸屬日本班。畢業時接受國際共黨的指令，是要成立台灣共產黨，建立自由、自治的台灣國為目標，這也增強了謝雪紅的台灣文化獨特性的認知，強化了謝雪紅的台獨傾向。

謝雪紅出生於貧困家庭，其父祖輩來自於窮途末路之鄉，其原鄉文化僅保存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任何教育的增強，很快的在移民奮鬥中產生土著化，融入台灣特有的氣息。謝雪紅的年幼成長世界，聽到的、看到的都是她在彰化小西街生活的點滴，原鄉只是貧困移民的祖輩傳說，還不是記憶。

不只是出生環境的台灣特有氛圍影響了謝雪紅的台灣心，在成長的社會體驗，包括日本的「米騷動」、在青島感受到的「五四運動」、參加五卅慘案抗議的刺激等等，全都讓他想起台灣的處境，強化她的台灣心。她說：⁸⁷

「在杭州這段期間很短，又因我沒有甚麼革命工作的經驗，且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擔負重大工作的責任。但此時的我真像一隻剛從籠裡飛出來的鳥，能在空中自由地飛翔，獲得機會傾吐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等舊社會壓迫、剝削的痛苦，因此，我毫無拘束地、毫無顧忌地、盡情地喊叫啊！衝啊！覺得無比痛快。」

後來，謝雪紅在東大的共產國際的革命理論學習，解放各民族理念的灌輸，讓她更確立了「台灣民族、台灣文化」的獨特性，使她願為台灣共產黨的創黨綱領「台灣獨立、台灣自治」奮鬥終生。

〈四〉夢斷中國

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組之武裝抗暴失敗後潛逃離開台灣，投向中國，希望藉

⁸⁷謝雪紅、楊克煌，《我的半生記》，頁 173.174。

中共解放台灣，幫她實現台灣自治的台灣獨立願景。這時的她還看不出中共會違反國際共黨的政策，會在 1949 年以後不再支持台獨主張。只是，中華文化大一統的本質，讓謝雪紅依靠中國的想法失敗了，也賠上她下半輩子的淒慘。

比較謝雪紅在國共「重慶談判」後的政治訴求⁸⁸、《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草案》，謝雪紅的政治訴求雖然還環繞著台灣的民主自治，但已明顯的向當權的中共靠攏。只是，謝雪紅的台灣民主自治底線，還是觸犯了統一論的中共主張，使得她的下半生過得淒慘。

在國共「重慶談判」後，她在與人民協會成員李喬松的辯論上說：「台灣人民唯一的出路是實行自治，而且要高度自治。上自省長，下至區長、鄉長都要普選，要台灣人民自己治理台灣。」⁸⁹高度自治的主張，仍是台灣共產黨創黨的理想，謝雪紅在這個時候，還是堅持台灣民族的獨立自主。

不過，在 1947 年 11 月發佈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第一條：「設立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新中國。」以及 1949 年 9 月 23 日，台灣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謝雪紅在中共一屆政協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就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所說：「只在綱領草案第十二條中所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選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我就覺得非常滿意。⁹⁰」這時候的謝雪紅，顯現出的無可奈何態度，她不得已的在政治撤退，以及技術上隱約的妥協，背離台共建黨綱領的表態，已經註定台共走向末路。

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以後潛逃到中國，其中心信仰從台共建黨時的台共“政治綱領”中提出的“台灣獨立”，以及「重慶談判」後的「台灣人民唯一的出路是實行自治，而且要高度自治。上自省長，下至區長、鄉長都要普選，要台灣人民自己治理台灣。」，漸次退到「設立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新中國。」從這一過程看當時的時空背景，清楚點出台灣共產黨革命的重心，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已從台灣本土遷移出走。在中共背離國際共黨創立台

⁸⁸ 1945 年 10 月 10 日國共在重慶簽訂(雙十協定)。

⁸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210。

⁹⁰ 徐宗懋，《二二八事件第一主角謝雪紅》，頁 86。

灣共產黨的原始指示，也違反中共當初協助台灣獨立的精神後，謝雪紅等台共人員到中國寄人籬下，不得不遷就妥協的悲哀。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成立，代表高唱台灣自治的謝雪紅，在遠離台灣本土後，對解放台灣的無力感和必須依賴中共政治力量的掙扎。1948年6月，香港會議的召開，在李應章領導的上海同鄉會，以及蔡孝乾在島內領導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等兩大股代表中共勢力進逼下，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台灣民族』這一台共政治主張的精神意涵上敗退。對於台灣的前途有這個說法：「參與會議者同謝雪紅等人討論台灣前途與命運，他們一致認為不存在所謂『台灣民族』，台灣只有兩個前途：其一、和大陸同時解放；其二、國民黨繼續盤踞台灣」。⁹¹可悲的是香港會議以後，謝雪紅也陷入自己的中共黨齡經歷的辯論，台灣高度自治的主張，加入中共領導的意志。

自香港會議(決議文)的出現，已經點撥出謝雪紅舊台共的「台灣獨立」、「台灣民族論」與代表中共主張的李應章認為不存在「台灣民族」問題的衝撞與妥協。謝雪紅此後人在中國，受到中共政治勢力的影響，本身又無力突破台灣人的宗派及鬥爭路線的困頓，台獨的主張，也就只能以隱晦的方式，以接受中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寄託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普選方法選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⁹²的面紗，轉化成民主自治的方式，迂迴呈現台灣自治的台共主張。

可悲的是，當香港會議決議文淡化了謝雪紅台灣高度自治和台灣民族論，謝雪紅反抗力道，不但顯得蒼白，而且在中共的指揮下，台灣民主自治主張繼續堅持，必然干擾中共出面解放台灣的正當性，使得必須依附中共勢力才能解放台灣的謝雪紅，處境更是難堪。

香港會議決議文，檢討了日治時代的台共革命理論，批判了舊台共的政治綱領「台灣民族」論述，這是中共公然修飾，進而撕毀「台灣民族」論述的開始。

⁹¹ 余雲波、吳雲鄉、趙壽龍，《中國民主黨派史數略》，頁315-316。

⁹² 徐宗懋，《二二八事件第一主角謝雪紅》，頁86。

香港會議決議文指出：「民族的構成，是有共同經濟、共同地理、共同語言文學、共同意識型態，根據這些，台灣人民雖有和國內人民不同的特性，但還沒有形成一個台灣民族。」⁹³香港會議決議文以這樣缺乏說服力的論述，簡直是以霸道的方
式，否定了台灣民族不同於中國的可能發展，不但在肅立所謂中華民族的道統，
做為將來大一統的準備。近者，隱然已對舊台共成員提出在中共的領導，必須通
過的檢驗標準。其中一條檢驗標準「加入中共後，是否在毛澤東路線下為人民、
為黨工作？」⁹⁴更是謝雪紅的致命傷。

香港會議批判了舊台共的台灣民族理論，香港會議決議文總結正式取消了台
灣民族論的說法，建立了台灣與中國「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因此，原本以台灣
高度自治的台灣民族論為基礎的台灣民主聯盟，就得開始加強「中華民族」的論
述。就連原本主張台灣民族論的蘇新，也在 1949 年發表(談台灣解放問題)，重新
調整見解。他提出三個新的看法：⁹⁵

一、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灣人民也是中國民族。

二、台灣的社會特質，雖有某些程度之差，但基本上還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
的社會，這點和中國其他任何省份都沒有差別。

三、因此，台灣解放鬥爭也是與整個中國革命一樣，必須完成反帝國主義，
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這三項。

台盟淪落至此地步，幾乎完全出賣了台灣共產黨建黨的精神，台灣的前途不
再能掌握在台灣人的手裡，身為舊台共與台盟創始者的謝雪紅，只能以夾帶的方
式，買賣在中共領導下的民主自治這一最後防線，其情堪憐。

1949 年 5 月，寫在光明報的一篇宣傳文章，將台灣的希望整個放在期待解放
軍的卑屈，更將台灣推向未知數的中共懷抱：「整個台灣人民已經聯成一條陣線，
為驅逐賣國政府，迎接新政權而努力。受盡逼迫而變成更加堅強的台灣人民，比
其餘的地方迫切的期待著解放，期待著自己的領袖謝雪紅帶來人民軍，解放這一

⁹³ 行政院法務部調查局，《台灣光復後之「台共」活動》，頁 33。

⁹⁴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332。

⁹⁵ 莊嘉農，〈談台灣解放問題〉，《光明報》，新二卷第十二期，(香港 1949 年 2 月 16 日)，頁 4。

塊被反動派殘害的土地。他們，向著海那邊的解放軍呼喚著：『快些過來，別忘了我們!』⁹⁶

自此，謝雪紅雖然不甘心台灣高度民主自治的台獨理想破滅，但時勢比人強，謝雪紅和她的台盟，在中共對國民黨軍壓倒性的勝利情勢中，只能選邊了。被選為台灣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謝雪紅在一屆政協會議上的發言，為台灣找到新的定位：

各位代表，各位來賓和各位旁聽先生們!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全國將要完全解放的時候召開了。真正的人民世紀開始了。中國人民做主人了，幾千年來的封建遺物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具就要送到故宮博物院去了。一切反人民的戰爭罪犯們將要送到人民法庭去受嚴厲的懲罰了。

這是多麼偉大的勝利呀!這是多麼光榮的史實呀!

這些勝利和光榮是由哪裡來的呢? 大家都明白，這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毛主席英明正確領導了全國人民起來作幾十年的革命鬥爭，特別是人民解放軍三年來英勇善戰而得來的。

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已經結束了封建買辦的國民黨反動統治，而中國人民已經建立自己的政府、國家的時候，全國人民所關心著的台灣，目前還被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勢力所統治著。在那裡反動派依然繼續著反中國人民革命的活動，而且還在勾結美帝國主義，並企圖阻攔日本法西斯力量要來破壞中國人民革命的果實。而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將近完全被消滅，美帝國主義侵佔台灣的陰謀活動也就更積極公開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被蔣美反動派所壓迫的台灣人民是在有史以來沒有過的水深火熱中過著極端恐怖、淒慘的生活，可是台灣人民已經認識了和覺悟了必須消滅反動派的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台灣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這次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已及由這個會議將要組織起來的中央人民政

⁹⁶ 周元，〈台灣是反動派的最後「軍事堡壘」嗎?〉，《光明報》，新三卷第五期，頁18。

府，將要宣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完全根據全中國人民的要求和利益而產生出來的。六百七十萬台灣人民，三百多年來反對荷蘭、西班牙、日本等異族的侵略壓迫，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封建買辦統治，不斷作流血犧牲的鬥爭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全台灣省人民完全擁護 這個由全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完全支持這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已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並完全同意這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在這個共同綱領中的每一條都是代表著我們的利益，所以我們不但應該遵守，而且我們為著這個綱領的全部實現，必須努力奮鬥到底。只在綱領第十二條中所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普選方法選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我們就覺得非常滿意，台灣人民的政治要求總結起來就是這個，僅僅這一條就有足夠的力量能夠號召台灣人民起來消滅反動孑的統治和擊滅美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陰謀。

現在台灣有著相當發達的工程基礎，有很多的各種工廠，物資豐富，生產力旺盛，鐵路、公路、電力相當發展，還有很多的技術人才和勤勉樸素的人民，一旦解放了候，是有著許多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有利條件，而對新中國的建設也可能有很大的貢獻的。而由於地理上的關係，為保衛中國國土，在國防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積極生產，積極支援前線，迅速解放台灣，解放全中國。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全台灣省人民，包括二十多萬少數民族的高山人民，向大會表示對這三個文件的完全同意，同時負責傳達給台灣人民，組織他們一齊來遵守，並為這個共同綱領的實現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發展，台灣的解放是很快了，要建立一個民主、康樂、模範的新台灣也很快就會實現了。」⁹⁷

謝雪紅在一屆政協會議上的發言，歸納有幾個重點：

⁹⁷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謝雪紅發言〉，《人民日報》，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一版。

一、台灣共產黨沒有了。

二、台灣民族論沒有了。

三、為中國的建設，出賣了台灣的資源。

當謝雪紅的這篇發言，等同於表示她已經被中共收編，台灣共產黨的努力和理想，已經成為明日黃花。這也是謝雪紅政治方向的分水嶺，在台灣革命情勢無法由台灣人單獨努力掌控的時候，顯露出謝雪紅機會主義的人格缺陷，她的革命精神喪失殆盡了，讓人看到的是依附當權派的可悲。自此之後，謝雪紅失去了台灣自主獨立領袖的地位，變成是中共領導下的一顆棋子，這也註定她往後在宗派或路線之爭的悲慘命運。

從香港會議以後，逐漸失去台灣主體論述的謝雪紅，在國共戰爭反轉，謝雪紅客居中國，脫離台灣本土戰場，台灣戰線落入中共指揮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的手中，加上中共朝鮮戰爭失利，解放台灣的時機喪失，台盟的活動被限縮在中國境內，台盟內部的權力之爭，在主客觀環境都變化後，無可避免的會發生。在客觀因素上，在台盟內部爭取出頭，以能代表台盟參加以中共為首的政權，成為將來台灣解放後的台灣重要領導，是台盟內部紛爭的因素。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召開一屆政協會議，依照政協籌備會的規定，台盟可以派五個正式代表，一位候補代表。台盟推出的五位代表是謝雪紅、楊克煌、李偉光、田富達、王天強，以及一名候補代表林鏗生。⁹⁸這六個人是以甚麼標準產生，是不是謝雪紅以當時台盟主席的身分所做的決定。當時有許多人自認有資格入選，蘇新就很不服氣，茶壺裡的風暴開始醞釀。而入選的人，除了李應章不是謝雪紅系統的人、田富達屬台灣高山族代表，楊克煌、林鏗生，甚至王天強都和謝雪紅關係匪淺。這樣的人事安排，在韓戰還沒有爆發，中共攻台還有希望，謝雪紅人氣正旺的時候，自然沒有問題。可是，一旦時機轉變，謝雪紅就有成為標靶的可能。

⁹⁸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史〉，頁 391。

蘇新在香港時期撰寫過許多反蔣、反美、反台獨的文章，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做過很多事，但卻未入選台盟推出的政協代表之列，他已經很憤怒了。中共建國初期要在外交部成立日本科，原本在中央統戰部工作的蘇新，受到組織重用，周恩來因而屬意蘇新出任日本科科長，但因謝雪紅反對，讓蘇新記恨終生。他在回憶錄說：

可惜出任日本科科長的事，因謝雪紅極力反對而不成，對這點，她大概是驚〔怕〕，她沒有本事，她是一個女孩子，也無讀冊〔唸書〕，也無受甚麼教育。在工作能力上、事業方面要勝過我，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共產黨的環境下把她造成什麼主席〔台盟〕，大家可以接受；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並不是說她有什麼能力。我可以當日本科的科長，她要當什麼日本科的科長呢？這是不可能的。再說，我能當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的一個組長，她能當什麼呢？她是可當台盟的主席，公開出來講幾句話，這樣子而已。這樣子也很好，她做表面的事情，我們做實在的事情。她要是好好做，而我也是擁護她的，她又何必呢？那麼驚，向這個說壞話，向那個說壞話，報告過來，報告過去，搞得亂糟糟的，從那時開始我才……。⁹⁹

謝雪紅身為女性，加上早年失學，在傳統觀念中，男性知識份子在內心中會自然流露鄙視，本來就不是能讓男性輕意服從。謝雪紅在領導統御若再稍有差弛，客觀環境變化了，被鬥的情況就會發生。

韓戰結束以後，中共解放台灣變成長期目標，中共轉趨閉關自守，注意力轉向國內。1952年的整風運動，為台盟的茶壺風爆提供熱度。其實，台盟的茶壺裡的風爆，是可以停留在悶燒的階段。只是，有兩個關鍵讓這隻茶壺避免不了爆炸。一是台盟於1949年遷到上海，謝雪紅聽到部份同鄉反應同鄉會會長一職自1946年以來都未改選，謝雪紅力主重新改選，得罪了會長李應章；其二是自謝雪紅於二二八離開台灣後，台灣的解放工作轉到蔡孝乾領導的省工委，但他在1950年初被捕了，而且涉嫌投降國民黨，引發蔡孝乾系統的恐慌。

⁹⁹ 蘇新口述，蔡福同整理，《蘇新回憶錄》，《台灣與世界》，第六期：（紐約：1983年11月），頁37。

在朝鮮戰爭前，台盟內部就有台灣解放後，蔡孝乾可能擔任「省主席」的風聲。因此，擁護李應章(已改名李偉光)比擁護謝雪紅好，「因為李應章是蔡孝乾的親信。」¹⁰⁰。蔡孝乾的被捕和投敵，引起的政震撼自然非常大。以致於至今的蔡系，包括李應章的次子李克世，一直都還不認為蔡孝乾投敵的說法¹⁰¹，反而指是國民黨惡意的反宣傳，蔡孝乾是被捕逃脫後被槍殺。可見蔡孝乾的投敵，對蔡系的影響有多大。

整風運動開始的時候，台盟總部的權力結構，謝雪紅還稍佔上風。屬於謝系的有謝雪紅本人及楊克煌、林鏗生，蔡系的有李應章、王天強(原本屬於謝系)。田富達採取中立的立場。蔡系在台盟總部的力量佔上風。可是，整風運動是由中共中央主持，中共派浙江省委沙文漢(張登)來台盟主持整風。張登歸饒漱石系統，當然支持蔡系。這條由浙江省常委張登、台灣工作委員會副秘書王錫珍、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李應章組成的反謝雪紅路線，指控謝雪紅四大罪狀：「第一、她的思想不純正，這是指她的『高度自治』主張;第二、她有官僚獨裁作風，影射她在領導上的『家長作風』與『個人英雄主義』;第三、她有貪污劣跡，指她收受台灣同鄉的『賄絡』;第四、她庇護壞份子，亦即她提出的『台灣無漢奸論』」。¹⁰²整風運動株連到謝雪紅的許多支持者，包括台盟總部及各地支部負責人，謝雪紅一度氣急病發，心臟病發作住進醫院，從此失勢。

謝雪紅整風運動時被鬥垮，涉及到台灣人內部的權力之爭，也就是謝系與李應章(蔡系代表)之間的權力爭奪。1950年初蔡孝乾在台灣被捕以後，台灣島內盛傳台灣解放後謝雪紅或李應章可能當台灣的領導，這也是台盟內部風爆的根本原因。

然而，整風運動又是中共中央所主持，謝雪紅的「台灣民族」所延伸的「台灣高度自治」，已經抵觸改變立場的中共中央「祖國統一」主張。謝雪紅在中共

¹⁰⁰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400、432。李玲虹，《台灣寧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下冊，頁102。

¹⁰¹ 中共台灣工委地下交通站——上海四明里偉光醫 劉青石口述 李湧 整理。

¹⁰² (鄭鴻溪先生口述歷史)。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426。

領導的土地上，在統獨的主張上與中共派的李應章等蔡系相抗衡，謝雪紅權力被削的結果早已註定。

三、謝雪紅的抗爭思想

謝雪紅自小的人生困境，成就極為強韌性的抵抗思想。

小時候的謝雪紅，受到舊社會觀念的影響，也是家庭環境逼迫，五、六歲就要洗碗；六、七歲要做飯，還要幫日本人帶孩子，還到處找人家幹活的地方看工人幹活，特別喜歡看木匠幹活，當木工問我要不要他們的鉋花：「我只好像螞蟻拖蒼蠅一般地，把一大籃鉋花一步一步拖回家。」¹⁰³十一、二歲時去工廠，做敲林頭絲的工作，也會沿街叫賣箭粿。謝雪紅小時候為了貼補家庭開銷做了很多事，就是一天也沒有上過學。

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反叛個性。當她的母親去世，辦喪事的債務成為他們家的難解課題。

謝雪紅年記小，受到舊禮教的影響，也把自己當「物」看待自己。不過，她還是心有不甘。當家人真正要把她賣掉，讓她去當人家的養女，謝雪紅的反叛個性出來了。她大哭大鬧堅決反對，聲言寧願投井自盡也不從這門親事。

一個才十二歲的小女孩，只因為家貧被賣當養女，而且還是賣身葬母，這在當時的舊社會並不突兀，她竟然以投井自殺這樣激烈的手段抗爭，謝雪紅不自覺表現反叛錯誤的舊社會行為，已可窺見她後來走上改革社會的影子。

不過，若是沒有機會和歷練，雖然有潛藏的勇氣和正義也是沒有辦法發揮。就如謝雪紅所說：

拒絕到賴家當養女之事，因我的堅持而勝利的告吹了，可是我何嘗知道這是我一輩子命運的轉捩點：當時如到賴家當養女，做一個普通婦女了結一生，很可能就不會遭遇其後十年不幸的折磨，也不會來參加革命，更不會有謝雪紅這個名

¹⁰³ 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47。

字和今天的我。¹⁰⁴

當不成賴家的養女，還過不了一個月時間，謝雪紅就被賣給洪家當童養媳，給了她一個鬼婆婆，把她折磨得幾乎自殺。命運開了謝雪紅一個玩笑，讓她還是被賣給人家，而且情況更不好，以至後來她鼓起勇氣逃跑了。

這時候是謝雪紅的思想轉捩點，也是她不平凡命運的開始。在她逃跑以前的生活，她說：

洪家處境漸漸地惡化，也漸漸地把瞻仰他家和他小老婆家的生活重擔大部份壓在我的肩上了。當時，我還不曾聽過任何革命思想，何況我的腦海裡還充滿著許多封建觀念，例如女人的三從四德呵、我是被賣的呵、命運呵等等。自己還未能覺悟，只是聽任命運的擺佈的，又自認被賣給洪家當童養媳，唯有忍受那舊社會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了。¹⁰⁵

謝雪紅由洪家逃出來以後，她又遇上一個「採花蜂」張樹敏，隱瞞已婚的身份，請人下聘，娶謝雪紅回家當妾。不過，由於張樹敏的關係，謝雪紅跟隨著她到日本、青島，後來又有機會到杭州、上海的機遇，啟蒙了謝雪紅的思想新知，孕育了革命的行動。最後，終於讓她走向東方大學，邁向她可憐、可悲、可嘆、可敬又不平凡的人生。

謝雪紅的人生，自 1901 年出生到 1919 年，她的際遇，可說是台灣傳統社會婦女地位的縮影。謝雪紅家庭赤貧，自六歲起謝雪紅就在台中街頭擺香菸攤。十二歲她的父母因病相繼去世，十三歲被騙去當台中干城町商人洪喜的兒子洪春榮的妾。十六歲謝雪紅跑到台南帝國製糖廠做女工，在那裡認識了張樹敏，兩人相愛而成婚。因為張樹敏的關係，謝雪紅於 1917 年到過日本，這時候的日本正處於大正民主時代，思想開放、言論自由，左翼思想也日漸高漲，打開了謝雪紅的眼界和機遇。¹⁰⁶

1921 年謝雪紅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正式參與了政治活動，她以洋服店為護身

¹⁰⁴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65。

¹⁰⁵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79。

¹⁰⁶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34。

符，從事婦女運動。

張文環著的「閹雞」¹⁰⁷小說，女主角月里悲慘的婚姻，正是描寫謝雪紅生長的年代，其實也反應那一代婦女地位的低落與可悲。謝雪紅不同於月里的是 1920 年以後，她以她的聰慧和勇於面對逆境的態度，為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為國家社會，無視個人的生命安危，犧牲奮鬥開創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1945 年至 1947 年的戰後初期，謝雪紅仍然保持政治的敏感度，在台中組織政治團體。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謝雪紅放棄會議桌的假談判¹⁰⁸，主張台灣應該高度自治。她認為台灣這塊土地只有台灣人才能治好¹⁰⁹。因此，她採取武力抗爭的手段。她的再起，為台灣獨立自主的主張，輸入歷史可貴的一頁。

謝雪紅於 1921 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從事婦女運動。她在台灣時期，由於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的關係，她在政治思想與行動上已有訓練。因此，她後來到上海能夠很快加入「五卅」運動的抗爭，開創她不平凡的一生。

謝雪紅出身貧困又不識字，這和組成台灣文化協會的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以改良主義路線關切社會問題不同。尤其，1925 年 4 月間，謝雪紅二次到上海，在途經杭州與林木順會合時接觸了《新青年》、《先鋒》、《嚮導》¹¹⁰的思想影響，讓她找到了工農、婦女、貧困階級的翻身辦法，她的思想開始左傾。

謝雪紅雖然在中國的土地上接受思想的改造，並且和中共過從甚密，但她在進入上海大學以前，已經加入鼓吹民族自決，追求台灣獨立的上海「台灣自治協會」。因此，她雖然接受中共的領導，但更正確的說，她是藉由中共與俄共的培訓過程成就她的台灣民族自覺的主張。在此之前，她還只是一個學習者。

後來經歷了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¹¹¹、反右運動¹¹²，以及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

¹⁰⁷ 張文環著的《閹雞》小說，描寫上一代為生意交換下一帶女兒月里的婚姻。在家道中落的不幸婚姻裡，月里為掙脫傳統禮教的束縛，為愛而犧牲死亡，對傳統社會的控訴。

¹⁰⁸ 二二八事件後籌組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只不過是陳儀的緩兵之計。3 月 8 來的軍隊在基隆登陸後，軍隊就在各地展開鎮壓和屠殺。

¹⁰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23

¹¹⁰ 革命時期的布爾塞維克。

¹¹¹ 整風運動，一般又稱作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自 1942 年 2 月開始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根據地所發動的一場政治和文化的運動，持續了約 3 年時間。所謂的整風是指「整頓三風」，包括「反對

命¹¹³。她的生命力在內部鬥爭中消耗殆盡。最終，台灣高度自治的理想還是沒辦法達成，只能鬱抑以終。

小結

謝雪紅血淚交織的一生，有人以「台灣真女人 一代奇女 謝雪紅」¹¹⁴讚美肯定她；有人以「踩不死的野花：謝雪紅」¹¹⁵讚嘆她的堅毅；有人形容她是「雪地中綻放的血色之花」¹¹⁶；也有不同的政治團體，以「謝雪紅的悲劇」¹¹⁷做為謝雪紅一生的結論。謝雪紅在台灣歷史的光譜是怎樣一個人呢？或者可以說她是「以一生喚醒台灣意識」的台灣女性。

謝雪紅不是心甘情願走向革命的道路，因為移民社會與殖民統治的社會環境壓力，又是身為女性的傳統角色觀念，由於機緣巧合，讓謝雪紅經由環境的刺激而有機會反思自己的生存環境問題。因此，她的台獨主張，除了源於國際共黨的殖民地獨立觀點，更實際的是她要改變她所居住台灣的環境。

綜觀謝雪紅一生，最大的關注是台灣。雖然，她曾在五四的氛圍吶喊過祖國，但那是被殖民的台灣居民對祖籍地的稱呼，但不能解釋成謝雪紅的祖國情勝過對台灣的關注。台灣移民社會的在地化所形成的台灣認同，像生活般已經融入謝雪

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入股以整頓文風」。整風運動的實行，使毛澤東在黨中央的地位更為確立，也使共產黨對於幹部和黨員的領導更為有力。

¹¹²「整風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於1957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是在「整風運動」過程中又掀起了「反右運動」，前者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整風，後者主要結果是給中共黨外、黨內大量人員確定了「右派」身份。

¹¹³“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¹¹⁴ 周茂春，《歷史月刊》「台灣真女人一代奇女謝雪紅」，248期110傳奇人物。

¹¹⁵ 鄭義，《傳記文學》「踩不死的野花：謝雪紅」，98卷5期。

¹¹⁶ 詩懿琳、王宛蓉談汪其楨的《謝雪紅》「雪中綻放的雪色之花」，《台灣文學館通訊》，2011、9、28。

¹¹⁷ 國防部總政治部，《謝雪紅的悲劇》，1958年6月25日。

紅的身心。

而翁澤生的一生又和謝雪紅大不一樣，他完全在中華道統的氛圍中渡過。小時候的家庭環境，看的、聽的都是身為中華民族的屈辱和無奈。不論是小時候的反抗日本殖民台灣，還是長大後協助創建台灣共產黨、反抗國民黨白色恐怖，翁澤生都是站在中國發展的角度去看台灣問題。因此，翁澤生在台共發展史上，會不滿意有深厚台灣民族發展觀的謝雪紅，除了謝雪紅的女性身份、沒有受過教育的事實、領導路線的問題等，最重要的分歧，還是文化背景的衝突。

翁澤生的共產經歷都是在面對中國的苦難中，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以愛祖國為基礎完成，對於國際共黨推動的殖民地獨立觀念薄弱。對台灣的立場，曾經屈服於國際共黨的指導，而有一段時間認同台灣獨立的台共創黨宗旨。但不久之後，在松山會議以後，還是修改了台共的黨章，逐漸向中共的主張靠近，讓台共變成中共的下屬單位。

李應章雖然和翁澤生一樣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但他還具有資產階級成分，他的思想，又和翁澤生不同。他和貧困養女身分的謝雪紅，觀念和行為差距更大。

在台灣時候的李應章，因為資產階級的束縛，在政治認同上不得不暫時屈服於日本的統治。但在民族的覺醒，也因為家族的中華民族傾向而和日本統治者對抗。因此，在矛盾中他採取的社會改革方法，是體制內循序漸進的陳情，不是激烈的對抗造反。

但在中國時期，他扮演著的是中共的共產主義政治追隨者及資產階級商人的角色。他對共產主義有理想，但積極性不夠。他是**以醫生身分扮演了追求理想的角色，而非以革命者假醫生的角色去作生死的搏鬥**。兩者看似相同，其實有專業的革命者如謝雪紅和翁澤生，還有認同革命的追隨者的分別。

第三章 謝雪紅、李應章、翁澤生的革命路線

謝雪紅、李應章、翁澤生的革命路線到底有什麼不同呢？本文引用李應章的次子李克世所論「翁澤生、李應章與謝雪紅的矛盾」做為探討的基礎。

李應章次子李克世 1928 年生，先後畢業於淡江中學、彰化中學、廈門大學政治系畢業，是李應章子女中最早加入共產黨者，也是為李應章與謝雪紅的鬥爭辯護最有力者。他對謝雪紅由衷的鄙夷，反映了李應章當年在「整風運動」中的焦慮，為他們之間革命路線的不同，做出區隔。

鳳凰衛視節目〈冷暖人間〉於 2009 年 8 月 18 日播出有關李應章、謝雪紅歷史問題，李克世不能認同，而寫了一篇「試析臺灣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兩條路線鬥爭」郵寄給筆者（也介紹鳳凰衛視訪問筆者，鳳凰衛視有聯絡筆者，但後來又取消訪問），後來，李克世把這篇文章放在《台灣醫生李應章》¹¹⁸出版。2013 年 3 月 5 日，又以 E-mail 傳來〈謝雪紅的真面目〉通訊稿給筆者。這是李克世對他父親的了解所做的辯白，不見得完全對，但卻對兩條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之爭的分析有參考價值。

李克世認為李應章、翁澤生以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出身，有別於謝雪紅的“茶婆杆仔”出身。再以這樣的基本不同，演繹出他們的革命路線不同。

除了身分背景不同，李克世更抬出毛澤東的窮則變理論，區別了李應章、翁澤生和謝雪紅革命目的的不同：¹¹⁹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中有句名言：“窮則思變”讚頌農民運動，幾千年的農民運動，就是因勞苦大眾被殘酷剝削，過著貧窮生活，他們思變，理所當然。馬克思、列寧、孫中山的學說如此，也是為勞苦大眾翻身得解放，印證了“窮則思變”。但是，他們自己本身沒有一個是過著貧窮的家庭生活，為自己“思變”，而是想著窮苦大眾之所想，宣導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民族民主獨立的“三民主義”。」

「李應章為的是看到種蔗農民受到日本殖民當局重重剝削，過著貧窮生活，

¹¹⁸ 李克世，《台灣醫生李應章》，藍濤出版社，2011 年 10 月。

¹¹⁹ 李克世，《台灣醫師李應章》，頁 303-304。

為他們“思變”，組織夜校，分析日本殖民主義的苛刻剝削，勞苦大眾只有組織起蔗農組合，團結起來要回自身的民主權力、生活權益，絲毫不是為了自己，倒是自己貼了不少錢為農民鬧民主、要權益，是替農民“思變”。」

「謝雪紅也是“窮則思變”的。她賣身到富商家抵葬父債務，自稱出身於“茶婆杆仔”（台語：女傭），躍踞為天然的“無產階級。”由於不是為了主義真，自覺的改造、革命，在翁澤生、蔡孝乾、蘇新、王萬得、李應章等革命知識份子包圍之下，自卑有餘，只得依仗於共產國際的委派，“籌組臺灣共產黨”之桂冠，拉幫結派，以竭力保住其“當然領袖”地位。」

「不論是大者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孫中山等領袖人物，或是革命群眾中的傑出領導人物翁澤生、李應章，一個共同特點，革命不為個人而是信奉主義真，為革命前赴後繼」

第一節 革命方法與路線

由於基本背景的不同，李應章等三人的革命路線與方法也有差異。

一、翁澤生的路線

翁澤生在中共黨史上，截至目前為止，是唯一被寫入官方傳記的台灣抗日運動領導者。北京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與中華全國台胞聯誼會在北京舉辦的「翁澤生烈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座談」，對翁澤生做這樣的介紹：「翁澤生是台灣共產黨組建的創建者與組織者之一，我國工人運動的重要活動家。翁澤生祖籍福建同安，1903年3月10日生於台北市。早在少年時代，他就在台灣參加反抗日本殖民者的鬥爭。1925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他勇敢的帶領工人、學生和革命群眾進行反帝。1933年3月，由於叛徒出賣，不幸被捕。1939年3月光榮犧牲。」翁澤生是台灣抗日運動中最堅持中共路線的領導者，所謂的台灣意識或台灣共產黨的活動，以他的認為，都是包含在中共思想的指揮之下。

翁澤生的兒子翁黎光回憶說：「我的祖父翁瑟士為了抗日，為了讓子孫永遠記住自己是中國人，在 1921 年讓我父親回到祖家同安的集美中學讀書。父親在祖父的影響下，在集美中學接觸愛國的、進步的思潮，走上了抗日的、革命的道路，後來成為一個愛國志士和共產主義者。」這兩段的描述，清楚地說明翁澤生的中國意識有多強，以及他對中共的效忠有多堅定。

從這兩件重要的歷史記載，清楚看出翁澤生被突出的是中國共產黨員，台灣共產黨的身份，只不過是為他的中國共產黨身份加分而已。他的中國意識，在他求學中更得到充分的灌輸。

翁澤生的中國意識，一路由家庭、學校培養出來。翁澤生的幼年，就已接觸到族群意識的問題，更清楚自己來自對岸的大陸，知道台灣現在的統治者是外來政權，更聽說了許多殖民壓迫和台灣人反抗的悲慘經過。因此，翁澤生的心裡早已埋下復興中國的種子。所以，他後來走的是完全的中國路線，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卻是可以理解。正因為他有濃厚的中國意識，加上他在學校吸收了社會主義思想。因此，他絕對的效忠中共。翁澤生自小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主義，以及後來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在台灣共產黨的組織裡與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謝雪紅發生衝突，最後導致台灣共產黨的分裂。¹²⁰

翁澤生在創組台灣共產黨以前，就已經是中國共產黨員了，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幹部。1926 年 11 月上旬，翁澤生接受中共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的命令，帶著宣傳隊成員蔡孝乾、莊泗川、李曉峰、葉志堅到廈門找到中共廈門特支幹事學會部委員羅揚才，聽取羅揚才分析廈門地區的情資，宣傳隊被分配到漳州組建黨團組織¹²¹，之後，翁澤生又協助羅揚才成立中共閩南部委。中共閩南部委的成立，是中共閩南革命史上的大事，翁澤生襄助功勞甚大。

1931 年，在台灣共產黨被日警徹底破壞後，中共中央於 11 月初指示翁澤生培養的一批台灣青年，順利的將張梗、王天強、趙青雲派回台灣重建台灣共產黨組

¹²⁰ 陳芳明，《中國論壇》，「台灣抗日運動的左翼路線 以台共「上大派」主腦翁澤生為中心」，月刊號第 3 期，31 卷第 4 期，頁 29。

¹²¹ 何池，《翁澤生傳》，頁 99。

織。繼之，中共兩廣省委面臨嚴重局勢，翁澤生又奉命為中共中央巡視員，赴兩廣省委幫助謝啟泰開展工作。¹²²1931年12月28日，省委代理書記謝啟泰因省委特務隊長違反紀律被撤銷工作後叛變被捕，翁澤生緊急決定由陸更夫代理兩廣書記的決定，確保省委機關的正常工作。

1932年5月，翁澤生回到閩南，在廈門接獲中央通知要他趕回上海匯報，隨後調翁澤生到全國總工會擔任秘書長，協助陳雲。

二、謝雪紅的路線

謝雪紅和翁澤生雖然都在台灣出生，但是，兩人的家庭環境、人生經歷與所受教育的不同，其對台灣的關心，雖然有社會主義改革的共通點，但謝雪紅是站在台灣的土地與立場，以社會主義思考台灣的前途。翁澤生受到中華文化的薰陶，以中國立場的社會主義制度思考台灣的未來，兩者的出發點和看法南轅北轍，對如何領導台共，會有不同的想法。

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後逃到中國大陸，其往後的歲月過得艱辛固然有派系的鬥爭因素（蔡孝乾系統）¹²³，但也有謝雪紅主張「台灣獨立」，觸犯了已經改變立場的中共神經的原因。謝雪紅與林木順在莫斯科學習將要結束的時候，共產國際通過了由共產國際總書記布哈林起草的《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該任務綱領共13項，其中一項是“推動殖民地的完全獨立”¹²⁴。共產國際的“推動殖民地的完全獨立”立場，中共原本是支持的，但在1943年11月開羅會議後，國民黨開始著手進行「收復台灣」計畫，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立場也隨之改變。¹²⁵隨著中共在中國取得勝利建國，舊台共的台獨立場在中共政權中更沒有立場。雖然，謝雪紅曾經在1946年有恢復中共黨籍的要求，但她和蔡孝乾的問題一直無解，謝雪紅仍然走她的老台共路線，使得她與中共的關係更加疏離。謝雪紅這一台獨立場，經歷一九四〇年代二戰及國共內戰的變局後，已經不再為中共所喜歡。所以在二、二八謝雪紅

¹²²何池，《翁澤生傳》，頁262。

¹²³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10。

¹²⁴何池，《翁澤生傳》，頁143。

¹²⁵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08。

逃到中國後，中共突顯了李應章對收復台灣的重要性，以防範謝雪紅的台獨立場。台獨的理念至今依然延續，突顯了台灣共產黨建黨時台灣民族性已經與漢民族有所差異，因此，台灣獨立還是台灣人民的重要選項。

謝雪紅的台獨思想養成，始自 1919 年張樹敏帶她到青島。那時候中國正發生「五四運動」，在那段日子，她聽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也聽學生講述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過，讓她的思想起了很大的震撼。她說：「青島是喚起我漢民族精神、階級鬥爭思想，以及對幸福社會憧憬的地方；在那兒的日子，也是我一生經歷的轉折時期」。¹²⁶有了這一時期的思想震撼教育，謝雪紅的思想行為表現已經大為不同，她不再只是為自己的身世悲痛，她已經有了民族與社會國家觀念。謝雪紅從青島返台後在台中開「嫩葉屋」時又接觸文化協會的林獻堂、楊肇嘉。之後，受到蔡惠如和林幼春被判刑的震撼，謝雪紅就常去聽文化協會舉辦的演講，思想上受到文化協會的啟發¹²⁷，由思想轉化為行動，謝雪紅開始捨去小我，邁向反抗的戰鬥人生。

其實，謝雪紅十八歲以前是從來沒有寫字過，直到十九歲以後，才開始在紙上學寫字。在 1921 年，謝雪紅被「勝家縫紉公司」雇用當公司職員，謝雪紅體驗到沒有受教育的痛苦，開始隨身帶著小片報紙，一有機會就拿出來問人家，這時的謝雪紅，基本上還是文盲，主要是自學認識幾個字¹²⁸，她接受的正式教育，起自到上海大學的幾個月學習，真正有系統和長時間的讀書，是到俄國東方大學的學習。東方大學的學科有歷史、黨史、西洋史、東洋史、世界勞動史、社會發展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列寧民族問題、農民問題、共產國際的戰略和策略、殖民地問題、軍事訓練和俄語。¹²⁹謝雪紅的學校正規教育，養成了謝雪紅的世界觀，使其不被中國史觀所束縛。因此，她以出生地的台灣環境出發，關心台灣的人民與前途，進而與她所學的國際共黨世界觀結合，根本不會讓人有太多驚訝。

¹²⁶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紀》，頁 131。

¹²⁷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紀》，頁 149。

¹²⁸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頁 143。

¹²⁹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頁 203。

謝雪紅接受的學校教育雖然很晚，但是，謝雪紅接受的社會思想教育卻很早。謝雪紅於 1919 年到日本後，接觸到日本革命運動「米騷動」事件，眼界為之大開。之後，張樹敏因為聽信林姓商人的話，以為中國好做生意，在同年的四月又帶謝雪紅到青島。謝雪紅在青島遇上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系列開展，她也跟隨著林姓商人的妾，一齊去聽學生演講。她在這裡首次聽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類的新鮮詞句，也聽到“中國現在是一隻睡獅”之類的話。這是謝雪紅從來不知道，也從來沒有聽過的話。這些人生震撼，為她的思想進步奠下基礎。不過，截至 1923 年，她還是文盲。她只在張樹敏家的時候，曾去買過幾本像“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¹³⁰的東西來用毛筆寫字；後來在嫩葉屋時期，也曾買《倫語》課本請人家教識字，但沒有教幾次，因工作忙停止了。因此，基本上還是文盲。雖然，謝雪紅後來到俄國學習，從 1925 年 12 月 18 日到莫斯科，1927 年 9 月畢業，還不到兩年時間，總算有了文化根底，脫離了文盲的界定。但是，文化水平的低落，謝雪紅的一生還是耿耿於懷。

不過，由於謝雪紅的正規學校教育沒有受到中國文化的太多影響，突顯了她的生活環境對她的重要性，以致於她在日本、青島所受到的社會震撼，會和她出身環境的台灣聯結，並給予了更多改革台灣的想像，這和翁澤生的教育與環境刺激截然不同。所以，後來對台共的發展也有不同的想法。

台灣文化協會以啟迪民智為重點，可以說自 1920 年以降台灣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雖然，早期的文化協會是由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組成，重點在於追求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改良主義的傾向濃厚，但也已經注入了民主與民族思想的內涵。¹³¹台灣文化協會透過結社組織、發行報刊、閱讀傳播、影劇欣賞、舉辦講座、短期學校的教育活動，作為文化啟蒙的社會運動，影響面含蓋了文化、政治、藝術、思想。這些活動具有三個意義：一、文化啟蒙，為台灣民眾注入新的文化思維，新的知識教育，開啟新世界觀；二、匯集台灣人的人文關懷，進而從

¹³⁰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頁 143。

¹³¹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37。

家族或宗族的內聚合作，推行至全島性的公共倫理及團結共識；其三、以台灣為主題，思索台灣的角色地位。¹³²謝雪紅的政治覺醒啟蒙，來自於台灣文化協會。因此，1923年6月17日晚，台灣人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國語講習所”召開一個“恥政紀念日”的紀念會，謝雪紅因為已經有了台灣文化協會的思想啟發，所以會與林木順一起去參加。謝雪紅在會中被范一錢等多人推上台講話。¹³³據張深切回憶：「那時的集會情況和我自己講的話，現在已經沒有記憶。只有謝阿女主張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支援男人的運動，才容易成功。激起了全場的喝采，這確實使大家留下不淺的印象。因為過去台灣參加政治運動的女性很少，在日本只有蔡氏阿信，在祖國只有謝阿女，而兩人算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所以特別讓人激賞。」¹³⁴謝雪紅在政治領域的學習，在此已經逐漸顯現，並且嶄露頭角。謝雪紅對於生平在眾人面前第一次的演講，她感到興奮，也促使她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進一步走向台灣獨立的道路。¹³⁵

早在1927年10月12日，日共領袖片山潛就正式代表共產國際到東大傳達了「共產國際決定命謝飛英、林木順回國，組織台灣共產黨，由謝飛英負責，林木順協助」的指示。¹³⁶因為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台灣共產黨的組織工作就委由日共指導和協助。國際共黨也決定謝雪紅與林木順到達上海後，就要立刻到日本。台灣要建設成獨立國家，不只是台灣共產黨及謝雪紅的目標，更是共產國際的指示，目標明確。謝雪紅的台灣獨立之路主張，開始以行動兌現。

因此，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建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照相館舉行，在其〈政治綱領〉所提出的13項基本口號¹³⁷，就有「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及「建立台灣共和國」兩項，台灣獨立的立場鮮明。政治綱領雖然是林木順與翁澤生負責撰寫，但台共的政治與組織綱領，都是日本共產黨幹部佐也學和渡邊政之

¹³² 王振勳，《林獻堂的社會思想與社會活動新論》，頁63。

¹³³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紀》，頁155。

¹³⁴ 張深切，《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第一冊，（台中：聖工出版社），1961，頁195。

¹³⁵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紀》，頁156。

¹³⁶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紀》，頁233。

¹³⁷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頁62。

輔在聽取謝雪紅與林木順的台灣報告後起草，再委由翁澤生翻譯，經過台共建黨大會討論通過，是建黨的意志和主張。謝雪紅的參與，她又是台灣共產黨創立主要的催生婆，台灣獨立自然也是她的信念。

台灣共產黨的政治大綱，是日本共產黨幹部聽取謝雪紅與林木順的台灣輿情所撰寫。台灣共產黨的政治大綱，是以「台灣民族的發展」為題，對「台灣民族形成論」所進行的討論。政治大綱的論述指出，台灣的最初成員有台灣原住民高砂族，¹³⁸其次有中國南部地方的漢族移民加入。因為漢族渡海的危險性，渡海的漢族大多數是男性。所以，台灣民族的結構，是由高砂族原住民的女性和中國大陸南部地方的漢人結婚所組成。¹³⁹所以說，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已經和中國大陸的漢民族不同，台灣漢民族有波里尼西亞系高砂族的血統，中國大陸的漢民族則無。

台灣人的血統，因為移民的特殊過程，已經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漢民族。而在台灣文化的形成上，雖然說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共通點，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屬於封建文化，而台灣文化經歷荷蘭、日本資本主義的統治，在小市民形式的封建主義之下掙扎，經過無數次的抗爭，也就是清帝國對台灣的概念「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終於破繭而出，型塑了台灣文化的特質。

謝雪紅在台灣民族的血緣與文化上，徹底和中國文化劃清界線，她提出了台灣「半民族論」與中華民族區隔¹⁴⁰，邁出台灣獨立思想的第一步。然後在政治行動上，在台共的組之大綱表示「台灣共產黨在相當時期是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民族支部的一支。」¹⁴¹而在台灣共產黨組織宣言中表示，「台灣共產黨與馬克思列寧主意一樣，屬於武裝性的革命政黨，同時與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屬於第三國際分部」¹⁴²。宣言明白指出，台灣是第三國際下的一個獨立個體。

謝雪紅的政治思想，歸納有幾個方向：

¹³⁸ 漢人與平埔族的通婚較多，以高砂族論述有以其族為原住民統稱的意思。

¹³⁹ 陳儀深、林美容、葉海煙、林有土，《台灣的移民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頁6。

¹⁴⁰ 〈北京口述歷史之一〉，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492。

¹⁴¹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595。

¹⁴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659。

- 1、台灣民族論
- 2、台灣革命論
- 3、台灣獨立論
- 4、台灣共和建立論

雖然，謝雪紅在香港會議後的表現，因為人在中國大陸的屋簷下，以及遠離台灣的時空因素，謝雪紅將台灣獨立的主張，隱藏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大綱中，她的台灣獨立變成台灣高度自治。台共的政治綱領是把「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的理論與實際貫穿起來，但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為反抗由美國支持的國民政府力量，必須與反抗國民黨力量的中共相結合。因此，「台灣獨立主張被高度自治」取代。既然提出「台灣高度自治」，「台灣民族論」也就黯然退場，「台灣共和建立論」不得不無疾而終了。¹⁴³不過，謝雪紅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然為她的思想精華「台灣特殊論」力爭。顯然，她的台獨主張只是不得已的隱藏在政治鬥爭的夾縫中，她仍然是個台灣本位者。

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台灣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淡水八里觀音山麓召開，制訂了新的政治大綱。這個政治大綱，其策略有三個主要目標：

- 1、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 2、實施土地改革，消滅封建殘餘勢力。
- 3、建立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¹⁴⁴

為了達到這三目標，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導下，新的政治大綱將其政策濃縮為十點：

- 1、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 2、沒收帝國主義者的一切企業和銀行。
- 3、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中農使用。
- 4、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實施國家失業救濟、實失社會保險等制度。

¹⁴³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74。

¹⁴⁴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頁117。

- 5、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實施統一累進稅制度。
- 6、革命的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
- 7、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 8、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 9、聯合日本、中國、印度、朝鮮的工農大眾。
- 10、聯合蘇聯和世界無產階級。

台灣共產黨新的政治大綱雖然沒有謝雪紅的參與（謝雪紅被臨時大會開除黨籍），但大綱第一條就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舊台共的台灣獨立立場，是有其一貫性的。因此，在二·二八之後，已成為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像徵的謝雪紅，其一貫的台灣自治和台灣獨立的觀念，自然不為已經改變對台灣獨立立場的中共所喜歡。其後，隨著韓戰的開打，美軍協防台灣，中共解放台灣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謝雪紅的利用價值低了，中共對謝雪紅台獨立場的打壓逐漸加強，埋下了謝雪紅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後一直被鬥爭的根本因素。

台灣自治聯盟內部的所謂宗派之爭或稱之為路線之爭，應該說只是一種內部矛盾而已。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黨內路線之爭，還不至於要鬥臭又被鬥垮台後，還要拼鬥到死，頂多檢討下台而已。但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後，謝雪紅的被鬥，是往死裡進行的批鬥，淒慘無比。

在1949年9月，謝雪紅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已經有「人在屋簷下的委屈」，她不得不把台灣獨立自主的願望，隱藏在謝雪紅發言中的「中國人民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裡，她強調綱領草案第十二條所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¹⁴⁵並說：“台灣人民的政治要求總結起來就是這個”。這不就是謝雪紅將她的台灣獨立自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變種的以台灣自治的方式呈現，這是人在他人屋簷下的無奈，也強調了謝雪紅對台灣政治主張所能容忍的最後底線。謝雪紅

¹⁴⁵ 張傳仁，《謝雪紅與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頁160。

對當時的處境是有感覺的，也採取了一些讓步，希望能獲得中共的信賴，穩住她在台盟的地位。可惜事與願違，中共對台的立場改變了，她只是中共對台的一面旗子，她在中共的掌控下如何能不倒呢？

因此，1952年的整風運動，中共系統內台盟的蔡系人馬對謝雪紅猛攻，謝雪紅氣急病發，有一段時間住進醫院，謝雪紅在台盟中的地位受到蔡系挑戰。不僅於此，謝雪紅失勢後，她個人不再對台灣問題提出任何聲明，台盟就此完全聽命於中共的領導。最終結果是1954年1月，台盟奉命召開內部會議，通過了「台盟總部關於今後工作方針和整頓機構的決定」。這份「決定」提出了兩個組織方針：第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繼續響應各項政治號召，作好崗位工作。第二、確定在組織上堅持繼續整頓，暫時不作發展。¹⁴⁶台盟脫離台灣自主立場的自我閹割，在兩個組織方針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1954年台盟的內部會議所作的兩個組織方針，很明顯的在杯葛謝雪紅，擺脫台盟的自主性。換句話說，台盟已經不再是台灣共產黨的外部組織，而是中國共產黨轄下的外圍。嚴重一點的說，台盟已經拋棄台灣共產黨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甚至，謝雪紅在二·二八以後不得不暫居人下，退一步修正的「台灣高度自治」主張，也都自動讓步。台盟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所謂民主黨派中的一員，完全以中國共產黨馬首是瞻。

謝雪紅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主要問題中的兩點，一、台灣無漢奸論；二、台灣特殊論，這兩點是謝雪紅對台灣的基本信仰，也是謝雪紅領導台共的基本原則。所謂台灣無漢奸論，是她認為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台灣人民隸屬於日本國籍，其對中國的敵對行為，不同於本國人通謀敵國的叛國行為，所以漢奸論不適用。至於台灣特殊論，更是基於歷史事實的觀察結果的主張。謝雪紅認為台灣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國民黨政權的壓迫，形成台灣社會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意識、文化觀念的特殊性。由於這樣的特殊性而在政治

¹⁴⁶ 于剛，〈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史〉。

上有了自治的要求，進而提出「台人治台」和「台灣意識」的概念，並演繹成「台獨觀點」的政治訴求。¹⁴⁷

李克世是李應章子女中最早加入共產黨者，讀政治系，在政治觀點上受到李應彰的器重。但他對謝雪紅的台灣無漢奸及台灣特殊論，只以中華民族的角度論述，忽略了當年的台灣人屬日本國籍的事實，反而凸顯了謝雪紅對歷史觀察的精確。李克世的說法：¹⁴⁸

「再看看謝雪紅拋出的“台灣人无汉奸”论里的以下记述：

“台湾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曾经发动过无数的反抗运动；但是，更大多数人为了生活必须与日本人有往来，也必须接受日本的教育。台湾的特殊环境，不能与中国社会相提并论。因此，要以「汉奸」的罪名来指控台湾人，是不能成立的。”（3）短短几句话，不难看出谢雪红所抛出的这一“台湾人无汉奸”论实在是不学无术、谬论百出。小学生都答得出：这里所谓的“台湾人”就是指日据时代住在台湾的台湾籍人士，而不同于“某些台湾人”。没有任何人说过所有“台湾人”是汉奸，而是指控其中某些人是汉奸、台奸。……只因为：“更大多数人为了生活必须与日本人有往来，也必须接受日本的教育，”就不存在还有“更大多数人”以外的少数的民族败类——汉奸、台奸？」

李克世的最大問題，其實也是中華民族主義者等，都是將日本國籍的台灣人，以漢人族群的立場論述國家認同。因此，謝雪紅的台灣論述，才會在1957年時被打成右派，遭受無情的鬥爭。

不過，1979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北京對台政策改變，把和平統一台灣作為最高綱領，謝雪紅對台的歷史號召力突顯了她的重要性，謝雪紅因中共對台統戰的政治需要，而且，海內外討論謝雪紅事蹟的人越來越多，中共不得不在1986年9月15日在北京正式為謝雪紅舉行骨灰移放儀式，為她平反。¹⁴⁹ 簡介全文如下：

「謝雪紅同志，1901年9月出生於台灣彰化一個貧苦工人家庭，曾當過家庭

¹⁴⁷ 鄭義，《踩不死的野花：謝雪紅》，傳記文學第九十八卷第五期。

¹⁴⁸ 附錄李克世通訊稿，〈第五章“台灣無漢奸論”〉，頁68。

¹⁴⁹ 〈謝雪紅同志生平〉，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行。

教師、店員，接受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1923年在台中參加台灣進步團體「文化協會」。1925年在上海參加五三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1927年12月回國，1928年在上海參加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老台共，任中央候補委員，旋回台灣進行革命活動，1931年因台共組織受到破壞而被捕，1939年出獄後經商，1945年日本投降後，曾發起組織人民協會、農民協會，任中央委員。1947年台灣二·二八起義中，謝雪紅為台中地區的起義領袖，是這次起義中很有影響力的人物，起義失敗後，轉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參與發起組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建國後，謝雪紅同志還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台盟總部主席，1970年11月5日因患肺癌病逝於北京，終年69歲。

謝雪紅同志是台灣有一定聲望的領袖人物，儘管在她的一生中有過曲折和錯誤，但她為反對外來侵略，實現祖國統一而奮鬥的精神，以及為此而作出的努力，是不可磨滅的。今天我們為謝雪紅同志舉行骨灰移放儀式，正是表達對她的紀念，表達對過去和現在一切為祖國統一事業作出貢獻的台灣同胞的崇敬。」

中共讓台盟提出的這篇謝雪紅簡介，文章看似行雲流水，但對謝雪紅被批鬥的過程及內容，沒有對過去錯誤的檢討。這是一種沒有實事求是的平反，沒有檢討以前錯誤的假平反，意義性不大。

不過，雖然是假平反，但卻露出兩點意義：一、中共對台的和平統戰必須用到謝雪紅舊台共的台灣民主、自治理念對台灣人的吸引力。二、中共對謝雪紅的台獨主張在台灣人內心所占的份量已有相當體認，中共只能順勢操作。這就是說海峽兩岸的問題，又回到台灣共產黨建黨之初，共黨國際承認台灣的獨立自主地位。只是，中共為謝雪紅平反，應用謝雪紅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微妙關係，以及謝雪紅在香港會議以後，不得不將台灣獨立主張，將台灣改為民主與自治的類美

國聯邦地位，以突顯台灣的主權地位屬中共所有的意涵。中共打的是迷糊戰，其實也褻瀆了謝雪紅為台灣獨立的宗旨。

二十一世紀的海峽兩岸，目前的糾葛，仍然有「獨立與統一」的論爭。希望台灣獨立的人，延續著謝雪紅等台灣共產黨人對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愛和疼惜，以及對中國醬缸文化的不信，希望台灣自主管理成為富有台灣文化和海洋精神的和平國家。¹⁵⁰另一派希望兩岸統一的人，以中原儒家文化為唯一道統，覬覦著中華帝國的重現。台灣的何去何從，仍然在拔河之中。

三、李應章的路線

李應章就學年間，正好是台灣反抗運動從武裝對抗期邁入非武裝政治對抗的過渡時期¹⁵¹。根據李應章自述，他的民族意識的養成，是在1919年：¹⁵²

「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我們學校，給我很大刺激，我又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自決潮流的影響，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

李應章路線的根本要素，就是他的民族意識養成，讓他的政治與民族思考有了根據。終於發展出兩條李應章的抗路線。一是他朝著社會改革的方向對日本總督府的陳情抗爭，為蔗農受到不公不義待遇出聲，導致爆發二林蔗農事件；二是潛逃中國，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

第一階段是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並成為理事兼二林幹事。1921年10月，回鄉行醫後的李應章，參加林獻堂、蔡培火發起的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簽名活動。繼之，在1923年1月，李應章參加臺灣議會期成同盟組織為會員¹⁵³。這兩種活動的訴求都是朝著「體制內改革」的路線前進，卻也符合他是有資產階級身份的民族主義觀。

在台灣的後期，李應章的對日抗爭，因為其父為他被關憂憤而死的刺激，已經比較強硬。

¹⁵⁰ 民進黨的台灣民族觀。台聯黨的致力於推動台灣主體意識。

¹⁵¹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頁15。

¹⁵² 李應章，《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5。

¹⁵³ 《沿革誌》，頁311-312。

台灣反抗運動的發展，自進入政治反抗期以後，因為日警的鎮壓，以及各類思想的啟迪，終於發展成三條路線，造成思想與教育體系的文化協會分裂。這三條路線是一、連溫卿及王敏川組成的社會主義。這一派以無產階級與農民組合維代表；二、受中國國民革命影響的全民主義派，由蔣渭水領導。它集合了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企圖在工農運動中維持統一的民族主義形式；三是蔡培火代表的溫和民族主義運動派。¹⁵⁴

李應章原是文化協的理事兼二林幹事，而文化協會的創始目的在喚醒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並培養一種有利氣氛以推展政治運動。當運動擴大，他們組織了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聯合陣線。這是體制內溫和的改革路線，是李應章所認同的資產階級改革方法。1927年7月，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因文化協會分裂組成「台灣民眾黨」，其指導綱領是「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革除社會制度的缺陷」。¹⁵⁵李應章剛好於1927年7月入獄，文化協會的分裂和台灣民眾黨的成立他都無緣參與。不過，李應章出獄後於1930年10月應謝南光的邀請，參加「台灣民眾黨」在彰化召開的會議¹⁵⁶，並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¹⁵⁷的激烈言詞演說，他的民族自覺和台灣獨立立場已經更為堅決。李應章抗拒日本殖民統治的思想，隨著台灣反抗意識的提升，不再只是民族思想的宣傳期，在他父親死後，他也面臨了以行動抗爭攤牌了。而在這個時候，又是日本開始肅清共黨等反對勢力，積極準備南進的時期。

第二階段是在中國跟隨中國共產黨的脚步，這時的李應章，結合了民族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以經營醫院掩護革命事業，為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地位

¹⁵⁴ 盧修一，《日據時代 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頁43。

¹⁵⁵ 謝春木，《台灣人的要求》，頁87。

¹⁵⁶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下冊。頁381。

¹⁵⁷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背景，是因為「台灣民眾黨」的黨綱綱領中有「期台灣人全體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日本當局認為「全體台灣人」及「解放」用語有「偏狹的民族主義色彩，形同民族自決主義」，因而被禁組黨。但經再接再厲組黨，並更名為「台灣民眾黨」申請後，日本當局開出兩個條件：一、民族主義的字眼刪去；極端民族主義的蔣渭水不可參加，要參加不可在黨中央擔任支配大局的角色。為此條件組黨內部發生爭執，友寧可組黨不成也不妥協的「玉碎派」有想讓步的「瓦全」派。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3。

奠定基礎，使他成為一旦中共解放台灣後的台灣負責人重要人選。

李應章的革命路線，雖然分為兩階段，其實重點在第一階段的農民組合所帶來的抗爭價值。這一階段的李應章，甚至走在文化協會之前，從事農民運動的組織和動員工作。¹⁵⁸

「1923年9月，台灣文化協會彰化支部開會，李應章和詹奕候向大會提出台灣農村問題實際鬥爭案，被否決。於是李應章和詹氏、劉崧甫、蔡淵驕、陳萬勤等組織農村講座、農村夜學，自己擔任教師，義務上課。」

這時候的李應章，是有鬥爭目標，更掌握了鬥爭路線。但在中國時期，他只是聽命行事。所有的鬥爭目標和路線，欠缺主動，都是領導交代作掩護行動同志的幕後工作。

四、翁澤生、李應章和謝雪紅的交互關係

謝雪紅的共產國際背景，以及日系共產系統，本來就和翁澤生純然的中國共產黨信仰者不同。謝雪紅的革命目標是台灣，翁澤生肩負著中共閩南地區的建黨工作，兩人的解放思想不盡相同，將他們的命運綁在一齊的是創立台灣共產黨。

謝雪紅為了農民組合經費曾經去找過李應章，但也因文化協會的理念不合有過不愉快。在上海的時候，李應章因組織關照，還維護謝雪紅的安全和食宿。但兩人還是為了爭奪領導權公開決裂。

李應章雖然無緣見到翁澤生，但他們都有中華民族的共同觀，也是知識分子，同樣是中共黨員，他們還有共同朋友蔡孝乾，也有共同頂頭上司饒漱石。對於無緣見到翁澤生，李應章的次子李克世表示惋惜。

（一）李應章、翁澤生的宗派關係

李應章的一生，從來沒有見過翁澤生，他們之間是透過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以及蔡孝乾的職務執行關係而來。而李應章認識張志忠是在1945年11月，

¹⁵⁸ 《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37。

張志忠帶張孝乾的密函找到在四明里醫院的李應章¹⁵⁹，李應章也就在這時和台灣地下黨建立關係。¹⁶⁰在宗派分類上將李應章歸類為蔡孝乾派，在職務的接觸是有那麼一點味道，但是太狹義了，不如直接點明是「中共派」，以別於謝雪紅的「舊台共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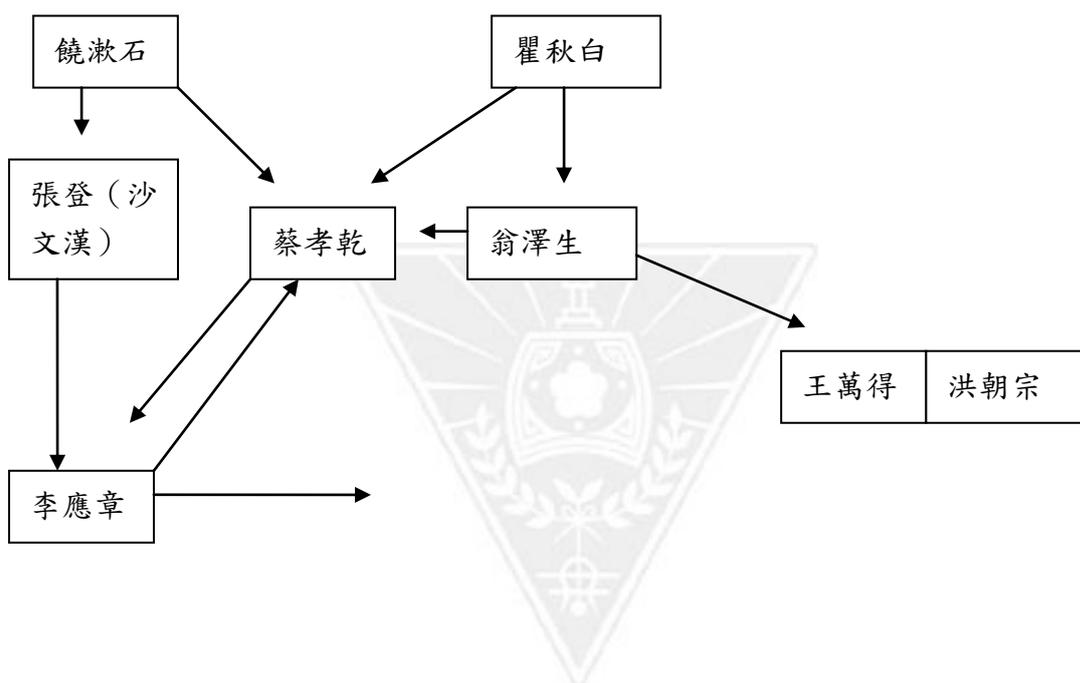


表 3-1：翁澤生系宗派圖

圖示蔡孝乾在職務上最大的頂頭上司是饒漱石，李偉光的背後支助是張登，而張登又是饒漱石系統的人，在人脈的聯結，等同於周恩來一脈。¹⁶¹

（二）謝雪紅、李應章的宗派淵源

台盟於 1949 年遷到上海，謝雪紅聽了一些同鄉會員的反應，要改選同鄉會會長，引起李應章反彈。導致中共系統張登、饒漱石干涉台盟內部問題，謝雪紅面臨四面楚歌。

¹⁵⁹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李偉光自傳」上卷，頁 19。張孝乾是李應章文協時期的朋友。

¹⁶⁰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李偉光自傳」，頁 162。

¹⁶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390-391。

李應章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站，掩護了許多地下黨黨員。尤其在 1948 年，把李先念部隊突圍出來的一批地委幹部安置後又安全轉移解放區、收留掩護福建地下黨受破壞後流落上海等十人、掩護從台灣撤退到大陸的地下黨員程潔及暴露身份的黨員王天強、李喬松、王萬得、陳炳基等、營救參加學生運動而被捕的台灣籍學生。¹⁶²李應章在上海及中共黨內的人脈，因為掩護與營救的角色而非常豐沛，謝雪紅沒有選擇合作，犯了戰略錯誤。加上中共勢力插手台盟，領導台灣解放的主導地位是不會放棄。因此，除非謝雪紅的台灣自治主張中共可以接受，或者謝雪紅改變對台灣的主張。否則，中共為了對解放台灣師出有名，還是非動謝雪紅不可。

由於台盟遷上海後，謝雪紅的強硬態度，強迫李應章反擊。因此，形成以李應章為首，結合中共路線的蔡孝乾派；以及以謝雪紅為首，以舊台共理念結合的謝雪紅派。原本無緣見到翁澤生的李應章，就這樣拉上翁澤生的關係。李應章的次子李克世還曾嘆氣的說：「父親未能和翁澤生一齊工作，實在可惜。」言下之意，對無法親自接翁澤生的棒，反而要經由蔡孝乾而跟台灣地下黨街上關係，覺得有點悵然若失。

謝雪紅於 1949 年到北京時的主要班底有蘇新、楊克煌、周明、林樑材、柯秀英、林東海、丁光輝、潘欽信、蕭來福等，以及到北京後的林鏗生等人。在蔡孝乾投降國民政府後，危機意識增強的蔡孝乾班底陳炳基、吳克泰、蔡子民，甚至非蔡孝乾系的王萬得也因私人恩怨參與，利用了李應章所增強的聲勢，展開對謝雪紅的鬥爭。

¹⁶² 蔡子民整理〈李偉光自述——一位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下)，《台聲》，1986 年第 11 期，(北京)：1986 年 11 月) 頁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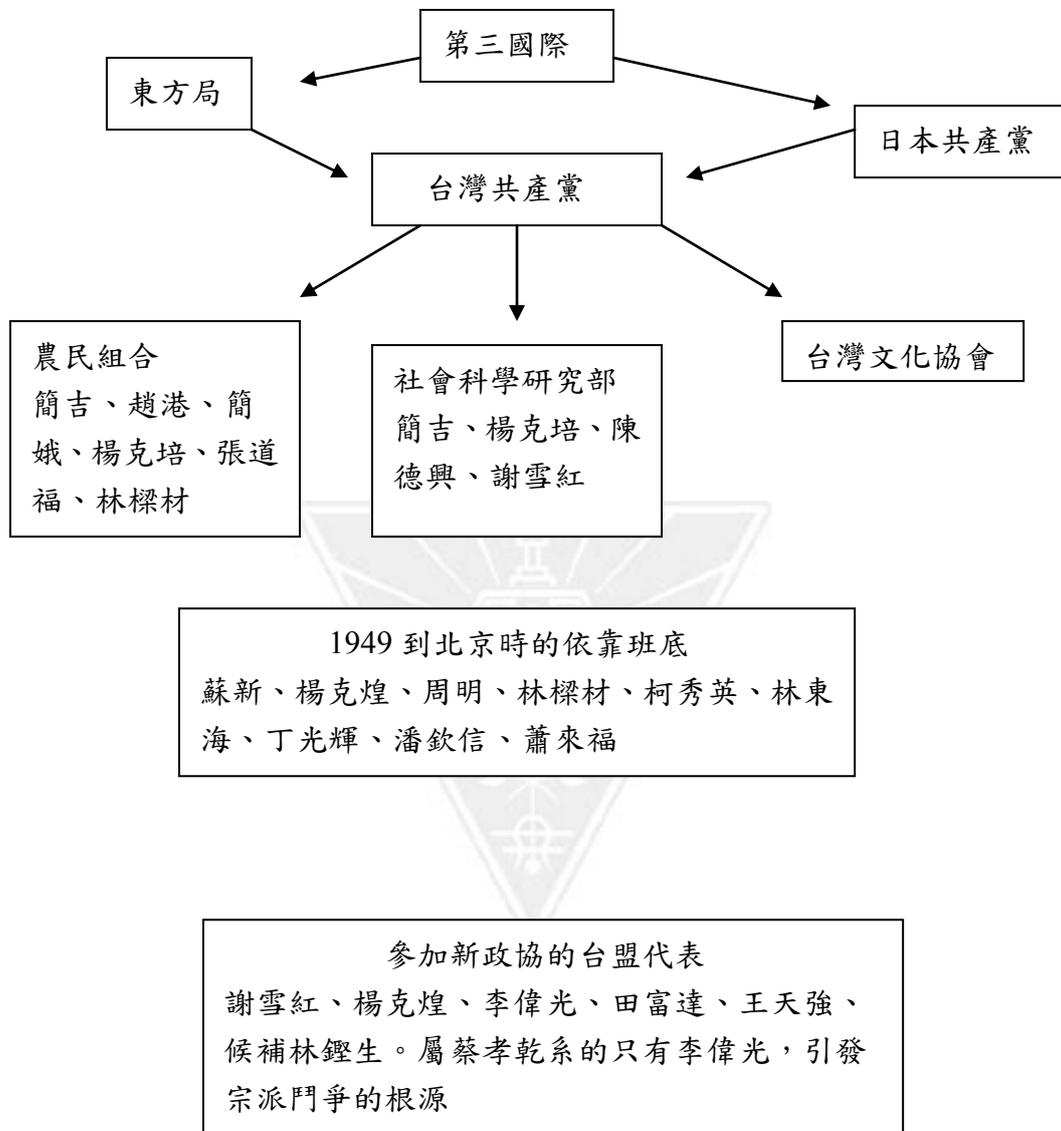


表 3-2：謝雪紅關係圖、宗派脈絡

五、小結

翁澤聲與謝雪紅的敵對，有個人的情感因素，也有路線問題。謝雪紅對革命的認識，是以台灣人的本質出發，以「殖民地革命」為主調。翁澤生則以其中華文化的家庭教養和社會主義學校教育養成，完全遵循中共路線，把台灣的革命，

納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革命」。兩人對台灣革命的認識南轅北轍，戰略方針完全不同。加以謝雪紅開除了洪朝宗、蔡孝乾、潘欽信三位上大派黨員，以及翁澤生的妻子謝玉葉，嚴重傷害翁澤生的感情，也損壞了翁澤生的中共路線領導尊嚴。

因此，翁澤生和謝雪紅對台共的領導差異不但越來越大，翁澤生甚至以第三國際對謝雪紅下達翁澤生意志的指令，認為台共的活動不夠積極，犯了關門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錯誤，必須進行內部改革。翁澤生是透過陳德興瞭解謝雪紅在台灣的情況，引薦潘欽信向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執委瞿秋白彙報台灣情況，並由翁澤生恩師瞿秋白指出台共在建黨等工作中存在「關門主義」傾向，強調「台灣的同志應提起共產主義者應有的積極性」，清除「關門主義傾向」，擔負起領導台灣革命的任務。翁澤生借此說法鼓勵台共內部的上大派成立「改革同盟」。¹⁶³

翁澤生鼓勵成立的「改革同盟」，是以中共台灣支部的成員為中心。中國共產黨早在1928年10月18日台灣設立支部，直接與上海聯繫，其成員也是台灣共產黨員。所以，翁澤生可藉中共台灣支部黨員成立「改革同盟」。這個「改革同盟」和日本返台的台共黨員蘇新、蕭來福結盟¹⁶⁴。最終，在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所舉辦的台共二大，通過開除謝雪紅、楊克培、楊克煌黨籍。¹⁶⁵翁澤生不但在台共黨內和謝雪紅鬥爭，更假中共的路線，終於壓制了謝雪紅。

其實，台共內部的分裂，不只是路線或領導權的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台灣共產黨對立的問題。台共於1928年4月15日成立後，緊接著在1928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在台灣設立支部，直接與上海聯繫。這個支部成員包括了文協組織的蔡孝乾、翁澤生、莊春火、洪朝宗、蔡火旺、王萬得、陳玉暎、潘欽信、周天啟、莊泗川、李曉芳等「上大派」的人。

上大派不僅在台共第二次臨大會開除謝雪紅等台共黨籍，為取得台灣左翼運

¹⁶³ 陳芳明，《中國論壇》，「台灣抗日運動的左翼路線 以台共「上大派」主腦翁澤生為中心」，月刊號第3期·31卷第4期，頁36。

¹⁶⁴ 陳芳明，《中國論壇》，「台灣抗日運動的左翼路線 以台共「上大派」主腦翁澤生為中心」，月刊號第3期·31卷第4期，頁36

¹⁶⁵ 何池，《翁澤生傳》，頁241。

動領導權，經翁澤生規劃支持王敏川對抗連溫卿取得新文協領導權。但等到王敏川取得文協領導權後，上大派的台共又主張應該取消文化協會。因為，在中共領導下的極左台共黨員，走的是排斥其他階級力量的激進路線。而文協是小資產階級的組織，文協的存在會妨礙左翼運動的開展，最終還是要毀掉文化協會。

這一點和謝雪紅要利用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方法衝突，又有台共創立初期蔡孝乾、潘欽信、謝玉葉因害怕日本警方大搜捕，而從台灣潛逃到福建，被謝雪紅開除黨籍的舊恨，台共內部的鬥爭就越演越烈。中共雖然在台共內的路線與權力鬥爭中最後取得勝利，但台共與中共在台灣的發展也成為泡影。

探討翁澤生的政治思想，討論他的台共路線問題，最直接的還是要從殖民地台灣與半殖民地中國的運動策略與台灣當年抗日運動的方向著手。當年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共產黨要做的除了是社會解放的反抗運動之外，同時還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在裡面。而中共在中國進行的只是社會改革的階級革命。台灣的革命運動，須要經歷兩個階段，甚至三個階段的反抗運動，才能達成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兩者的社會現象差別很大，要以等同中國的冒險激進做革命工作，顯然不通¹⁶⁶。謝雪紅對台灣革命的認識，是以「殖民地革命」為主調；完全走中共路線的翁澤生，是把台灣革命納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革命」。這種對革命性質的政治判斷，決定了他們不同的戰略方針。

總結翁澤生和謝雪紅路線異同，謝雪紅是遵循著國際共黨世界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員，翁澤生則是在中共領導下配合國際共黨命令的台共黨員。兩個人雖然都有中國共產黨的身分或淵源，但客觀上，謝雪紅是在國際共黨指導下尋求日共和中共的支援；翁澤生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當起國際共黨東方局的聯絡人。對台灣共產黨的領導和前進方向，客觀形勢上雖然都遵從蘇俄的國際共黨領導，但在主觀上，翁澤生則是以中共馬首是瞻，對國際共黨的尊重，遠不如對中共的領導服從，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

¹⁶⁶ 陳芳明，《台灣抗日的左翼路線 以台共「上大派」主腦翁澤生危中心》《中國論壇》月刊號第3期·31卷第4期，頁38。

李應章與謝雪紅在民族觀念、社會價值與採取的反抗手段確實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出身背景的不同，李應章最終投入中共的陣營，為反抗中國國民黨以及中共解放台灣而努力。

李應章早在文化協會的改造中，已經和謝雪紅不合，反映了他們不同的政治目標。李應章的鬥爭目標是跟隨著林獻堂、蔣渭水的中間偏右改革主張。李應章後來也和蔣渭水一樣走左翼路線，但也只是台灣內部較激烈的政治改革抗爭，不像謝雪紅有清楚目標，就是以台灣民族為基礎，將台灣建設成造福農工的社會主義國家。

李應章後來在中國參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走的路線更是不同於謝雪紅。李應章在參加中共組織以前，是先行創業，再以自己的行業掩護，協助革命事業的發展。不像謝雪紅身先士卒投身革命，然後以是夜掩護革命行動，兩者有專業上的差距。

李應章和翁澤生的不同點，一樣是在革命的專業上。翁澤生一生的事業就是參與中國共產黨和台灣共產黨的革命，就算窮苦潦倒，小孩都沒飯吃了，還是不改其志業。李應章出身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安身立命和投身革命有同等的重要性。這就像職業軍人和志願兵的差別，對革命事業的貢獻都很大，但就是不同。

第二節 革命目的

李應章雖然有民族情感，對社會改革擁有熱誠。但他也是資產知識分子，有謹慎的一面。被迫逃離家鄉，走上中國革命的道路，是他的人生轉折，而非既定目的。

（一）李應章的革命目的

李應章的抗爭可分為二期，一、日治體制內抗爭期；二、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期。

(1) 日治體制內抗爭期

1921年4月李應章與吳海水、何禮棟、賴石傳在臺北籌組全臺灣青年會，因向林獻堂、董欣、許丙、林熊徵等勸募青年會經費，而認識了蔣渭水、蔡培火。因為蔣渭水的提議，將臺灣青年會的組織擴大，改組為文化協會，大夥為籌組文化協會而努力。¹⁶⁷李應章的抗爭，自此進入日治體制內抗爭期。

這個時期發生許多為體制內改革抗爭事蹟：1921年10月參加林獻堂、蔡培火發起的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簽名活動；1921年10月，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總理，蔣渭水理事兼幹事，李應章當選理事兼二林幹事；1923年1月李應章參加臺灣議會期成同盟組織為會員；1923年9月臺灣文化協會彰化支部開會，李應章和詹奕候向大會提出「臺灣農村問題實際鬥爭案」¹⁶⁸被否決；1923年11月李應章和詹奕候、劉崧甫、陳萬勤、蔡淵騰組織農村問題研究社，舉辦農村講座；1924年3月李應章因與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關係，被以違反治安警察法拘留三天。因為不是幹部被釋放；1924年12月李與詹奕候、劉崧甫、陳萬勤、蔡淵騰起草蔗農組合的組織章程。

1925年1月，蔗農組合召開成立大會，李應章任理事長，10月21日22日蔗農抗爭廠方強制割取甘蔗，引爆蔗農事件，這是李應章始料未及，被迫走入工農階級鬥爭的開始。從此，李應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意志已不可動搖。直至1928年1月李應章出獄，知道父親在他被關時病故及火燒家屋的經過後，他已不再是當初與林獻堂、蔣渭水等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的體制內改革的李應章，而是敵我勢不兩立，非得擊潰日本殖民統治的強硬派。所以，才有1930年10月臺灣民眾黨在彰化開會，李應章在會上主張「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主張，終於和蔣渭水、林獻堂溫和改革主張分道揚鑣，展現了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體制內改革的抗爭。

¹⁶⁷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 李偉光》，上卷，頁184。

¹⁶⁸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 李偉光》下卷，頁245。

因為父親的死亡與火燒祖屋的家恨，李應章由溫和轉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左派鬥爭型態。最後不得不逃離家鄉，投入共黨革命的懷抱，在國民黨統治的白區，擔任共黨地下黨的任務，邁向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期。

(2) 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

1932年1月，李應章離開台灣到廈門，開始投入共產黨旗下，在廈門白區幹地下黨工作，這一期又分廈門工作時期及上海工作時期。

剛到廈門的李應章，其實還人生地不熟，為了生計，在鼓浪嶼找到教小學的外甥洪允廉¹⁶⁹商量開醫院，又向台灣文協時的老朋友林木土借錢，在鼓浪嶼泉州路54號開設神州醫院。在籌備期間，一位開照相館的台灣老鄉張水松常來幫忙。後來，就是由張水松介紹，認識了中共廈門市委組織部負責人嚴壯真，並先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互濟會，從事寫宣傳標語等工作。同年四月，由嚴壯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¹⁷⁰

入黨後的李應章，開始團結在他周圍的人，發展他們成為互濟會會員或共產黨員，進行反國民黨“新生活運動”的宣傳，支持廈門花磚廠工人鬥爭，利用醫生身分接近政府機關取得情報，以醫院掩護來往同志及來自游擊區的受傷同志治病。1934年底，廈門黨組織被破壞，嚴壯真被捕，李應章緊急逃離後決心到上海，結束了李應章在廈門白區時期。

1934年底，李應章到了上海後改名李偉光。1935年4月在英租界勞合路開設診所。因為看診人數不多，1935年底將診所遷到法租界，依然生意清淡又找不到組織。李應章心情苦悶，又看到當時上海吸鴉片的人很多，就潛心研究戒菸藥品。到了1937年1月，終於研究成功，開始做戒菸醫療，診所生意太好了以致不敷使用，所以將診所搬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四明里開設偉光醫院。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3日戰火蔓延到上海。李應章參加上海福建同鄉會救國行動，負責救護組的訓練和傷兵站的外科醫療工作。同時，他

¹⁶⁹ 筆者堂伯公，其子洪永泰著名教授，現任職台大。

¹⁷⁰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 李偉光》，頁14。

還團結一批進步的台灣人，組織了台灣革命大同盟。這些運動在報上披露後引起中共黨組織的注意，派來中共上海辦事處吳成芳來聯絡，李應章終於找到革命關係。從此，李應章在共產黨組織領導下從事抗日地下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後，李應章當上「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後來，李應章就是利用「台灣旅滬同鄉會」這一組織，幫助戰後的台灣人回到台灣。他也利用「台灣旅滬同鄉會」的功能，成為中共派駐台灣地下工作人員的運輸站。

1945年11月，張志忠帶了李應章台灣文協時的老朋友蔡乾的介紹信來找他，年底，蔡乾也來到上海，並介紹張執一（解放後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領導李應章工作。1946年3月，李偉光設法送張志忠回台工作，7月，蔡乾也回台灣工作。二二八以後，李應章掩護了逃出台灣的吳克泰、周青、李喬松、孫古平、蔡子民；又將台灣醫生河濱等一批逃出來的同志送進解放區。1947年6月，謝雪紅、楊克煌也來到上海，住進李應章的醫院，由他負責掩護。

根據徐萌山（原台盟總部秘書長）回憶，1948年李應章就掩護了不少中共地下黨員：一、參加學生運動而被逮捕獲追捕的台灣籍學生鄭晶瑩、江濃、張碧坤、林梅英等。二、掩護了從台灣撤回大陸的地下黨員程浩（曾任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等。三、經李純青介紹，收留掩護了福建地下黨受破壞留落上海的地下黨員張連（中共福建省顧問委員會常委）等十人。四、把李先念部隊突圍出來的一批地委級幹部安置在李應章家中居住，後又安全移送到解放區。¹⁷¹

1949年三四月間，送台灣地下黨吳克泰、葉紀東等六人到北京參加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接著又送一批在台灣暴露身分的同志王天強、里喬松、王萬得、陳炳基等二十名到解放區。但因語言不同被發覺折回上海，李應章將他門隱蔽起來，直到5月25日上海解放。

（二）謝雪紅的台獨目標

謝雪紅的革命意識，根據她的人生經歷可分三個時期，一、階級意識覺醒時

¹⁷¹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 李偉光》上冊，頁22-23。

期；二、台共時期；三、中共時期。這三個時期又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台灣獨立奮鬥時期；二是台獨運動破滅時期。

(1) 階級意識覺醒時期

從 1920 年到 1945 年，是謝雪紅加入左翼運動的時期。1919 年，謝雪紅隨著張樹敏到日本是她人生的轉捩點，這個時期的日本，正進入「大正民主」階段，思想開放、言論自由，左翼思想日益高張。謝雪紅與社會主義思想的接觸自這個時候開始¹⁷²。她在這個時候接觸到自由與民主，也是提壺灌頂的思想改造。1918 年歐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主自決」的口號，對弱小民族有很大啟示，在日本自修讀書的謝雪紅難免會感受到不一樣的政治氣候。1921 年謝雪紅回到台灣，台灣文化協會也在台灣成立。這個組織，主要在對島內人展開啟蒙的教育工作，實現「台灣由台灣人統治」的理想。謝雪紅因 1922 開始經營「嫩葉屋」有成，引起林獻堂、楊肇嘉注意找上門來認識，謝雪紅就此關心台灣文化協會的事，經常去聽台灣文化協會演講¹⁷³，這是謝雪紅第一次加入政治運動的行列。謝雪紅在台灣文化協會學習到台灣政治、文化的許多新知識，漸漸成為覺醒的奴隸。

(2) 台共時期

1923 年四、五月間，謝雪紅因「嫩葉屋」欠缺資金，經營困難，張樹敏向謝雪紅表示他現在有錢，可供應她讀書，謝雪紅再次被張樹敏騙去上海。但也在這次的航程中，謝雪紅在船上認識了林木順、李朝基（李友邦）、鄭泰聰。到了上海以後又認識林慶、李萬居（李萬枝）、范一錢（信仰無政府主義）等，終於改變了謝雪紅的人生，踏入革命的洪流。

謝雪紅於 1925 年再到上海，然後轉到杭州與林木順會合。謝雪紅在杭州接觸了《新青年》、《先鋒》、《嚮導》，認識了陳其昌、黃中美等人。謝雪紅這次的上海行，左傾思想的社會革命行動完全顯露出來，開始與改良主義路線，從事政治改革的台灣文化協會分道揚鑣。

¹⁷²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34。

¹⁷³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記，《我的半生記》，頁 147。

謝雪紅到上海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上海總工會，捲入五三運動的洪流，參與中共當時領袖瞿秋白所說，「這確是中國國民革命開始的一天」的運動。因為謝雪紅化名「謝飛英」¹⁷⁴的勇於參與五三運動，引起中共領導者注意到她、吸收她，讓她進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就讀，該系系主任就是瞿秋白。但謝雪紅僅僅在上大學習四個月而已，就和林木順一齊被送到莫斯科，謝雪紅進莫斯科東方大學，林木順則到中山大學。

在東方大學的學校生活，強調的是紀律與訓練，學校有意把教育與勞動結合起來，使她從生活中汲取知識，以知識實踐於生活。對謝雪紅來說，無疑是讓她思想飛躍進步的時期。在台灣時她只知道自己是底層生活人民的痛苦；她在日本時，看清了台灣的痛苦；到了上海，她發現了中國的痛苦；到了莫斯科東方大學，她有了世界觀，瞭解世界的痛苦。因為有了世界觀，她才能掌握台灣解放運動的發展重心，在台灣共產黨的活動中，起到領導的重要位置和貢獻。

不過，台灣共產黨成立後，謝雪紅面臨兩面作戰的窘境；既要怕被台灣總督府發現台共組織，還要和翁澤生等的上大派鬥爭。在鬥爭路線上引發不同觀點的內鬥，台共的組織發展有如曇花一現，很快的被日警全盤破獲，謝雪紅也被關入獄。創立台灣共產黨的台灣獨立、台灣自治的理念終成泡影。

(3) 中共時期

二二八事件是謝雪紅舊台共時期的分水嶺。二二八事件以後，謝雪紅逃離台灣，自此之後，她為台灣的奮鬥已經摻雜了中共的意志。台灣的解放，不再必然是台灣自主管理的獨立工作，台灣解放的工作，已經有中共的政治野心。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¹⁷⁵後，謝雪紅與人民協會成員李喬松的辯論，主張台灣必須自治。她說：「台灣人唯一的出路是實行自治，而且要高度自治，上自省長，下至區長、鄉長都要普選，要台灣人治理台灣。」

雖然謝雪紅的台人自治主張與台灣共產黨建黨時，黨的政治方針揭示的目

¹⁷⁴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38。

¹⁷⁵ 〈重慶談判〉是指抗戰勝利後，中共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於1945年8月28日飛往重慶與蔣介石的談判。國共於十月十日簽定了〈雙十協定〉，承諾要避免內戰。

標，要創立一個獨立共和國¹⁷⁶有一點差距，但也是時勢使然不得不的退讓。

1947年6月，謝雪紅、楊克煌、周明（古瑞雲）從台灣經廈門到上海，謝雪紅先在李應章助手吳丁福醫生家住，後來遷到李應章開的療養院。李應章原本奉組織命令七月要到香港工作，但因謝雪紅進解放區沒有成功，李應章向組織建議謝雪紅去香港工作。自此之後，謝雪紅因和中共的地下黨員李應章等接觸，開始接受中共的工作安排，才改寫了她後半生的命運。¹⁷⁷她在中共的管轄控制下，不但台灣自治與台灣獨立成為遙不可及的目標，謝雪紅也犧牲了性命。

（三）翁澤生的革命目的

翁澤生的一生目標單純，可歸納出兩個目的：

（1）振興中華民族。

從小聽了許多台灣人的反抗日本統治，而被日本剝殺的歷史，埋下了種族的仇恨，興起了民族觀念。為了抵抗外族，所以興起振興中華民族的使命感。

（2）實行共產主義政策。

小學畢業後到祖籍的中國念書，感受到中國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在集美中學念書時，接觸到馬克斯思想，在瞿秋白的帶領下，以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共產主義是最好的中國體制。

因此，翁澤生的一生，都以中華民族為前提，視台灣民族為中華民族的一支。所以，他雖然協助創立台灣共產黨，但其目的是將其置於中國共產黨之下，為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中國而努力。

所以，翁澤生死後，才會被中共譽為真正的共產黨人，中華民族的脊梁。

四、小結

謝雪紅是遵循著國際共黨世界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員，翁澤生則是在中共領導

¹⁷⁶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頁 60-61。

¹⁷⁷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268。

下配合國際共黨命令的台共黨員。兩個人雖然都有中國共產黨的身分或淵源，但客觀上，謝雪紅是在國際共黨指導下尋求日共和中共的支援；翁澤生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當起國際共黨東方局的聯絡人。對台灣共產黨的領導和前進方向，客觀形勢上雖然都遵從蘇俄的國際共黨領導，但在主觀上，翁澤生則是以中共馬首是瞻，對國際共黨的尊重，遠不如對中共的領導服從，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

因此，謝雪紅的台共鬥爭路線，在無法取得日共指導時，以殖民地現狀，發展出根據謝雪紅所判斷台灣形式的鬥爭方法。但這一方式的鬥爭方法和當時中共的半殖民的中國的主流鬥爭經驗相違背，兩個人的領導台共方法南轅北轍，衝突也就在所難免。

李應章和謝雪紅與翁澤生截然不同，他有民族主義的精神，也有社會改革的慈悲心，但他不是純粹的革命志士。因此，在台灣時期的李應章，從事的是體制內的社會改革與教育工作；在追隨中國共產黨時期，也都站在協助的角色。

三人的角色不同，除了反映當時台灣問題的解決有不同層面的思考，也刻劃在他們的歷史定位上。



第四章國家認同的比較觀察

1895 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主權隸屬日本，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台灣稱日本本土為「內地」。但因為台灣人民大多來自福建、廣東，在民族感情上稱領有大陸的滿清為祖國。由於台灣特殊地位，台灣的國家認同非常複雜，影響了台灣人民為台灣這塊土地奮鬥的成績力道，更混亂了台灣的前進方向。

因此，以李應章、翁澤生和謝雪紅等三人不同的國家認同過程，以「主權」和「民族」、「國家名稱」三方面歷史途徑做比較觀察，佐以政治認同和歷史事件的行為的研究，更能夠知道李應章、翁澤生和謝雪紅三者，鬥爭的路線與目標不同的原因。而且，更能洞察台灣問題的根源，找出解決的辦法。

日治時期的台灣，由於割讓的關係，在國際法上，台灣屬於日本帝國。台灣的國家名稱，在日本人口中歸屬日本帝國。只是，台灣終究是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祖國想像又一直存在，希望回歸的動作不斷。所以日本在據有台灣以後，開始實施同化政策、皇民化運動，以風俗、宗教的改革與推廣國語運動，加強皇國民的精神教育，使成為真正的「忠良的帝國臣民」。由於有這兩樣願望的拉扯，國家的稱呼，在法理上是日本帝國，但在民族感情上，還是盼望回歸滿清皇朝。

主權是國家行使統治、支配活動的權力。¹⁷⁸統治支配必須有範疇，也就是領域主權和對人的管轄權。主權的另一意義是國家權力對外自主獨立不受干涉，對內是最高的權力。所以，國家必有有效的統治範圍和管轄國民。因此，在台灣割讓日本以後，日本確實掌握了台灣的地域管轄權，以及對台灣人民的治權，台灣的主權歸屬日本應無疑義。不過，在「民族」的概念上¹⁷⁹，台灣人民深受「中華民族」思想的影響，台灣主權的認定，又有不同的感受。

台灣人民在殖民統治的特殊情形下，法理的統治與感情的歸屬已經非常混淆痛苦，在對「主權」的意義解釋，以及「民族與國家」的關係認知上都不清楚的情況中，台灣人對台灣的「國家」想像與奮鬥，也就有不同的路線與目標差距。

¹⁷⁸ 許慶雄，《國家定位》，頁 8。

¹⁷⁹ 許慶雄，《國家定位》，頁 10。

第一節 國家認同的心路歷程

「國家認同」在台灣開始浮上檯面，肇始於日據時期台灣人經歷了同化和皇民化政策的洗禮。

國家認同問題，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自我命名及自我了解的過程。而台灣是一個多族群，文化歧異，國家認同就會成為問題。

所謂國家認同包含了「國家」及「認同」兩個部分。而「國家」的指涉，是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即為國家，他不僅僅只涉及近代興起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也泛指民族國家出現前的各種政治共同體。

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又可分為：(1)單一民族國家(nation state)，(2)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3)同一民族成立不同國家(one nation, many states) (4)多民族多國家。

台灣的國家認同，經歷了外來移民和殖民統治的經過，是屬於多民族的整合及演變。「認同」則有三層意義，既「相同」、或經「確認」以及「贊同」的過程。李應章、翁澤生和謝雪紅的國家型塑及認同，在台灣人的意識萌芽的時期，因為族群意識的歸屬，台灣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影響，他們各有國家認同的心路歷程。

民族若和國家、主權相結合，就是所謂的民族主義國民國家。¹⁸⁰中華民族是孫文基於近代國家的概念創造出來，孫文把過去鬆散的中國人概念轉化為國民國家觀，這是「中華民族」一詞的意義¹⁸¹。然而，經歷了日據的同化和皇民化，相對於「日本人」或「內地人」的「本島人」、「台灣人」的概念浮上檯面，「台灣民族」的意涵漸漸清晰。在這樣特定時空裡，民族與國家的認同，台灣島民在不同民族觀的角力後，國家意識的撕裂和重組，李應章、翁澤生和謝雪紅不同的國家觀，有其歷史因素，並且在彼此行為摩擦中展現他們的企圖。

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唐山過台灣的移民過程起算，包括荷蘭、西班牙、明鄭

¹⁸⁰ 許慶雄《台灣的國家定位》，頁 12。

¹⁸¹ 許慶雄《台灣的國家定位》，頁 12。

及清朝時期的國家認同，都傾向於以「中國」的歷史思考。1895 年日據台灣是台灣認同逐漸改變的一個重要關鍵。「台灣民主國」的成立，雖然還是奉清為正朔，但已經開始撕裂海峽。而有「台灣人」意識產生，則要拜日本的殖民統治，逼迫台灣人的集體意識萌芽。

1945 年日本敗戰，台灣的歸屬處於不確定狀態，台灣人民困惑於自己是「日本人」或「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還是台灣地位未確定的特殊定位而有「台灣人」的自我發展自覺。對於「國家認同」，台灣陷於國民黨的「中原漢族」認同、「左翼共產黨意識」認同、「日本國民」認同、「台灣國家」認同的混亂之中。

李應章、翁澤生和謝雪紅都出生在日本時代，雖然受到日本同化政策的影響，但因為他們三人的家庭環境、教育背景，影響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和對國家的想像，所以會有反抗與接受等不同層次的作為。茲就政治主權、民族文化探討他們國家認同的心路歷程。

一、政治主權、民族文化

台灣自古不屬中國，迄今還是。1945 年國民黨軍事佔領台灣以前，台灣人幾近三百年長期遭受荷蘭、西班牙、大清帝國、日本等外來政權統治。清國於 1895 年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日本則於 1951 年所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台灣一切權利。綜上所述，可以肯定日據時代台灣主權屬日本帝國所有絕無疑慮。不過，對台灣主權的想像，台灣在 1920 年代前後，經歷國際上民主與民族主義的思想洗禮，主權的想像，透過民主運動，有過想要變動的企圖。

試圖改變台灣主權的運動，在日據時代包括民族運動的親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治運動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階級運動的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新文協、台灣工友總聯盟。

二次大戰終戰之時，日本少壯軍官及辜振甫等台灣士紳，倡議「台灣治安維持會」。1946 年，黃紀男等人成立「台灣青年同盟」，向美國請願公投台獨；二二

八事變及謝雪紅的「人民協會」；謝雪紅於香港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廖文毅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向聯合國請願託管台灣，由全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並對全世界宣示台灣獨立的願望。

在二二八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台灣民眾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想像中的中國做為認同的對象，並未尋求獨立於中國之外。這有點像甲午戰後，一紙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有志之士見割讓台灣已成事實，沒有挽回餘地，遂倉促籌備，改台灣省為台灣民主國，建元永清。其動作是建國，但行為並非叛離清朝獨立，實在是不願被日本外族統治不得已之法。雖然國家認同的行為怪異，以漢族立場，滿清也是孫中山要驅逐的外族，當時的台灣人國家認同於滿族的統治，卻不願被更進步的日本民族統治，在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已經相當錯亂，其實也反映了當時台灣人認同的危機。

但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因為國民黨的高壓統治，導致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仇恨越來越深，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二、李應章的國家認同

李應章、翁澤生和謝雪紅在這段台灣主權與國家認同的思想變動期，依個人的成長過程，有不同的適應、認同和改變。李應章的國家認同有幾個重要轉折期：

1916年李應章考上臺北醫科專門學校，李應章的反抗思想，才真正化為有方法的行動，開始與同學組織了「弘道會」。這時的李應章，由於大量閱讀日本左派書刊，大杉榮、山川均等人的著作，為弱勢發聲及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思想日趨成熟。1918年學校舍監貪污，他以反舍監的貪污行動，做為閱讀前進理論書刊的實踐。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臺灣，誘發了李應章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自決思想的意識，更加奠定李應章的民族觀念，開始認識到群眾團結的力量和革命的道理。五·四後不久，李應章和廈門留學生在校內舉行六·一七“島恥紀念日”的秘密集會，民族意識抬頭。

1921年6月，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林獻堂當總理，蔣渭水理事兼幹事，李應章當選理事兼二林幹事。這時期的李應章有了更明確的方向，一是散佈民族主義思想，跟隨臺灣文化協會做文化宣導及覺醒工作；二是承認日本對臺灣的治權，揭發臺灣政治、經濟、社會的不平等，並且實際從事農業鬥爭，研究甘蔗生產成本，提升蔗農所得。為此，他在1923年9月臺灣文化協會彰化支部開會時，李應章和詹奕候向大會提出「臺灣農村問題實際鬥爭案」。

182

臺灣文化協會及民眾黨，其實都是有民族意識的團體，但也都屈服在日本統治的原則下從事提升臺灣人民的利益。臺灣文化協會是廣泛統一戰線性質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¹⁸³。李應章在那個時空裡，思想雖然更朝民族主義前進，祖國的想像明確，但行動上卻謹守台灣是日本主權的現實。這時的李應章，國家的政治管理與民族感情的認同是分開的，他無法融入大和民族的大家庭，卻又屈從於政治現實。從李應章行為觀察，他謹守台灣是屬於日本主權的事實，其實已經認同於日本擁有台灣的國家主權：

（一）二林蔗農的鬥爭，李應章在每一階段都依循著國家主權的限制去申訴，期望在體制內資本家或政府有正面的干涉回應。但是，擁有台灣治權的日本，原本就有改變台灣民族認同的企圖，培養台灣人成為皇民，凝聚台灣的日本國民觀，將台民族融入大和民族中，自然不允許漸進的台灣民族的萌芽，甚至是中華民族的虛擬認同。因此，李應章陷於主權與民族及國家認同的

¹⁸² 應章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9。

¹⁸³ 李應章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7。

混淆，在日本南進政策漸漸成形的時空，日本當局自然不允許民族主義興起，李應章後來離開台灣轉往中國，就有逃難和祖國想像的成分。

(二) 二林蔗農事件發生的重要時刻，蔗農組合的重要幹部李應章、詹奕侯、劉崧甫、蔡淵騰、陳萬琴等都不在現場，誤判資方和政府會在體制內解決爭端，肯定了日本治權是不容挑戰的禁忌。

其實，二林蔗農組合對資方的要求是溫和的，組合的要求決議有五項¹⁸⁴：

- 1、甘蔗收購前公布收購價格。
- 2、肥料任蔗農自由購買。
- 3、會社與蔗農偕同甘蔗收購價格。
- 4、甘蔗過磅應會同蔗農代表。
- 5、會社應公布肥料分析表。

台灣民報昭和 2 年 4 月 17 日登載二林蔗農事件永山氏的辯護要旨：

「本事件的發生似乎看作是思想問題聯絡文化協會的，其實卻是單純的農民問題。是在林糖區域內的蔗農民生活上的要求，不過是甘蔗起價上的要求問題。」

從李應章參與蔗農的生產與甘蔗收購價格要求，提出的五項決議，或是二林蔗農事件發生的因，李應章只在認同日本政府的管轄，做出陳情與申述的工作而已。這一行為，不就是認同日本政府對台灣的管轄權。雖然，李應章的民族意識依然強烈，但是要資產階級的李應章，正面的去做反抗日本統治的行為，在他還沒有遭遇更大的痛苦前，他還是遵循著資產知識分子的理智，去做政府較能認可的社會改革運動。

李應章在台灣的時候，他對台灣的主權並沒有模糊空間，他承認日本擁有對台灣的治權。所以，他在台灣的行動都依循著政府的框架，就算二林蔗農事件發生後，農民群情激憤，要去攻打警察局，奪取武器起義，但他依舊不肯，寧肯束

¹⁸⁴ 李應章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 52。

手就擒，被押到北斗警察局。¹⁸⁵

自從李應章因二林蔗農事件被關出來後，他的社會改革精神退卻了。雖然李應章有說法：¹⁸⁶

「我的刑期滿了，出獄後突如其來的精神上的大打擊，父親死亡，家屋燒毀，……兩件事情就辦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農民組合的關係是由莊萬金直接負責，專門辦理，我只做到顧問的地位而已，但在山寮事件、源成農場事件都有參與過。自從由於保甲協會的失敗而被宣告封閉言論之後，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一不能寫，二不能耕，我在台灣是沒有前途的，對於革命也不能起什麼作用，這是一點。第二點祖國大陸革命沒有成功，在台灣無論怎樣是搞不出名堂的。」

因此，包括簡吉、趙港都曾當面批評李應章沒有勇氣，一碰敵人鎮壓救回祖國去。簡吉和趙港的批評是很中肯，不過，他們是被二林蔗農事件眩惑了，以為李應章是個革命家，所以期待錯誤。

其實，李應章出獄前的所謂兩個計畫，有一點點天馬行空；自出獄後的表現更是荒腔走板，在他的自述這麼說¹⁸⁷：

「我在監獄裡就有兩個計畫，一、可能我家裡被搞得家破人亡，（尤其父親死了）我就乾脆的不回家，之後再做全島的巡迴演講，喚起全島人民和農民團結起來，做進一步的鬥爭，如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等等；第二，如果家庭平安無事，我們先回家去看看，然後出門經日本和幾個知名的社會主義者聯絡一下，再回祖國做今後應做的革命步驟。」

李應章在監獄是被禁止通信，聽不到外面任何消息，對其父親的死，他是回家後才知道。他這樣說：

「一下車找不到我的家，更找不到我的父親，乃由堂兄帶我到他家裡的一間房間，白窗簾拉開指給我看的是一具棺材。我一看就暈過去。」

李應章說他回家後才知道父親的死而暈過去，怎麼可能在獄中就有兩項怎麼

¹⁸⁵ 李應章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11。

¹⁸⁶ 李應章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49-50。

¹⁸⁷ 李應章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47-48。

說都不通的計畫。李應章自出獄後只有軟性的組織農場種稻米是對糖廠的反制以外，出獄後接近四年時間根本無所作為，所以，簡吉、趙港才會批評李應章。筆者詳細翻閱李應章自述〈有關蔗農鬥爭的被捕情況〉，以十多年社會記者對案情的判斷功力作研判，以及歷史事件的呈現及李應章當時行為認為，李應章是為了銜接二林蔗農事件前的社會改革作為到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之間的空檔，所做的事後解釋。

李應章其實只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和社會不公不義的改革者，是認同於日本統治的民族主義者，他不是具備有如簡吉、趙港的革命胸懷，怎麼可能拋棄身家性命去和統治台灣的日本拼鬥。所以，他在遇到日本強力鎮壓的時候，轉移陣地以策安全的想法，就會以他自己所說的：「我反駁他們說，這並不是向敵人低頭，是為了更徹底的革命，所以才這樣做。」

簡吉和趙港對李應章出獄後幾年時間都無所作為，還以家庭因素和被鎮壓為藉口，要逃離台灣到中國大陸去，一再有意見，只是李應章無法接受。顯然，他們對李應章不夠了解。

以政治與民族思考分析李應章，他在思想上，雖然在家庭上有中華文化的薰陶，但對祖國的想像卻沒那麼清晰。他的祖國想像是緣於他祖母告訴他的歷史中國，但當時的中國有共產黨和國民黨兩股勢力在鬥爭，都號稱是要重振中華民族。李應章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國民黨或共產黨的統治誰會比較好，他還不了解。

直到李應章逃離台灣到了廈門，在和台灣老鄉張水松談國民黨和共產黨等中國國內情勢¹⁸⁸，決定加入共產黨以後，祖國的國家認同才起步。

「國家認同」第一種用法是表示「一個政治共同體與先前存的政治共同體是同一個政治共同體」。第二個意義表示「一個人確認自己歸屬於那一個政治共同體，並且指認出這個共同體的特徵」。第三，國家認同還可以指涉「一個人表達自

¹⁸⁸ 李應章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 14。

已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有何期待」

李應章來到中國，初步的國家認同，是屬於第二個意義「一個人確認自己歸屬於那一個政治共同體，並且指認出這個共同體的特徵」。他到廈門以後看到國民黨無能的統治，心嚮往中國共產黨而成為黨員，表達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期待。

李應章在台灣時期，認同的是資產階級陣線的台灣文化協會體制內改革，所以在行動上，是以日本政府的治權為母體，而提出改革與請願。¹⁸⁹就算蔗農群情激憤，李應章仍然謹守國民分際，不敢有逾越。就算出獄後知道父親的死與他被關憂鬱煩惱有關，也只是種稻不種甘蔗的消極反抗。而他於1928年2月3日服役期滿出獄，當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緊接著農民組合展開翻天覆地的鬥爭，簡吉和趙港等農組幹部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李應章卻不動如山，沒有積極的鬥爭行為。這不就反映了李應章在體制內活動，沒有激烈對抗日本政府的打算嗎。

針對二林蔗農事件爆發時，李應章等幹部不在場的問題，經過幾年的觀察思考，賴和又在1930年的寫下〈豐作〉，這與之前寫下的《覺悟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完全不同，這次是對包括李應章在內蔗農幹部的揶揄：¹⁹⁰

兩相對照，蔗農事件的爆發，蔗農幹部都不在場，而事件爆發以前，緊張的交涉已經看出來山雨欲來風滿樓，蔗農幹部的警戒心怎麼突然不見了，是愚蠢還是逃避？心態到底是怎麼呢？

因為山雨欲來風滿樓，所以蔗農幹部在李應章診所組織鬥爭本部，隨時注意事態的發展。而蔗農衝突發生在二林庄竹圍仔，距離在二林市區的鬥爭本部約一公里多遠，農組幹部騎鐵馬不會超過五分鐘就到。怎麼事件發生時只有蔗農在場，幹部都不見。賴和以詩作隱喻幹部只要利益，害怕犧牲，恐怕也有幾分真實。應驗了李應章等蔗農幹部不想逾越治安分際的心思，只求在現有體制下能夠獲得政府對蔗農政策的重視，改變甘蔗收購價格而已。誰曉得最不願意看見的警民衝突

¹⁸⁹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

¹⁹⁰ 賴和，〈豐作〉。杜雲珏，「歷史記憶的現身與缺席：以二林蔗農事件的蔗農組合幹部與蔗農為例」《文史台灣學報》，頁220。

發生了。這也不是蔗農組合幹部始料未及，是情勢的發展無法控制。

李應章的離開台灣，在他的自述是說因為可能再次被抓，是不得已的辦法。因此，可以判斷若沒有危險，李應章是不會離開台灣。但在台灣的李應章，也不會有太多的作為。他在1930年雖然應謝南光之邀有過「寧為玉碎，不願瓦全」的演講，追隨的是已經漸漸改變成中間偏左的蔣渭水路線，但他不像蔣渭水面對日本統治者的積極抗爭，也不像謝南光對革命的執著，毅然決然全家搬到中國大陸搞革命。這個時候的李應章，顯然介於林獻堂的妥協和蔣渭水的抗爭之中，對日本統治台灣還有期待，在對日本的國家認同上雖然已經更為模糊，但他還是願意在這個環境生活。

不過，離開台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李應章，在對台灣的主權或中國的主權已經有不同看法。這時候的李應章，是以「一個人確認自己歸屬於那一個政治共同體，並且指認出這個共同體的特徵」來做為他對主權與國家認同的辨識。在李應章自述有一段話：

「我於1932年1月離開台灣到了廈門，先到一位親戚林家，剛卸下行李坐定，日本住下領事館的爪牙就到林家來探動靜。我隨即離開，住宿旅館，幾天後遷到廈門市郊區，台北醫專的同學林醒民辦的慈善醫院。這時“一·二八”事變發生了，十九路軍在上海進行抗日戰爭。慈善醫院要籌組北上醫療隊。我興奮地報名參加，想藉此機會找到抗日愛國的門路。」

「一位開照相館的台灣老鄉張水松常來幫助，很熱情。我們一有空就談起台灣文協和農民組合，還談到國內形勢，對紅軍、對國民黨的看法。當我表露追求共產黨而不得的心思時，他就緊握我的手說“真不愧為一個革命家”。並答應給我介紹。第二天，他介紹嚴壯真¹⁹¹來找我，要我先加入互濟會。」

李應章離開台灣，開始找出路。他好像忘了台灣的農民組合，只是清談的和張水松緬懷過去。在他離開台灣後，台灣的農民運動變成過去式。他在中國找尋

¹⁹¹ 嚴壯真海南人，中共廈門市委組織負責人。李應章自述，《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14。

他民族意識中的中國，並且以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目標，開始他不一樣的革命旅途。他已經跳脫了台灣的侷限性，將民族的想像付諸實際的行動，以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為依歸，實現他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的旅程。

三、謝雪紅的國家認同

謝雪紅出生於貧困家庭，父母每天為生活奔波已是精疲力盡，沒有多餘的精神去管國家民族這樣的身外物。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這樣的描述他的父親和她們所受到的教導：¹⁹²

「父親完全是個文盲，沒有半點文化，她心中盡是些由祖輩傳下來的封建主義和宗教迷信思想。所以對我們講的都是九層天、九層地，人做好事就有好報之類的事。此外，父親對國家受盡列強壓迫，百姓貧窮落後這類事情，也是有模糊概念和認識的；他還有種愛國情操，時常對我們說：中國能出一位真主就好了。」

謝雪紅的父親是在 1912 年 5 月去世，這就表示在他的祖籍地還是滿清統治時期。謝雪紅父親的國家認同，顯然並不一定以漢族統治為標準，而是多種族的傳統皇權政治。所以他會說出「中國能出一位真主就好了」。但他又對居住地的台灣不置一詞，等於默認了日本對台灣的管轄。在政治管理上，他只祈求於真主的出現，至於真主屬於哪一民族的人並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管理族籍地的，必定是要認同中華文化的人。

謝雪紅的父親移民台灣，在日本政治的管轄下他並沒有異議，只是努力地求生存，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已，就如謝雪紅所描述：¹⁹³

「父親即跟隨祖父在那裡覓得土地，開墾定居下來，也按照老家的習慣種起白薯來，當年台灣已有一種紅薯，比白薯產量多，薯肉又較甜較細，比白薯好吃。這種紅薯後來傳到福建去，被稱為台灣番薯，呈金黃色，和福建本地呈橘紅

¹⁹² 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59。

¹⁹³ 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17。

色不同，所以，在新埔的生活條件比福建老家好。我小時候，曾幾次聽父親說，在福建都吃不到這種紅薯。他們主要的副食品是蘿蔔乾、鹹魚等。」

謝雪紅就在日本管轄的台灣成長，她受父親傳統倫理教育的影響，以身為女性逆來順受的堅忍精神，度過了沒有民族與國家意識的少女時代。

謝雪紅是到日本以後，在「米騷動」中才體會到政治管理層面的問題，為她改善台灣的環境，選擇政治制度，起到刺激的作用：¹⁹⁴

「我在神戶兩三個月間，第一次接觸到日本革命運動，因當時正是日本米騷動發生後不久，神戶又是米騷動最激烈的地方之一。米騷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米價高漲，糧食被資本家壟斷，囤積居奇，窮人買不到米吃，於是，廣大勞動人民自動組織起來，去打開壟斷糧商的糧倉，把糧食搬出來分給大家。當時，林姓商人一家都把他們親眼目睹的情況說給我聽，他還說窮人起來搶大糧商的糧食是合理的，這種窮人和富人鬥爭的事實，第一次在我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謝雪紅的政治啟發於日本「米騷動」，民族文化的認同則在她於1919年4月到青島，剛好碰上「五四運動」，她居住的林姓商人家的妻子，經常帶她去聽學生的演講，聽他們說“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新鮮的話。他說：¹⁹⁵

「青島是喚醒我漢民族精神、階級鬥爭思想以及對幸福社會憧憬的地方。」

在青島的日子，她才有民族的覺醒和對幸福政治的憧憬。不過，以他沒有受過教育的文化水平，對漢民族的意義還是模糊。她這樣說過：¹⁹⁶

「回憶當時我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張樹敏欺騙，未能趕快脫離跟他的關係，其主要原因是：當時，自己基本上完全是一個文盲，社會上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其次是兄弟和二姐還是很窮苦，不可能幫助我。」

有兩件事讓謝雪紅接觸了台灣文化，比較有系統地接受啟發文化與政治思

¹⁹⁴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128。

¹⁹⁵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131。

¹⁹⁶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134。

想。一是 1921 年謝雪紅居住在製酒工廠對面時，林獻堂和楊肇嘉先後拜訪過謝雪紅，讓她初步認識文化協會；二是 1922 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蔡蕙如和林幼春被判要入獄，當時，文化協會組織群眾到台中火車站去歡迎他們，她聽到此事，騎自行車趕到還衝進去和蔡蕙如握手，並對他說：¹⁹⁷「你們為台灣三百萬同胞，太辛苦了，……敬佩得很。」這件事以後，謝雪紅開始一有機會就去聽文化協會舉辦的演講，啟蒙了她對台灣文化的認識和關懷。在她出生地的台灣，接受台灣文化的洗禮，更能感受到文化的欺凌和政治的壓迫，文化的認同和政治管理的選擇，逐漸在文化協會的教育下留下印象。不過，她還是像一張白紙，就如她後來到上海所說：「當時，我和林木順的思想都很單純。」

那時候的謝雪紅，到底是愛台灣？或是愛祖國？其實都是。在民族的認同上，她是愛祖國的，正如她所說：¹⁹⁸「台灣自從被日地侵占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鞏固他在台灣的政治地位，妄圖消滅台灣人民的民族精神，採用了一種極毒辣的離間政策辦法，使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間發生矛盾，不能團結。」

這是日本帝國對台灣治權掌握的手段，迫使台灣人民在政治上不得不選擇日本。但在文化的區隔上，她又將台灣與祖國一分為二：「我們隱瞞自己是台灣人，正中了日本帝國離間政策的毒計。」¹⁹⁹

因為台灣的治權在日本帝國的手中，台灣的政治是由日本的台灣總督府操作，而台灣民族與大陸祖籍地的同質性，與日本民族有所不同。所以，謝雪紅只能在民族與文化、國家政治的混淆中摸索前進。

謝雪紅的「台灣民族」確立，以及台灣政治的獨立與完整性，進而邁向台灣的國家認同，其理論建構是她留學俄國東方大學的學習，以及國際共黨對台灣地位的確認。東方大學的課程有歷史、黨史、西洋史、東洋史、世界勞動史、社會發展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列寧民族問題、共產國際的戰略和政策、殖民地問題、軍事訓練和俄語等。學習的課程讓謝雪紅增加了民族問題與國際情勢發展的

¹⁹⁷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148。

¹⁹⁸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171。

¹⁹⁹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171。

認識，又因為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謝雪紅被劃歸日本班，在思想理論上已經切割了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同質性問題。更重要的是謝雪紅在東大學成之後，接受到共產國際的命令是：²⁰⁰

「共產國際決定命令謝飛英（謝雪紅）、林木順回國，組織台灣共產黨，由謝飛英負責，林木順協助。……由於目前情況還搞不清楚，台共組織成立後暫時作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透過日共中央間接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待將來才接受共產國際直接領導。」

這一項共產國際的命令，是將台灣視為民族國家，不屬於日本帝國，更不屬於中國，中國沒有管轄上的關係。台共的綱領，是把「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連貫起來，台灣民族首次在共產國際的命令出現，引導出謝雪紅的台灣民族論的出籠，奠定謝雪紅的文化台灣與台灣國家認同的基礎。

綜上所述，1943年以前的日治時代，台灣一直被當作亞洲的少數民族看待。但在第三國際解散，開羅會議後，蔣介石才對台灣有野心，中國共產黨也重新評估台灣的地位。在這以前，毛澤東和蔣介石皆曾仗義直言台灣應該獨立，中國共產黨同意共產國際對台灣的獨立規劃。因此，在日治時代的特殊時機，謝雪紅提出「台灣革命」的主張，以台灣民族與日本民族切割；以建立台灣國和台灣總督府相對抗。但是，1931年全面的逮捕台共行動，象徵著整個台灣抗日運動的結束，謝雪紅經過近十年的監獄生活，以及日本戰敗，時代改變，台灣已經不是由日本統治，謝雪紅的台灣民族革命有沒有改變呢？從二·二八事件中，已可看出端倪。

在二·二八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台灣民眾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以中國做為認同的對象，並未尋求獨立於中國之外。謝雪紅在事件中提出「台灣自治」的主張，她的主張是和台北處委會四十二條政治要求相呼應。

²⁰⁰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233。

這是一種聯邦制的構想，在台灣民族文化之上，遷就中華文化的政治現實，變相的台灣獨立主張。

但在二·二八事變後，台灣人國家認同的劇變，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勢力分成兩個路線發展，採取激進的台獨路線者如廖文毅等，先後在日本、美國組成台灣獨立團體，以相抗衡。信仰社會主義左翼國家認同者謝雪紅者，則投靠中國共產黨，希望依賴中共力量解放台灣。自此以後，謝雪紅人在中共的羽翼下，不得不委曲求全，對台灣主權的完全民族自治，降格為半民族論，呼應中共的民主聯合政府。

謝雪紅二·二八後逃離台灣到香港，在香港組織「台灣問題研究會」，並以個人名譽發表〈謝雪紅告同胞書〉²⁰¹總結了事件的經驗和她對台灣政局的看法，以聯合陣線的策略，以及追求民主自治的決心，展現她的企圖和改變。

陳芳明在他的《謝雪紅評傳》引用《台獨月刊》陳小雲的評論說：²⁰²「錯誤的選擇使她自身也以血和淚為代價接受其教訓。值得台灣人喝采的，是她受制於中共的絕境，仍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駁斥中共及其爪牙汗蟻不實之詞，像踏不死的野花一樣，維護台灣人民光榮的形象，保全了她有錯必改，寧死不屈的氣節。」

不過，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的評論，在台灣民族建國的主張上，她雖然還能堅持台灣人治台的理念，但已經將台灣降格為中共領導下的聯合政府，舊台共已是名存實亡。這或許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所以必須採取的逾迴戰術，確保台灣最低的利益。但實質上，台灣民族與政治主權獨立已經被削弱。

這是人性的懦弱，也是一種彈性策略，不能苛責謝雪紅。因為，她至少保持了台灣人管理台灣人的自治理念，雖然頭頂上不得不接受有個中共領導的事實，但也間接強調了她的台灣民族論。

²⁰¹ 謝雪紅，〈台灣事變女英雄謝雪紅告同胞書〉，《南橋日報》，（新加坡：1947年8月25日）第一版。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78-280。

²⁰² 陳曉雲，〈謝雪紅和伊藤律投奔中共的下場〉，《台獨月刊》，第110期，（紐約：1981年2月28日），頁10。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524。

從民族革命看謝雪紅對中共的鬥爭，因為她在中共管轄內生活，鬥爭上要有技巧，不得不在台灣民族上冠上中共的領導，但她自始至終都認為，只有台灣人才能拯救台灣的命運。²⁰³所以，她雖然退讓了，但她還是引用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草案第十二條所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普選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的最低政治標的。他的畢生經驗等於在提醒台灣人民，台灣的前途不在中國、日本或任何國家，而是在台灣本土，台灣人手裡。她的國家認同，一直以台灣為最高標的。對中共的民族國家認同，並沒有在她的心裡生根。

四、翁澤生的國家認同

翁澤生的國家認同幾乎是一以貫之，雖然出生在台灣，但從小受到敵我意識革命的影響，在民族意識上，將日本化為竊取台灣的主權，自然屬祖國所有。

翁瑟士教導翁澤生台灣是祖國的固有領土，中國是我們的祖國，台灣的主權是屬祖國，但一時被日本強佔了。但台灣收回後由誰管呢？翁瑟士說是管中國的政府，但當時管中國的政府是被漢族所稱的外來滿族。這真是微妙的邏輯，只要能管到中國，台灣就屬他所有。這不就是說日本只管到台灣，沒有管道中國，所以台灣不屬於日本，是屬於管祖國的政府，一旦日本管到中國，中國的祖國就歸日本管，台灣的主權自然就屬日本嗎。

翁瑟士的祖國是祖居地民族的祖國，至於管轄祖國的政府，則又有另一說法，他也講不清楚。翁澤生的國家認同，也就從民族主義的祖國認同開始。國家的認同，是擺在管理祖國的政府體系之下。只要是有效管理祖國的政府就是認同的國家。因此，翁澤生從小就認定台灣不是日本的，所以要反抗日本統治。

不過，在翁澤生回祖籍地讀書受到各種思潮的影響後，管理中國的已經不是

²⁰³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535。

滿清帝國，進入了中華民國時代。在那軍閥割據的年代，興起了管理民族祖國的政府體制到底要選擇哪一種的疑惑？民族國家的認同是確立的，但管理國家的體制呢？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他面臨的抉擇。

雖然無政府主義在日據時代的台灣也有市場，翁澤生傳的一段描述：²⁰⁴

「此時無政府主義也有一定市場，由幾個留日學生發起，成立於這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在傳播革命思想、啟發民族意識的同時，也夾雜著一些無政府主義的成分。」

日本總督府對台北無產青年打破舊習講演會也有評議：²⁰⁵

「託詞打破舊陋習，實則從事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宣傳。」

為此，謝雪紅的回憶，對翁澤生是無政府主義者有以下說法：²⁰⁶

「對翁所介紹的這些人，謝雪紅私下認為除林日高、庄春火、李曉芳、庄泗川外都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包括翁本人。」

翁澤生對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自清，他舉“台北無產青年”所辦演講中他演說的話：²⁰⁷

「台灣青年必須聯合起來，推翻日本殖民統治，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解放。他在演講中還對無政府主義進行批判。」

顯然，翁澤生在集美中學裡的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碰撞，他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不過，在國家結構的想像中，無政府主義也曾是他探索的目標。更重要的是他以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為目標，沒有妥協的餘地；而台灣屬中國更是他從小認定的事實。至於，中國要成為怎樣的國家，他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擁抱中國共產黨的理想性。

翁澤生形容在對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選擇碰撞中，因為俄國十月革命及馬克思主義的成功實踐，以及列寧的話，讓他拋開無政府主義的困擾，選擇了馬

²⁰⁴何池，《翁澤生傳》，頁 19。

²⁰⁵何池，《翁澤生傳》，頁 33。

²⁰⁶何池，《翁澤生傳》，頁 146。

²⁰⁷何池，《翁澤生傳》，頁 30。

克思主義：²⁰⁸

「列寧的話：無政府主義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這種思潮，在無產階級奪權前，直接破壞工人運動和暴力革命，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

綜上所述，基於兩點因素，一是翁澤生自小認為台灣屬中國。是認同於中華文化而非日本文化；二是國家體制醉心於馬克思主義。因此，他的國家觀是以中國包含台灣，而以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家制政治體系為目標。因此，他後來協助成立台灣共產黨，其最終目標是要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

小結

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謝雪紅不論在文化民族層面最關心的是台灣，在政治管轄的主張，她一貫主張台灣人治台。雖然，她曾經依賴中共而限縮了主張，但至少他還能堅持底線，在台灣人治台上毫不讓步。這也使得她的晚年不得中共所喜，遭受迫害。

謝雪紅的「台灣自治」，甚至是「台灣獨立」的國家主張，是不同於大舉中華民族認同的翁澤生。翁澤生自始以中華民族主義的「中國人」自居，他選擇了共產國家制度的中國認同，雖然他也協助謝雪紅創立台灣共產黨，但他的目的並非台灣獨立於中共之外，他是有大一統觀念的國家主義者。

至於李應章，由於資產階級成分與家庭因素，在民族的認同上堅定地和大和民族區隔；但在政治管轄上，有了資產的顧慮，在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是劃定圈圈地在體制內做訴求，是緩慢的政治改革漸進者，國家認同是因利害關係而有所應付。但在他離開台灣後，選邊加入中國共產黨，民族與國家的認同趨於一致性，認同台灣屬於中國。

第二節 國家認同的比較

²⁰⁸何池，《翁澤生傳》，頁20頁。

台灣是多種族的社會，經歷多次的外來政權統治，使得民族認同從中華民族的虛幻，轉化到台灣民族的形成過程緩慢；國家認同在中國傾向與外來政權管理統治的矛盾中撕裂。李應章、翁澤生、謝雪紅三人在台灣特殊環境中產生三種不同國家認同心路歷程，反映出台灣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其實，台灣的國家認同，包含了島內居民想確認自己屬於那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國家的心靈急迫感。

台灣自移民開始，就在外來政權的剝削下求生存。1661年鄭成功攻佔台灣，鄭氏的中心思想，乃是認同於明朝的中國的立場思考。台灣納入日本帝國，但絕不是要脫離中國；即使獨立也仍自認為中國的一部分，此時期的抗日行動在國家認同上仍以清朝為對象。而有「台灣人」意識雛型的產生，便濫觴於日本的侵略統治。

日本的同化政策與皇民化的施行，激發了族群對抗的意識，台灣人的形象開始浮現。謝雪紅、翁澤生、李應章等的國家認同，就如上節所說，依據他們的家庭環境和教育，各有不同的發展。他們不同的國家認同過程，反映出台灣移民發展到日治時期台灣人形象出來後的國家認同矛盾，也是台灣前途的困擾，必須設法解決的問題。

謝雪紅、翁澤生、李應章三人不同的國家認同，其癥結就在於台灣人的角色浮現後，在歷史的中華文化與逐漸形成的台灣文化間，台灣人的文化歸屬沒有共識；領土主權的範圍更加模糊。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或者是日本人？在台灣的主權屬於日本的歷史現實，使台灣國家認同的分歧更甚。

雖然同樣是移民來台的台灣人，對國家、民族與政權管理上有不同的感受而更加混淆，因此，依據個人的感受，而有了不同的國家認同。也由於台灣地位的不確定性，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有的人並不是始終如一，李應章就是。

一、李應章的國家認同特色

李應章的國家認同特色，從行為研究途徑（behavioral research approach）有下

列幾點：

一、妥協性

在二林蔗農組合成立的過程中，李應章等是溫和的說理。根據大正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台灣民報報導，每包砂糖賣出的消費價不下 15 元，每千斤甘蔗可製造一包砂糖。林糖向蔗農收購甘蔗每千斤只有 4.7 圓，接近蔗農生產成本，蔗農因而生活在飢餓邊沿。李應章等提出每千斤甘蔗收購價 7 元，首先以計算的蔗農生產成本向資方請求，因為沒有得到回應，後來又轉向官方陳請。每一個過程都是溫和理性，沒有肢體衝突。

以之和簡吉的農民組合比較，是以全島總攻擊方式的強應手段不同。昭和二年五月八日台灣民報一則〈戒嚴令下的二林〉報導，4 月 18 日農民組合巡迴到二林，組合的幹部只有簡吉、趙港、侯朝宗，以及台灣民報記者謝春木。簡吉的演講是詳述農民的慘狀，呼籲農民節節組織農民組合。簡吉被命令終止演講後侯朝宗接續演講，講的是農民的利潤都被資本家吃掉了，農民生活困苦，甚至摯愛的子女都要賣到煙花讓人玩弄。明擺著的是要激起農民的反抗，要以無產對抗資本家。

同樣的農民問題，李應章採取的手段是計算蔗農的生產成本和資方的利潤，以講理的方式和資方溝通，得不到善意反映後才向官方陳請。但就在二林蔗農事件爆發前夕，李應章等還因警方介入調停，還在盼望著溝通有成。甚至在二林蔗農事件爆發後，仍然理性的告訴農民不要衝動。其理性和妥協性，跟他同一年代的簡吉、謝雪紅、翁澤生有很大的不同。

二、現實性

李應章的抗爭精神少有突破性的革命內涵，反而有較多的現實考量。李應章的抵抗行為，雖然從他籌組全台青年會，當台灣文化協會理事及二林幹部看得出來。但是，他向現實低頭的機會也很多，在他的自述有說法：²⁰⁹

²⁰⁹ 李應章，《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頁 6。

「1921年4月，我和同學吳海水、何禮棟根據學生大會的經驗，在台北籌組全台青年會，向社會名流林獻堂、林熊徵等籌募資金，因而認識了蔣渭水、蔡培火。由於蔣渭水提議將青年會擴大為台灣文化協會，我們就和蔣渭水一起籌備，於同年10月成立台灣文化協會。這時我父親一再要我回鄉養家，且我已於1919年夏天成婚，我只好回二林開業行醫。」

李應章回二林開業的根本原因，其實就在於家庭的照顧和農地資產的管理能夠和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宗旨相結合，兼顧了現實和理想。這樣的行為模式，為了顧及自己的現實利益，雖然有抗爭的意念，但也現實利益的顧慮容易和當權派妥協。

二、翁澤生的國家認同特色

翁澤生的國家認同特色跟李應章大不相同，他有兩點堅持：

一、日本殖民者不只民族性不同，根本就是敵國，必須起來反對日本的統治，而且是勇敢的面對面反抗。他10歲時發生苗栗事件，讓他從小聽到的抗日故事變成一幕幕現實，²¹⁰影響他自小以行動反對日本統治：

「羅福星是廣東人，小時候隨祖父遷居台灣，在苗栗牛桐湖居住，長大後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歧視和壓迫，回到祖國大陸，此時祖國正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展開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他認識了黃興等同盟會領導，加入同盟會，參加廣州起義，之後被派遣回台灣開展革命活動，組織武裝起義，驅逐日本侵略，以期收復台灣。羅福星集合12名志士回台，以大稻埕為基地，分南北兩路進行發動，聯絡興中會的愛國志士陳少白、楊心如等，以苗栗為中心，以同盟會、三點會、及黃光樞的華民會等名義在全台各地發展組織，羅福星提出兩岸聯手、驅日赴台的主張，得到台灣人民熱烈響應，申請入會者達9.5萬人。大規模的起義爆發前夕，由於叛徒告密，導致失敗。羅福星高唱《祝我民國詞》慷慨就義，同時被殺的革命領導人有20人，還有921人被判刑，視為苗栗事件。」

²¹⁰ 何池，《翁澤生傳》，頁6-7。

在這一事件後翁澤生進入太平公學校上學，又發生“西來庵”暴動，被當作亂民殺害的有數千人，使得他更加仇日，在公學校的少年時代就敢面對面反抗日本：²¹¹

「“六.一七”始政紀念儀式上連絡鄭石蛋、高兩貴、胡柳生、周知成等幾個同學，拒絕按規定喊“日本帝國萬歲”等歌頌日本統治的口號。」

除此之外，在課堂上以漢語而不以日語回答老師的問話。對日本統治者而言，這是不服皇民化的惡劣舉動，翁澤生除了被校方訓斥，還威脅被開除。小小年紀，已經有了明顯的敵我意識，並且勇敢的採取行動。

二、至始至終 認為台灣的主權歸屬祖國。

翁澤生從小認為台灣主權屬於祖國，這是翁澤生的父親翁瑟士教育翁澤生的歷史概念。所以，他在 1923 年 7 月 30 日太平公學校為紀念公學校創辦 25 周年暨改名 10 周年舉辦歷屆校友同學會，強調台灣人講台語被制止，他激動的對大家說：

「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不能講自己的語言，世界上哪有比這種不自由更痛苦、更恥辱的事嗎？」²¹²

這件事是被當時的台灣總督府立案的“太平公學校事件”，載入日本總督府的“反日運動檔案”中。

翁澤生自小敢於面對面抗爭，強調台灣的主權屬於他認定的祖國，不同於李應章的祖母，自小告訴李應章的是緬懷祖國，死後要回祖國安葬，將台灣和她移民來處的祖國分開，間接承認台灣主權歸屬日本。李應章祖母的祖國教育，雖然給於李應章文化上對中國的認同，但默認台灣主權屬日本。所以，在對日本殖民的反抗上，翁澤生自始絕不妥協，堅決地要趕走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李應章則溫和多了，她不去挑戰日本殖民的權威，但又不甘心台灣人被不同的民族日本管。這種體制內合理要求改革的動作，在二林蔗農事件的請願中，不敢面對衝突，挑戰治權，表現得淋漓盡致。

三、謝雪紅的國家認同特色

²¹¹何池，《翁澤生傳》，頁 10。

²¹²鄭慧嘉，《紀念翁澤生烈士百年誕辰弘揚台胞愛國主義傳統》。何池，《翁澤生傳》，頁 27。

謝雪紅的國家認同特色，又是不同於翁澤生、李應章的另一典型。由於家庭文化低，自己又沒有受教育，謝雪紅自小有的是“認命”，對國家是怎麼一回事？民族是怎麼一回事？根本模糊不清。在《我的半生記》中，謝雪紅有段有趣的描述：

「我幼年時，聽說清朝政府或日帝政府要修建電訊線路系統時，父親被雇用搬運電訊桿，挑“銅線批”等器材的工人。」²¹³

清朝政府或日本政府，對謝雪紅而言只是一個國家名稱。謝雪紅是依據管轄台灣的先後，稱呼清朝政府及日帝政府，對台灣的主權轉移，沒有民族認同的沉重感。

自小只知道被管，管人的最大，誰管理台灣，誰就擁有台灣的主權。對國家、民族的概念模糊的謝雪紅，在成長的過程中，更能感受她在台灣的生活點滴。隨著她有機緣到日本、中國、俄國東方大學學習，她所能憑藉的只有台灣經驗，能夠連結國家和民族觀的也只有台灣經驗。

因此，歸納謝雪紅的國家認同有三個特點：

一、以台灣為基本思考。

謝雪紅不論在日本或中國遇到革命性問題，都會想到台灣問題。譬如五卅運動後，謝雪紅在杭州參加了幾次示威遊行，那時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及關稅自主²¹⁴。但她又將台灣問題扯進遊行的訴求裡面：

「在這事件後，我叫林木順或陳其昌用謝飛英的名譽給浙江日報報館寫了一封簡單的信，為什麼只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關、收回領事裁判權、收回一切不平等條約，而卻沒提到要收回台灣啊？」²¹⁵

二、可塑性高。

由於沒有受教育的痛苦，所以對外來的刺激都急於反應吸收：

「以前，我希望到祖國來的目的是為著求學，此時因孫中山逝世，全國興起

²¹³ 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23。

²¹⁴ 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172。

²¹⁵ 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176。

蓬勃的反帝愛國運動，使我原先為求學的心思逐漸消失。」²¹⁶

在東大學習被編入日本班，接受台灣是被殖民民族的事實。畢業後接受共產國際的指令成立台灣共產黨，實際上是將台灣與中國區隔出來，符合了共產國際的共黨組織規定。此時的謝雪紅，在經過摸索和塑造的階段，已經將她的台灣經驗與國家認同結合在一齊。

一、彈性。

謝雪紅在二·二八以後到香港，失去了台灣戰鬥的根，不得不依賴中共的協助，她只好選擇保有台灣的自治，盼望在中共的主導下，台灣人還有自己治理自己的空間，跟廖文毅的台獨畫清界線。她的彈性和堅持台灣獨特性的主張，無法獲得中共的體諒，最終以悲劇收場。

小結

國家認同問題牽涉到政治共同體的成員自我命名及自我了解的過程。對一個疆域明確、主權完整、歷史文化歸屬有共識的社會而言，國家認同爭議不大的。但是對多族群，文化歸屬產生混淆、領土主權曖昧的地方，國家認同就會成現不同樣貌。

台灣歷經移民及被殖民的過程，再經日本有計畫的消除中華文化的影響，建立大和民族的共同性，台灣的地域文化產生，本島人的觀念浮現，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起了不同的認知和變化。

謝雪紅、翁澤生、李應章和那個時代的重要人物林獻堂、翁澤生或謝南光、簡吉、蘇新、連溫卿等一樣，各有不同的文化影響和國家認同。不同的認同是不是有對錯的問題，如能設身處地去思考謝雪紅、翁澤生和李應章的認同主張受到了主客觀的影響，了解那是時空與時代的選擇問題，就不會陷入執著了。

²¹⁶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頁 170。

第五章 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評價

台灣經歷民主化的過程後，原本在戒嚴時期視為禁忌的歷史人物，終於陸續成為被探討的歷史故事。而故事所建構人物歷史形象，又因不同立場的社會結構而編造出不同的社會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理論的創建者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認為：「集體記憶是一種社會性建構，不同的群體和制度，有不同的集體記憶。」²¹⁷從此一理論出發，檢視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歷史形象印記，以建構其不同群體的歷史記憶，從而探討三人的異同和糾葛。

第一節 謝雪紅的評價

謝雪紅的一生到底呈現了怎麼樣的評價呢？反對日本殖民和台灣民族主義者是她的身份印記。但從歷史的縱深和現實分辨，則有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和中共統治的大陸等兩大分別。

從台灣方面的群體角度和時間發展脈絡分析，台灣解嚴以前，國民黨以高壓和暴力抑鬱台灣人民的思考及對歷史的明辨，使民間以模糊的形象，呈現歷史的「結構性遺忘」。而解嚴以前的反對力量，雖然因為擔心和壓力而自我設限²¹⁸，但因為追求台灣歷史的真相和前途考量，而有盧修一的《台灣共產黨史》博士論文的寫作和出版，揭露了被國民黨刻意遺落的台灣史和追求台灣獨立的歷史人物。解嚴以後，陳芳明教授的《謝雪紅評傳》，以及討論謝雪紅的歷史作品相繼出刊，開始以台灣的歷史角度，探討台灣的歷史和人物，探索台灣的前途。

在中共的角度，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前的謝雪紅，中共表面上以共產國際的角度視為友黨同志，二·二八事件後，謝雪紅逃離台灣在香港舉辦香港會議以後，中共利用了謝雪紅在台灣建立的人望，將她捧為英雄人物；韓戰過後，中共解放台灣希望渺茫，又有中共黨內政爭的路線影響，在鬥爭中謝雪紅被打為右派，

²¹⁷ 柯賽（Lewis A Coser），文，丘澎生，譯，《當代》91，1993.11。

²¹⁸ 盧修一，《日據時代 台灣共產黨史》，「自序」。

受盡凌辱而病死。中共 1980 年對外開放以後，國內外關心謝雪紅的人越來越多，中共不得不重新付予謝雪紅新的價值與形象，而於 1986 年 9 月 15 日，藉著為謝雪紅舉行骨灰移置的機會，重新肯定他的歷史成就，並部份接納了謝雪紅黨內同志的身份。

一、國民黨眼中的謝雪紅

謝雪紅從抗日的民族主義者，在二·二八事件後，變成國民黨眼中的「暴力份子、匪首」。從此，謝雪紅和二二八成為國民黨統治的禁忌，不能說，也不能回顧。

1947 年 3 月 13 日陳儀呈報蔣介石的「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所擬的「二·二八事變判亂在逃名冊」，謝雪紅的案由是「奸黨首要，暴動主持者」。案由的奸黨到底是那一黨呢，根據《和平日報》記者蕭鐵²¹⁹的說法：

「這次暴動的最大原因，據白崇禧部長、陳儀行政長官宣布，是受了共黨野心家操控，然而野心家是誰，他們如何操控的，可全要我們去打聽。據打聽的結果，知道領導這次流血的，是位默默無聞的弱女子謝雪紅。」

國民黨把二二八定位為中國共產黨的血腥暴力行為，是土匪所幹的叛亂犯上暴動，用以舒解國民黨對台灣的暴力統治民憤，以及台灣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二·二八事件和謝雪紅，從此以後，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台灣，成了不能說出口的歷史秘密。

由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的一本「卅年一覺紅潮夢，贏得逃兵酒女名」，以謝雪紅「執行匪黨對台統戰陰謀失敗，喪失繼續利用價值，而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慘遭整肅。」消譴了謝雪紅，還以「開過三美堂」及「大華酒家」，「作過不可告人的勾當」把謝雪紅的女性腳色，形容得極端不堪。

這本由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的冊子，雖然很多杜撰事實，但其目的在對內宣傳，

²¹⁹ 蕭鐵，「我所知道的台灣事變」，勁雨編，《台灣事變真相與內幕》，上海：建設書局，1947。

也總結了國民黨對中共及謝雪紅下場的反統戰看法：²²⁰

一、謝雪紅原是一個狂熱的匪黨幹部，但若干年來她目擊共匪賣國殘民，倒行逆施的種種罪刑，因此她一變而為所謂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二，共匪過去對謝雪紅處處大事籠絡，其目的完全在利用謝雪紅對台灣省同胞進行統戰滲透及欺騙宣傳；三、謝雪紅超過卅以上黨齡，身為偽台盟主席，為了共匪利益，曾經坐過八、九年監獄，開過三美堂及大華酒家，作過不可告人之事，奉毛匪之命，策動二、二八事變，凡此總總，在對共匪的貢獻而言，其功勞不在小，但終於遭受無情的整肅。」並以謝雪紅的被整肅形容：「證明了台灣反攻基地的鞏固，與數年來我們肅間防諜的勝利」以自我惕勵安慰。

台灣要邁向民主，脫離高壓集權的統治，那麼，就有必要以嶄新的角度去審視二·二八事件，對二二八事件要重新解構，以擺脫集權者所提供的偏見資訊，以及其對社會記憶的建構。所以，二·二八和平運動在 1987 年開始推動，但直到 1992 年，行政院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才稍微還原謝雪紅在歷史中的角色，確認她只不過是中部地區的武裝部隊組織和領導者而已。

國民黨對謝雪紅的說法，迫於台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從中共所主使下的「二·二八暴動」的「女匪寇」，降級到只是中部地區的武裝部隊領導者，稍為還原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中擔當的角色，但不變的仍然視謝雪紅為對立面的寇仇。

不過，在台灣人眼中的謝雪紅評價，卻有截然不同的面向出現。由於謝雪紅的台灣民族論，²²¹或者迫於形勢的半民族論的觀點，以及台灣自治的主張，謝雪紅成為二十一世紀主張台獨者的標竿。

二、中共黨員眼中的謝雪紅

中共眼中的謝雪紅，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看法。1925 年以前，謝雪紅還沒

²²⁰ 國防部總政治部印，「卅年一覺紅潮夢 贏得逃兵酒女名」。

²²¹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頁 37。《沿革誌》，68-69。

有到東方大學留學，她的見識和對共產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的思想，其實都還很青澀，沒有深刻的認識。直到台共時期，謝雪紅的領導風格才形成，領導台灣共產黨已經有影響力，中共對她開始有了防備。二二八事件以後，中共一方面要把謝雪紅收為己用，以便更順利的解放台灣。但一方面又擔心謝雪紅的台灣民族論可能的影響，開始打擊扭轉有利於中共對台主張的形勢。中共眼中的謝雪紅，即是二·二八的女英雄，又是民族統合的障礙。中共如何看待謝雪紅，就看政治環境的轉變而定。

1925年5月31日「上海總工會」成立，謝雪紅被國民黨省黨部派到各工團工作當“宣傳幹事”，主要工作是支援上海罷工工人的基金募款。謝雪紅也帶一隊出去，以凶猛的方式帶隊衝進人多的菜館或飯店，用小旗子往桌上一拍或站在椅子上，叫著：²²²

「愛國同胞啊！起來為死難的同胞報仇啊！打倒帝國主義啊！支持上海罷工工人啊！」

謝雪紅以勇猛的女中豪傑形象，獲得中國共產黨的賞識，才被實際上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負責人黃中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才有機會進入上海大學，進而到東方大學留學，改變了謝雪紅的人生。

其實，張深切的回憶錄，對1923年6月17日上海「台灣自治協會」的反對始政紀念日的集會，有一段對謝雪紅在集會表現的描述，很能反應中共黨員會對初出毛廬的謝雪紅賞識的原因：²²³

「那時的集會情形和我自己講的話，現在已經沒有記憶。只有謝阿女主張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支援男人的運動，才容易成功。激起了全場的喝采，這確使大家留下不淺的印象。因為過去台灣參加革命運動的女性很少，在日本只有蔡氏阿信，在祖國只有謝阿女，而兩人算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所以特別博人激賞。」

謝雪紅自進入東方大學日本班，形式上已脫離了中國共產黨身分。當她創立

²²²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頁174。

²²³張深切，《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第一冊，（台中：聖工出版社，1961），頁195。

台灣共產黨，謝雪紅和台灣共產黨在國際共黨的架構下，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友黨。

從中國共產黨協助台灣共產黨成立，以及台共黨的政治方針，清楚說明台灣共產黨在國際共黨組織中和中國共產黨的友黨關係。台灣共產黨的“組織大綱”指出：²²⁴

「在相當期間內，台灣共產黨是以第三國際的支部日本共產黨之下的一個民族支部而組織成的，因此必須遵守日本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的指令。此即台灣共產黨將透過日本共產黨去履行它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支隊的任務。」

透過台共的組織大綱，清楚說明台灣的革命，既不是日本革命的一部分，也不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台灣的革命，根據台共“政治大綱”——台灣民族的發展——的理論設定。“政治大綱”裡台灣共產黨當前的口號，前三條口號清楚表示，最終目的就是要建立台灣共和國：

- 1、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2、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 3、建立台灣共和國

可是，中共的做法卻很詭異，雖然 1928 年至 1932 年間，台灣共產黨成立後的這幾年間，中國共產黨因國共合作破裂，陷入內部改革矛盾的艱困歲月，無法有效協助台共。但在日共渡邊政之輔於 1928 年 10 月 7 日在基隆遇害，台共再度與日共的聯繫中斷的時候，中共卻在十一天後的 10 月 18 日，自行在台北成立中共的「台灣支部」，而不是協助將台共與日共聯繫起來，反而在台灣建立自己的組織，干預台共內部，違背了第三國際「一國一黨」指令。

不只於此，中共中央在 1931 年 1 月召開「四中全會」，對李立山、瞿秋白路線進行強烈批判，導致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被解除。但是，瞿秋白仍然在 3 月和翁澤生起草台共第二次臨時大會的新綱領。而這個綱領的主要內容，雖然維持台灣獨立的主張，符合第三國際對殖民地革命的指令。但是，緊接著的

²²⁴ 《沿革誌》，頁 595。

口號呈現極左傾性格，沒有絲毫包容。²²⁵口號十點：

- 一、帝國主義統治的顛覆、日本帝國主義企業的沒收，台灣政治經濟的完全獨立。
- 二、一切土地無條件的加以沒收，歸還給鄉村的貧農、中農使用。
- 三、誓必消滅搾取階級及一切的封建殘餘。
- 四、顛覆帝國主義土著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建立農工蘇維埃。
- 五、取消帝國主義的一切賦稅、一切的苛稅。
- 六、實行八小時的勞動制、社會保險，極力改良工人階級的生活。
- 七、階級職業工會的組織及行動完全自由。
- 八、保護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勞動群眾的祖國——蘇維埃聯邦——。
- 九、結合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和親愛同盟，特別是聯和日本無產階級，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 十、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印度的革命，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的勞動群眾的鬥爭。

這種激進主張的綱領，截然不同於謝雪紅的戰略和戰術運用，謝雪紅自然不同意，由瞿秋白和翁澤生發起的台共內部鬥爭自是在所難免，最後，謝雪紅終於被開除台灣共產黨黨籍。

其實，這個綱領內容，依據翁澤生的口供²²⁶，目的是要將謝雪紅一派除名，同時解散改革同盟，以便成立台灣共產黨的新中央。雖然，何池的《翁澤生傳》全盤否認，強調是〈對謝要有耐心-----〉²²⁷，但事實結果還真如翁澤生口供，由瞿秋白和翁澤生主導的第三國際局“致台灣共產黨者書”發生效用，台共臨時大會於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召開，謝雪紅一派被開除黨籍，中共力量掌控台灣共產黨。

²²⁵ 第三國際東方局“致台灣共產黨者書”(1931年3月10日)，《沿革誌》，頁694-701。

²²⁶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152。〈謝阿女と關係に關する翁澤生の供述〉，《警察沿革誌》，頁688-689。

²²⁷ 何池，《翁澤生傳》，頁240。

雖然中共藉機掌控了台共，但由於改革同盟的激進路線，引起日警的注意，在1931年3月，日警首先逮捕王日榮與林式鎔。日警在林式鎔家發現〈致台灣共產黨書〉文件，又在張朝基宅找到改革同盟文件，台共組織完全曝光。²²⁸緊接著在日警進行搜索中，農民組合的趙港，被警逮捕，謝雪紅之後也於1931年6月26日被日警逮捕。中共在台的支配領導，還是功虧一簣。而且，更凸顯謝雪紅在台灣革命的地位。

中共接納謝雪紅是在香港會議以後，其目的是在利用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中竄起的高名氣以打擊國民政府的形象。中共也利用協助謝雪紅等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達到對台宣傳效果。

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後逃離台灣，正式宣告戰士被迫脫離戰場的悲哀。雖然，謝雪紅在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參與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希望延續舊台共的台灣民主自治的獨立主張。但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是中共協助成立的組織，謝雪紅根本無法獨立自主。所以，1947年11月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綱領草案，第一條就是：設立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新中國。²²⁹這是妥協的草案，中共已經將謝雪紅視為鬥爭國民黨的旗子，不再支持謝雪紅等舊台共的台灣自治主張。不過，舊台共主觀的願望，還是希望台灣自治自主。所以，在綱領草案的第四條，就隱藏了台灣自治的條文：「實行台灣省徹底的台灣自治，省長、縣長、市長、區長、鎮長、鄉長，一律由人民直接選舉」。中共和謝雪紅彼此之間，對台灣的解放，已經有不同的理解。

不過，1948年5月7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台灣同胞書，謝雪紅的台盟又再退了一步：

「……全國人民都已廢棄反動政權，而期待早日結束，籌建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期，已經成熟了。……同胞們！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配合全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廣泛地展開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

²²⁸ 《警察沿革誌》，頁735-736。

²²⁹ 徐宗懋，《二二八事變第一主角謝雪紅》，頁77。

主義，反對台灣分離運動的各種鬥爭，準備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這樣，台灣人民才能由美蔣聯合統治的痛苦中解放出來……。」

這一項號召，抨擊廖文毅的台灣獨立，也為台盟的自治主張解套，以準備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諂媚中共。

其實，在謝雪紅在 1949 年 9 月 23 日的一屆政協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已經有乞憐的味道：

「……全台灣省人民完全擁護這個全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完全支持這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完全同意這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在這個共同綱領中的每一條都代表著我們的利益，所以我們不但應該要遵守，而且我們為著這個綱領的全部實現，必須努力奮鬥到底。只在綱領草案第十二條所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普選產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我就覺得非常滿意，……」

謝雪紅固然盼望著台灣的完全自治，但在人家的屋簷下，必須顧慮中共的感受。所以，只能選擇自我陶醉，以草案第十二條自我安慰。除了寄希望於中共，謝雪紅其實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因為，自從香港會議以後，台盟的成員遠離台灣故土，台盟對台灣的革命幾乎都已經沒有著力點，只能靠著宣傳，這樣是不夠的。而這時中共卻掌握著台灣解放的主導權。中共派駐台灣的負責人蔡孝乾，領導著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所屬黨員，已經有一千三百多人，設有數十個省工委直屬支部。²³⁰台盟越來越必須依靠中共了，實際解放台灣的工作，已經轉由中共自己來做，台盟只是搖旗吶喊的角色。

雖然，中共輸送到台灣的黨工和聯絡工作，是由台灣人李偉光負擔部分責任，

²³¹但李偉光本就是中共黨員，他所做的黨員輸送和掩護工作，也是透過同鄉會的

²³⁰ 行政院法務部調查局，《台灣光復後之「台共」活動》，頁 53-54。

²³¹ 蔡子民整理，〈李偉光自述——一位台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下），《台聲》，1986 年 11 期，頁

管道，並不是台盟。台盟只能當個配角，負責在必要的節慶等亮相而已，台盟徹底成為中共的一個所謂的民主黨派。謝雪紅的角色，隨著解放台灣的遙遙無期，越來越沒那麼重要。

宗派之爭是謝雪紅晚年被鬥而死的手段，隱藏在內的更重要因素，是中共對台政策因韓戰失利的改變，以及謝雪紅台灣民族論延伸的台灣獨立思想不為中共政策所喜歡，而讓蔡孝乾派有可乘之機。

除此之外，觀察 1970 年謝雪紅去世後，李應章子女對謝雪紅的批評，可找出李應章對謝雪紅不滿的根源：

一、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時還沒有入黨：

若照吳克泰的說法，謝雪紅是二二八以後到香港才重新入黨，而蔡系台籍黨員都比謝雪紅早入黨，謝因黨齡問題被看不起是一個原因。²³²不過，李應章的次女李玲虹，在謝雪紅去世後批評她的黨齡太淺問題，卻更有另一層深意，那是在強調謝雪紅的入黨，是由李應章介紹。雖然有這麼一層關係，但謝雪紅卻聽信部份台灣同鄉的要求，要改選台灣同會會長，等於衝著李應章對幹。

台灣人的不團結，已經是台灣的標籤。台灣移民，自荷蘭、明鄭、清、日殖民以來，台灣人的內鬥，比對統治者的反抗，多到難以記數。李應章次女李玲虹也曾有「台灣人要團結」的感慨，這是 2001 年筆者在她北京的家吃飯時，不知因何緣故，李玲虹沒頭沒尾地忽然冒出來的一句話，不知道是對台灣人阿扁當總統的歷史感慨，還是有其他個人因素，或者是謝雪紅對她們家族的影響。這句話的意思語焉不詳，但「台灣人要團結」的說法令人印象深刻。

李玲虹是中共成立對台廣播的第一批廣播員。中共於 1949 年 8 月 20 日。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一台開始對台廣播，對台廣播是由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宣教科主辦²³³，蘇新負責，廣播員李玉惠（李玲虹）等都是李應章的人。

二、「恩將仇報——且記謝雪紅如此對待其入黨介紹人李應章」：

46。

²³²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 400。

²³³ 洪永固，《李應章之女——李玲虹（玉惠）的人生歷程》〈難忘的播音生涯〉，頁 61。

李應章的次子李克世，也在其通訊稿批評謝雪紅「恩將仇報——且記謝雪紅如此對待其入黨介紹人李應章」，重點在批評謝雪紅在二·二八後逃到上海，不但受到李偉光的掩護，還是由李應章介紹重新入黨。

從李應章的兩個子女，不約而同持相同看法的批評謝雪紅忘恩負義，反應出謝雪紅於1949年將台盟遷到上海，沒能和李應章合作，反而搶李應章的職務，延伸了雙方的情仇。

李克世在他出版的《一個台灣人》描寫當年的情形：

「1951年7月至1952年7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台委的整風整黨中謝雪紅、蘇新是第一組，重點小組審查謝雪紅的問題，主要是台共在被日本當局破壞時，謝是不是第一個轉向？有叛變出賣組織的嫌疑，台共的被破壞，與謝有關。再者不執行共產國際東方局、中共中央的決議。第三為拉幫結派，支持上海虹口派從李偉光手中奪臺灣同鄉會的領導權。」²³⁴

李克世於1928年生，對整風整黨中審查謝雪紅有關台共的問題，李克世當年還是嬰幼兒期，對台共沒有認識，無從置喙。他寫的《一個台灣人》，在意的應該是第三點，「支持上海虹口派從李應章手中奪臺灣同鄉會的領導權。」這是直接挑戰李應章在台灣同鄉會的權威，削弱李應章在台灣同鄉會與中共內的重要性。嚴格說，謝雪紅是在掀起領導權的鬥爭，逼迫李應章讓路。所以，李克世在他所寫的《一個台灣人》，除了引述李紹東對1951年台盟的整黨、整風對謝雪紅被整的描述，在第二十五章〈台灣近代革命史上兩人擦肩而過——翁澤生與李應章/謝雪虹〉也有以下感慨的記載：²³⁵

這與他在解放後到上海，本來應與李偉光很好地合作負起急需開展的對台灣工作，卻也主觀地認為與李本來就在上海有多年交情、一齊從事革命活動多年的謝雪堂、李喬松父子、公派留學的大學生江濃、杜長庚以及原擬轉移解放區後來未能成行而在上海住到同鄉會的王萬得、吳克泰、林青山、王天強、陳炳基等都

²³⁴ 李克世，《一個台灣人》，頁462。

²³⁵ 李克世，《一個台灣人》下，頁443。

主觀地劃入所謂的李偉光派。

李克世把 50 年代台盟的整風鬥爭，歸咎於謝雪紅的強勢，不懂人情義理。但是，上海同鄉會久未改選也是事實。不過，這一改選風波，曝露了謝雪紅的強勢作風，以及做事不夠細膩，不夠周延的缺點，也因此讓仇恨和批判繼續延伸。

李克世在 2007 年 5 月 24 日及 27 日兩次走訪北京的陳炳基，將自己寫的〈台灣近代革命史上兩人擦肩而過——翁澤生與李應章/謝雪紅——〉交給陳炳基看，徵求意見，陳炳基說法，李克世整理如下：²³⁶

「謝雪紅是個人野心家，個人英雄主義，導致其不正常的領袖欲，推行錯誤的組織路線，拉幫結派。千方百計想控制上海的台灣同鄉會，就依靠壞人打擊李偉光，要從李手中奪去同鄉會的領導權，執意抗拒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解放初期，鑒於社會情況複雜，決議保留同鄉會的決議于不顧，先是中傷李偉光領導下的同鄉會是封建主義的產物，應予廢除；等到群眾傾向于保留同鄉會了，華東局野決定，並內定設法在選舉時理事長保留為李偉光時，她陽奉陰違，攏絡依靠一些人企圖選掉李。這個陽謀，楊克煌在 1951 整風時都交待了。而謝雪紅心目中的理事長是郭子春，其妻為日本人，上海鉛筆廠的老闆資本家。所以，1954 理偉光逝世後，一直當副手做了不少工作的的謝雪堂繼任同鄉會理事長。謝雪紅又拉人反對謝雪堂，弄得大家都反對謝雪紅，因為她壞。郭子春當副理事長是可以的，但她為的是一心想打掉李。包括組織抗美援朝委員會時，也不惜依靠一些壞人打壓李偉光。

在組織路線上，謝雪紅依靠拉攏的都是一些有嚴重歷史問題的，甚至是壞人。在北京，揚克培只因為是舊台共成員，找來就安排工作。其實，他是日偽時期河北的偽縣長，其妻是譚家菜的女兒，而譚是漢奸；還有漢奸偽縣長郭良，這兩人成了台盟北支部的骨幹。而華北台盟支部的人選上，我們都提議由北京大學教授陳文彬擔任，謝雪紅卻攏絡林鏗生，甚至為 1949 年心政協台灣代表團的候補代

²³⁶ 李克世，《一個台灣人》下，頁 463-465。

表)。林後來因走私、奸商，加之政治問題被抓起來。林手下的台盟華北支部宣傳部長陳信德是東京大學畢業的，日投降後在美國大使館工作。解放初期有名的“炮打天安門”案件，各國特務集結到他家中開會。在北京公安局二樓展覽會，迄今還有此大案的要犯名單，寫著陳信得原台盟華北支部宣傳處長幾個大字。

又如林建文，謝安排其擔任華北台盟的幹事，是日本新民會—汪偽時的“奉公會”秘書長，帶日本兵抓人的。柯正和是北京師大的音樂家，日偽時期的“維持會常務理事”，為漢奸，被抓了起來，謝又去設法放出來成為其親信。謝京生（日本新民會成員），屬地方縣秘書長以上者，則為歷史反革命分子；黃炬（軍統特務）也被謝發展為台盟盟員，其父黃泰禧系偽郵電監察所長，文化大革命中畏罪自殺；又如正誼，是偽汪精衛的教育部長，建意創設反共國際大學者，也被謝拉幫；齊振宇是被福建公安聽抓住的特務：李啟良原為謝在北京時的司機，特務身份暴露後，謝將他掩護送走，回到福建後被抓住了，鎮壓反革命時被槍決。

而上海的張添梅是日本“黑龍會”成員，是被認定的；林世昌也是日本特務；林政漢是日本特務，後又是國民黨特務的雙料。謝就依靠這些壞人去打擊李偉光正派人。這三人後來都被判刑，謝即去活動設法將他們保出。

謝雪紅之這樣做，決不是協助黨落實政策，而是借以拉幫結派，為其個人領袖欲服務，縱容這些人追隨其。從上海乘火車到北京政協開會，到了保定，擅離車廂，下站台去買燒鴨，結果火車開了。到了北京站，發動一幫人拿旗子寫“謝主席萬歲！”被胡立教批評。而在上海，當人們議論：台灣解放後誰當省主席時，謝即說“他們（指非台灣省籍的老幹部）不能當，不聊了解台灣，要台灣人來當。”言外之意，非她莫屬。更狂忘到了目中無黨中央。1952年日共領導人志賀義雄來華訪問，我從上海調來北京工作，她要我向中央統戰部提出要求拜訪志賀，匯報舊台共問題，中央未同意。」

從以上訪問稿，除了反應李克世對謝雪紅的不滿，也可看出中共解放大陸後對舊台共的態度，以及謝雪紅和李應章之間的問題及政治立場：

(一) 謝雪紅提出拜訪日共領導人，匯報舊台共問題被中共撥回，已經明白表示不承認台灣民族的自主性，撕毀台共建黨時國際共黨的指示。

(二) 陳炳基指責謝雪紅所用的人不是漢奸，就是特務，要不就是汪精衛的官員。相對於謝雪紅認為台灣當時在日本殖民時無漢奸的論點，一個是站在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一個站在台灣當年的現實立場。如果謝雪紅所用的這些陳炳基指認的漢奸、特務真的罪大惡極，謝雪紅能保他們出來做事？恐怕值得推敲。

(三) 謝雪紅說外省人不能當台灣省長，是緣於她的台灣自治的理念，也是她的台灣民族論重要精義。陳炳基具此推測謝雪紅想當省長，恐怕不夠周延。

(四) 從謝雪紅要改選上海同鄉會的霸氣，直接槓上在上海已根深地固的李應章，其一山不容二虎的手段，陳炳基稱謝雪紅有領袖欲，卻也不假。

(五) 李克世感嘆謝雪紅到了上海，為什麼不能好好跟李應章合作，共同為解放台灣盡力，反而先挑起內部鬥爭，是有他指責謝雪紅先開戰的道理。

除了李偉光家族對謝雪紅的批判以外，蔡孝乾系統的人，對謝雪紅的批評更是不遺餘力。

由蔡孝乾引介入黨的陳炳基，於2011年和他的醫生太太回到台灣，在台北參加朋友的喪禮後南下彰化，要去二林走訪李應章的舊居。筆者開車在烏日高鐵站接到陳炳基夫婦，²³⁷在帶領他們到二林走訪李應章在媽祖廟前的舊居、二林蔗農事件發生地、二林國小的李應章紀念碑、李應章父親墳墓，再帶他們夫婦到台中住宿的十多個鐘頭中，不只一次希望他談談謝雪紅。可惜他說；該說的話都已經說完了。不過，從陳炳基的表情上可看出他對謝雪紅的恨意。都那麼久時間了，好像餘怒未消。陳炳基提到二二八事件時沒有得到支援，沒有武器，抗暴運動不了了之，對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表示不以為然的說：「扭曲歷史，她沒有那麼偉大」。

²³⁷ 筆者透過在中國的朋友，很早就知道陳炳基要到台灣的消息，並知道他入住台灣飯店的名稱及其他資料。所以他一到台北就接到筆者電話也嚇一跳，因為以前我們並不認識。筆者以一些人名和關係讓他答應到中部的時候由筆者全程接待。後來，他要到南部拜訪他以前的戰友和死去朋友，竟然邀我同行。筆者當時身體狀況不好，沒辦法同行，可惜了大好機會。不過，筆者答應幫他找他在員林的一個朋友。

陳炳基說，該說的話已經都說完了，指的是他和蔡子民、吳克泰於 1974 年 10 月在《歐洲通訊》發表過的文章，是針對二二八事件所提出，否定謝雪紅在二·二八的表現。在革命理念，否定了謝雪紅的台灣獨特性。歐洲通訊裡的文章是這樣的：²³⁸

謝雪紅一夥人寫了很多書，書的目的是要歌頌謝雪紅。當時對許多觀點進行扭曲。現在實際上有很多是關於二二八的書是謝雪紅他們搞的，別人又抄、流傳的，國外同志不大了解。有一個謝雪紅的左右手，外省人，王世祥，寫了一個《二月革命記》。二、二八是反對殖民統治的，把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歪曲成好像是台灣是中國的殖民地那樣。另外書上提到說是台灣革命，二、二八以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二、二八以後才轉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台灣的革命和祖國密不可分，新民主主義的開始應該是 1919 年五四以後算起。之後 1921 年中國共產黨誕生——領導目標要推翻三大敵人，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義，以後往社會革命前進，所以台灣新民主主義革命應該是從 1919 年算起——而謝雪紅就歪曲這些事實。

陳炳基是蔡孝乾吸收的黨員，他將謝雪紅定調是台灣人民的罪人，是有他們在二·二八事件時的立場和對事件經過的理解。

不過，陳炳基等人把日治時代反殖民統治的民主主義，聯結到五四運動，無視於台灣留日學生接受世界新知，受到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威爾遜民族主義及歐洲民主的影響，更忽略了日本廢除封建制度，改革教育、軍事、經濟，頒布憲法、改革司法等俗稱明治維新，以及之後日本進入大正民主時代²³⁹，台灣所受的影響。

陳炳基的民主主義定調為五四的影響，或許是要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²⁴⁰掛勾。“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對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的稱謂。但是，這只是一個階段，不是新社會的固定模式，隨之而來的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陳炳基讓日治時代台灣

²³⁸ 陳炳基、吳克泰、蔡子民，〈談二二八起義和謝雪紅事件〉，《歐洲通訊》，第十三期，頁 24。

²³⁹ 大正民主（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意指 1912 年—1926 年，日本大正年間所推行符合現代民主的政體與政策。

²⁴⁰ 1948 年 4 月 1 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講話，闡明新民主主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反殖民運動的民主主義運動，聯結到五四，由五四聯結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一脈相承，意在言外。

基本上，陳炳基等是站在中國的立場看台灣，把五四對中國的影響，擴大到還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五四當然也是時代潮流的民主運動，對台灣並非沒有影響，但並非唯一的影響。陳炳基等人的台灣新民主主義論，緊接著和中國共黨誕生做聯結，顯然說理不通，有勉強附和之嫌。

其實，王思翔將二·二八事件做為劃分新、舊民主主義的分水嶺，也不是很恰當，但陳炳基的延伸引述更有司馬昭之心。二·二八事件是因國民政府高壓統治，以及政治、經濟不公平的近親繁殖，剝削台灣人經濟和就業的反抗。蔣介石政府對台灣的統治行為，其設置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權限，不亞於日本總督府，使得台灣人從原本歡迎國民政府，僅一年多的統治，就反抗起蔣介石集團的統治，並遷怒到外省人。

外省人王思翔²⁴¹在台灣一年，看到蔣介石集團的統治行為，在經歷二·二八時不得不以局外人看待台灣的變局。王思翔在《台灣革命二月記》序言就提到：

「我於 1946 年春到台灣，在台灣住了一年。二月革命的獨特風貌，使我不得不居於『局外人』的地位，雖然這樣，並沒有減輕國民黨反動派對我的迫害，只得漂流十五晝夜，逃出台灣。在我逃走以前，一位台灣摯友叮嚀道：『把台灣的事情告訴全國人民吧！』²⁴²

這個人就是謝雪紅，所以王思翔的《台灣革命二月記》，被反對他的人說是自吹自擂。陳炳基等對王思翔的「二月革命獨特風貌」，還引申為新、舊民主主義之分，再聯結到中共共產黨誕生，直接點名中共是新民主主義的掌舵者，並影響了台灣民主主義的進程，藉機奪取謝雪紅的光彩。但是，這樣的牽強論點，把 1920 年代台灣的民主發展，東京台灣留學生成立的新民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民報創刊、蔗農組合、台灣民眾黨成立等等民主與民

²⁴¹ 王思翔，《台灣二月革命記》，上海：動力社。

²⁴² 王思翔，《台灣二月革命記》，〈序〉，頁 12-13。

族的訴求，一股腦的歸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帶動。這樣的說法，完全不能成立。

1920 年代台灣的民主與民族思想的發展，是直接來自於日本明治維新和大正民主所接受的西方民主與民族主義啟發，²⁴³當時的台灣和中國，先後都踏上追求民主與現代化的道路。那時候的中國，還在民主的道路上摸索前進，中國五四運動對台灣的影響不是沒有，但被陳炳基等高估了。

五四運動被高估的原因，是忽略了 1920 以前台灣在政治、教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遠高於中國，台灣的民主主義的追求，自有自己的歷史因素，怎麼可能只憑發生於中國的五四運動，就指台灣的民主主義發展是追隨著中國呢？試以政治、經濟與教育的發展，看中國與台灣的差別，以引證台灣的发展因素：

1911 年梁啟超應林獻堂之邀訪台，對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發展，提出兩點看法：

- 一、台灣隸我版圖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以後，乃漸加至三百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本年度預算且四千三百萬矣。是果何到以致此？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則尚和貧之足為憂者？
- 二、台灣自六年以來，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此四千餘萬者，皆台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²⁴⁴

在「大正民主期」，推行的同化政策，也將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和思潮，帶進台灣，影響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1915 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已有三百多人，這些留學生在日本接受了大正民主所帶來的世界新資訊和思潮，思想大受啟發，而於 1919 年開始籌劃社團，並於 1920 年 1 月 11 日成立「新民會」，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

簡單的幾個例子，已經清楚台灣與中國的民主發展，是各有途徑，更不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因素。陳炳基、蔡子民、吳克泰三人，認為謝雪紅在二·二八事

²⁴³ 李筱峰，《台灣史一百件大事》上，頁 129。

²⁴⁴ 黃得時，〈梁任公遊台灣〉，《台灣文獻》十六卷三期（1965·9）。李筱峰，《解讀二二八》，頁 89。

件的問題上「歪曲歷史，是台灣人民的叛徒。」並將二·二八的問題導入民主主義及和中共的關係，其目的除了要對謝雪紅鬥爭，看不出有其他用意。

其實，拋開蔡孝乾系不得不先對謝雪紅下手鬥爭，所以有一連串對謝雪紅的指控，並且吹捧中共為新民主主義的道統說。從另一個角度觀察蔡子民等的民族認同和忠貞傾向，也會有以中國為主，以中共為舵手的論述：

筆者在北京工作的時候，多次和蔡子民先生飲酒談天。2001年曾問蔡子民先生為什麼不回台灣看看，他說當然要回去的，國民黨是讓我可以去台灣，不過只能以私人身份回去，不能有任何職稱，這個條件我不能接受，所以還不想回去。

當時的蔡子民看起來還非常健康，所以很自豪的反問筆者：「我這個身體可以等到國民黨答應我要的條件嗎？」筆者不假思索認為一定可以。

回想起這一段印象深刻的對話，以及蔡子民對台灣人源流來自中原的研究說法，蔡子民的泛中國認同無可質疑，對五四的影響，自然有別於謝雪紅等受到日本殖民主義影響深。因此，中國民族論對上台灣民族發展，才會對台灣民主的發展有不同的見解。

文革的氣燄高漲，謝系人馬於1967年9月6日組織一個稱為「京、津、保革命台胞揪台盟總部走資派籌備組」，並且發表宣言，要把台盟的黨內走資派徐萌山批深、批透、批倒、鬥臭。²⁴⁵並於1967年12月6日由「北京揪台盟走資派戰鬥隊」和「天津市革命台胞揪台盟走資派聯絡站」共同發行一份油印刊物，為台盟被扭曲的歷史平反，目標是對徐萌山的領導路線批鬥，同時對蔡系宗派予以抨擊²⁴⁶，為謝雪紅平反。但是，徐萌山當權派也不甘示弱，發行《揪謝雪紅右派黑手戰報》反擊。最初的戰鬥，造反派得到初步勝利，當權派受到打擊的有吳克泰、蘇新、蕭來福、王萬得、徐萌山和陳炳基。²⁴⁷

不過，在徐萌山的孩子採取紅衛兵的手段，於1968年5月帶領紅衛兵前往謝雪紅住處抄家，然後把謝雪虹押往台盟總部，並以下跪及「坐飛機」等凌虐的手

²⁴⁵ 上海揪台盟聯絡站，《台盟文革動態》。（油印的文革傳單）。

²⁴⁶ 《關於舊台盟的政治路線問題》（1967年12月6日）。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511。

²⁴⁷ 〈鄭鴻溪先生口述歷史〉。

段，拳打腳踢羞辱謝雪紅，²⁴⁸蔡系宗派終於獲得全勝。自此而後謝雪紅的身體越來越差，1970年11月5日13時37分，在留下三點遺囑，為自己辯護後病逝北京首創路的隆福醫院。

雖然謝雪紅不得不向共產黨交心，並為自己不是右派力辯。但她也私下留言楊克煌堅持戰鬥的意志力。²⁴⁹謝雪紅的內心掙扎，可從她的遺囑和私下留言楊克煌窺之一二：

她的遺囑：²⁵⁰

- 一、我不是右派。
- 二、我仍然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
- 三、我一生也犯過錯誤。

她對楊克煌私下的交代：

「妳們必須堅持戰鬥下去，最後勝利是屬於台灣人的。」

從她的遺囑第二點，對照她私下對楊克煌的交代觀察，她看似對中國共產黨交心，其實是希望楊克煌繼續擁有中共的助力。但更深一層的意思，卻也貫徹了她對國際共黨及社會主義的信賴。這也暗喻了她對舊台共的主張信念至死不渝，在這麼淒慘的境遇中，還堅持著台灣自主性的盼望。

1980年12月19日謝雪紅去世十周年，《人民日報》忽然出現一首由署名符號，悼念謝雪紅的詩：

懷謝雪紅同志 符號²⁵¹

永安宅裡尋常見，萍水天涯劇可憐；
恤我親貧敬白髮，嗟君命苦泣紅顏：
八千子弟高山火，十萬珠璣平地煙。
浩劫同逢生死際，靈犀一點伴重泉。

²⁴⁸ 同上。

²⁴⁹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519。

²⁵⁰ 〈鄭鴻溪先生口述歷史〉。

²⁵¹ 符號，〈懷謝雪紅同志〉，《人民日報》，（北京：1980.12月19日），第8版。

²⁵¹ 陳曉雲，〈謝雪紅與伊藤律投奔中共的下場〉，《台獨月年12月19日》，第八版。

謝雪紅雖然在 1980 年代因中共對台政策改變得到部份平反，但是，死者已矣，在美國發行的《台獨月刊》，由陳曉雲所寫的一篇評論，或可為謝雪紅在二·二八後離開台灣，踏上錯誤的第一步，做為她一生的總結：

「錯誤的選擇，她自身也以血和淚為代價接受其教訓。值得台灣人賀采敬佩的，是她受制於中共的絕境，仍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駁斥中共及其爪牙誣蔑不實之詞，像踏不死的野花一樣，維護了台灣人民光輝的形象，保全了她『有錯必改，寧死不屈』的氣節。」²⁵²

三、小結

謝雪紅的一生，在政治運動上，因政治立場與所處環境與時代背景的不同，謝雪紅有許多不同的形象。她被國民黨稱為匪寇，但有被中共賦予「二·二八革命的女英雄」；在中共的反右運動中，她又在 1957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8 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召集的會議重批為「謝雪紅—極端狂妄的野心家」，是右派：²⁵³

「謝雪紅在 1947 年混入共產黨，十年來，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惟我獨尊。共產黨內對他長期進行過教育，耐心地等待她悔改。但是，謝雪紅始中抗劇對她的教育，這次更利用整風機會放出許多毒箭，向黨進攻。」

在女性書寫上，她又被稱許為「台灣第一為女革命家」²⁵⁴。由於在整風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謝雪紅的悲慘遭遇，又被國民黨利用，指「台獨就是共匪」，不但汙名化台獨的歷史正當性，並以之和共匪掛勾，恐嚇台灣居民。

還有，中國共產黨因為謝雪紅的台灣民族論和台灣共產黨的台獨觀點，利用翁澤生整倒謝雪紅；以宗派之爭整肅謝雪紅。國民黨也不惶多讓，既然稱謝雪紅為

²⁵² 陳曉雲，〈謝雪紅與伊藤律投奔中共的下場〉，《台獨月刊》，第 110 期，頁 10。

²⁵³ 「謝雪紅—極端狂妄的野心家」《光明日報》，1957 年 12 月 26 日

²⁵⁴ 施叔青、蔡秀女，《世紀女性，台灣第一》（台北：麥田，1999）。

匪寇，但在國民黨國防部總政治部出版的。《謝雪紅的悲劇》一書，有利用價值時又說謝雪紅是反共的象徵人物：

「民國四十五年十月，由於匈牙利革命的影響，在匪區激起波瀾壯闊的反共革命浪潮，謝於此時，一則鑑於大陸人民反共抗暴力量的迅速發展，再則深感共匪所作所為全系倒行逆施，專橫黑暗無法無天，因知悔恨與痛恨的情緒，交織而變為反共的言論，除在民國四十六年六月間，於偽政協視察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一批案件，要求平反外，並於同年四月間，利用匪黨「整風鳴放」機會，聯絡其他台籍盟員如呂連、江文也等從事激烈的反共活動。」。

總而言之，由於各取所需，謝雪紅的形象變化很大。唯一不變得是她的台獨理念和台灣第一優先的心。不同立場政治傾項的團體或個人，對謝雪紅的評價，也就圍繞在她的台灣優先立場上打轉。

第二節 翁澤生的評價

翁澤生雖然在台灣出生，也在台灣受過小學教育，但他徹徹底底是中國統一論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他的所思所想都是以中國為主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觀察翁澤生的一生，最重要的事不是婚姻，更不是家庭，而是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夫人跟隨了同黨同志，在婚姻上被判了他，但他為了革命事業，並沒有苛責同志和夫人；為了革命，可用妻離子散形容翁澤生。往好聽的說，他的一切都是為復興中國而奮鬥。從這一點出發，翁澤生的形象就有幾個特點：

一、純正的中國共產黨員

瞿秋白通過江蘇省委轉達了他的指示，由翁澤生協助謝雪紅籌建台灣共產黨。²⁵⁵從這一點也說明翁澤生是中共黨員，雖然他是台共創黨的黨員之一，但中共黨員才是他的根本。

2003年10月14日上午8時許，在閩南漳州城南丹霞山漳洲烈士陵園豎立著

²⁵⁵ 何池，《翁澤生傳》，頁144。

翁澤生紀念碑，紀念碑右側懸掛著“翁澤生烈士雕像揭幕儀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座台籍中共黨員革命烈士雕像，可見得翁澤生在中共黨史中的重要地位。代表漳州市委、市政府致詞的游婉玲，有一段話深刻的描述翁澤生在中共眼中的形象：²⁵⁶

「號召學習翁澤生烈士反抗外來侵略、愛祖國、愛家鄉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學習他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百折不撓、不畏艱難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對黨忠誠不二、不怕犧牲、為革命奮鬥終生的共產主義精神。」

致詞中的「愛祖國、愛家鄉，以及為革命奮鬥終生的共產主義精神」可說是游婉玲講話的精華，也是翁澤生終生信仰中華民族論的最佳寫照。

其實，就翁澤生是中共眼中的好黨員典範，中共中央檔案館提供，由廖承志在1975年9月17日所寫的材料，就給予翁澤生相當的肯定²⁵⁷：

「翁澤生同志被捕後，他所知道的全總和海總的機關無一處受到破壞，可見得他是堅決的，立場是堅定的，並沒有向敵人透露過任何黨的秘密。-----所以我們當時認為，現在也同樣認為，翁澤生同志是堅持了革命氣節的共產黨員，他不僅沒有叛變，連任何動搖的表現也沒有過。」

這次被捕，翁澤生在上海沒有出賣同志，被移交日本警察，送回台灣，在台北監獄漫長的牢獄生活也拒不寫“轉向書”。由於被關的生活條件很差，他的病情加重，獄官向他提出只要“發誓轉向”，寫好“悔恨狀”就可以讓他出獄治病。潘欽信、莊春火、林日高叫翁澤生先保命，假意“轉向”出外保命。但是翁澤生終究不肯，他說：²⁵⁸

「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也許出去病能治好，但日本人正想利用我出去治病來要挾我寫“轉向書”，我就是死，也不做火線上的逃兵！在獄中病會好當然好，治不好也不後悔。」

翁澤生在生死交關的時刻，仍然堅守對共產黨的忠貞，沒有游移的信仰地帶。

²⁵⁶何池，《翁澤生傳》，頁2。

²⁵⁷何池，《翁澤生傳》，頁347。

²⁵⁸蘇新、蕭友三回憶翁澤生的重要材料。1975年12月12日。何池，《翁澤生傳》，頁335。

游婉玲的致詞：要「學習他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百折不撓、不畏艱難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對黨忠誠不二、不怕犧牲、為革命奮鬥終生的共產主義精神。」確實是中肯之言。翁澤生以死殉黨，也為他一生的中國共產黨救中國的志節，畫上完美的句點。

翁澤生對共產黨的信仰，甚至在謝玉娟背叛婚姻，跟隨同黨同志潘欽信同飛共宿，他仍然可以原諒他們，而且繼續在革命事業上共事，為共產信仰努力。翁澤生如果沒有超越奪妻之恨的信念，就算能夠原諒潘欽信，但也不可能再和潘欽信、謝玉娟一齊工作了。

二、翁澤生對台共認知的變化

翁澤生當然是台灣共產黨黨員，還是很重要的創黨者。不過，他是奉中共瞿秋白之命，協助謝雪紅創立台灣共產黨，他更是個中國共產黨員，還是重要的中共黨員。所以，他代東方局起草的〈致台灣共產黨者書〉，雖然遵從第三國際對殖民地革命的規定，仍然維持「台灣獨立」的主張。²⁵⁹但是，藉由上大派掌控台灣共產黨，成立新中央，翁澤生對台共的自主獨立立場已悄悄改變。對台灣共產黨稱呼，巧妙的由黨變成「台灣前衛『黨』」，再變為「協會」。

1928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無視於日共渡邊的死亡使台共與日共的聯繫再度中斷，竟然在台北成立中共的「台灣支部」。當時，正式加入中共獲中國共青團的有翁澤生、王萬得、吳拱照、劉守鴻、潘欽信等人。除翁澤生在上海，其他台籍中共黨員回台，分別在台北、台中設有兩個集團。中共方面的介入，使得台共的指導權發生混亂，以中國支部為中心的台共黨員，為反對謝雪紅的台共黨中央，成立改革同盟，接受由翁澤生派遣陳德興、潘欽信的指示。

雖然，翁澤生否認成立改革同盟是他的意思，發生誤會是因潘欽信還未回台講述翁澤生臨別交代：「在籌備會上檢查黨成立以來的工作，在這個基礎上討論黨的新綱領和其他文件，注意不要追究個人責任，目的是為了促進團結，“對謝要耐

²⁵⁹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頁120，註28。《警察沿革志》，頁694。

心幫助，一個女同志文化水平低，受黨的教育也不多，能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不管怎樣，她也是有一定影響力的”。」所以，蘇新等人承認誤解了翁澤生的想法而成立改革同盟。²⁶⁰

蘇新引潘欽信的說法：「翁澤生同志並不是叫妳們另外組織領導機構，由上而下去進行黨的改造工作，而是大會之前一方面檢討過去的工作，另一方面展開群眾的組織和鬥爭，用這樣的方法來教育一般黨員，提高黨員的水平，準備迎接大會，在大會上由下而上的批評領導，以達到改造黨的目的。」²⁶¹

很顯然在成立改革同盟和批判謝雪紅的主張出了問題，但也曝露了翁澤生改造台灣共產黨的想法。翁澤生要貫徹他寫的《致台灣共產黨者書》及新的《政治綱領》、《關於反對機會主義的數言》、《關於爭取擴大群眾》、《我們目前應做什麼》等，是要用「由下而上」的鬥爭，不是由上而下的籌組「改革同盟」。這是方法與技術的問題，結果沒有變。

翁澤生在潘欽信回台前對他強調：“對謝要耐心幫助，一個女同志文化水平低，受黨的教育也不多，能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不管怎樣，她也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其實就是要對謝雪紅展開批判，而且對謝雪紅的水平及性別極端不屑。

翁澤生要改造台灣共產黨，還有一段可質疑的經過²⁶²：「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翁澤生盡快派人把籌備二大的文件帶回台灣，於是翁澤生派遣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李清奇回台，把《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及上述諸文件交給王萬得，之後，未得台灣任何訊息。於是遠東局指示讓潘欽信回台具體指導台灣二大的召開。」

以王萬得和翁澤生的緊密關係，還有蘇新等思想慎密的共產黨員，會不回信給翁澤生報告台灣的訊息，而要等到遠東局指示再派人回台，翁澤生趕緊在潘欽信回台前，特別去廈門交代不要「追究個人責任」，為了促進團結，對謝雪紅要有

²⁶⁰ 何池，《翁澤生傳》，頁 240。

²⁶¹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頁 48。

²⁶² 何池，《翁澤生傳》，頁 239。

耐心等等。而台灣二大的召開，謝雪紅也未能如翁澤生所交代的參加。其詭譎的過程，以及事實上二大改造台共的目的達成，怎麼可能不讓人懷疑中共透過翁澤生掌控台共的目的。

在台北地方法院預審中，翁澤生供述有關他和謝氏阿女的關係頗堪玩味：²⁶³

「陳德興回去後，不久接到阿女的詰問性的信函，內容說：“陳回來後，對本人僅說在上海受冷遇一事而已。但對其他人則說，帶回中共中央委員（會）所交代反對阿女、清算機會主義的任務。且說曾出席過國際勞動組合聯盟大會。實情到底如何呢？”接著，阿女向中共中央部上訴“陳對黨的負責人本人不提一言，自稱是中共中央部的提議而標榜反機會主義，並公開要成立黨內組織，遂聚集知識份子出身的同志形成團體，稱為改革同盟，樹立指導機關，引發宗派鬥爭。而翁澤生成為其團體一員，派遣使者王溪森至台灣策動”云。其後連續地以同一旨趣的報告呈上中央。中共方面似乎亦認為有調查的必要，于昭和六年（1931）3月上旬，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組織部部長救上述各點審問過我，我斷然否認與改革同盟有任何關係。我說若有疑問可叫陳德興來此，如由該人口中判明本人確有涉入，本人甘願接受任何制裁。接著于同年五月重被交付中共審查委員會，審問是否派遣過使者王溪森，經我說明不是未改革同盟的工作而派遣回台。因此，大致以消除對我的懷疑。

在那前後，陳德興或是誰來說阿女拒絕了中共得提議，因此，中共曾說對台灣的事愈益不易了解云。

昭和六年（1931）3月20日左右，中國共產青年團員李清奇歸台之際，令其帶回中共中央交通局所托的文書“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但未接獲任何復信。其後，因中國共產黨中央數次質問有關台灣的狀況，乃數次報知台灣，但均無回音，于是向王萬得知會上述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質問意旨，終於接獲署名潘欽信的“第二次大會的召集”、“除名謝氏阿女”、“解散改革同盟”等報告，同時報告中說接到“致

²⁶³何池，《翁澤生傳》，頁331。《警察沿革志》，頁682。

台灣共產黨者書”。邇來，台灣的報告全部斷絕。」

這封自清沒有參與籌組改革同盟，掃除謝雪紅，將她開除台共黨籍的鬥爭，至少有兩點矛盾：

一、蘇新的回憶錄是說誤解了翁澤生的意思才成立改革同盟，而翁澤生也在中共中央關注下，趕緊跑到廈門，交代潘欽信“對謝要耐心幫助，一個女同志文化水平低，受黨的教育也不多，能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不管怎樣，她也是有一定影響力的”這就是說翁澤生對台灣的聯系暢通，就算蘇新等先前誤解了翁澤生由下而上的改革台共意圖，也不至於後來連謝雪紅等都被開除黨籍。然後才說已解散“改革同盟”及收到“致台灣共產黨者書”。

二、“中共曾說對台灣的事愈益不易了解”。這樣的說詞出自有台共與中共之間、台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絡人翁澤生之口，而又把全部責任推給台灣沒有報告，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從謝雪紅一再寫信給翁澤生詰問及報告中共中央；翁澤生也派了人回台，台灣共產黨要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翁澤生竟然毫不知情，中共更被蒙在情勢外，整個局勢混亂不堪，令人難以想像。

除此之外，台共駐日本的東京支部在 1929 年遭到檢舉後，在上海的翁澤生領導著上海的台共成員，另外以「台灣〔革命〕青年團」的名譽活動並擴大組織，翁澤生成為國際與島內工作的聯絡員。而在島內，以王萬得為首的上大派，在建立赤色總工會的問題和解散新台灣文化協會的問題和謝雪紅意見不同，而在松山會議後，兩條路線清楚的擺上檯面，王萬得等在成立「臨時工會運動指導部」所採取的推動方向有兩個重點：

一、有關設立臨時工會運動指導部，便是把全島各地的工會運動從事者召集起來，組成台灣赤色總工會組織準備委員會。到總工會成立之前，這個準備會就做為全島性的指導部，從而有關工會的組織，乃是從上而下有意識的把個別產業工會組織起來，朝向總工會去建立。

二、該組織委員會成立時，礦山工會、出版工會、交通運輸工會的組織方針、

運動方針、會則、行動綱領都要撰寫完成。²⁶⁴

王萬得是以上層領導組織為構想的「臨時工會運動指導部」推動方向，這和謝雪紅先健全個別工會，由下而上的做法不同。上大派路線和謝雪紅路線的衝突，誘發蘇新後來所稱揣摩錯了翁澤生的意思，才組織「改革同盟」，導致台共分裂的局面。雖然，翁澤生傳極力否認組織「改革同盟」是他的意思，但《翁澤生傳》辯解的內容，要由下而上的檢討，不是由上而下決定鬥爭謝雪紅。這樣的修飾法，只是鬥爭謝雪紅的手段不同而已，改革台共，打壓謝雪紅的目的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翁澤生將台灣共產黨內鬥的情況報告瞿秋白後，瞿秋白認為事態嚴重，於是：「翁澤生與瞿秋白一齊向遠東局做了彙報，還與遠東局就如何改革、盡快召開台共二大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在瞿秋白的主持下，翁澤生與潘欽信開始為了籌備台灣黨組織二大起草各種指導性文件。翁澤生奉命為共產國繼遠東局起草《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²⁶⁵

翁澤生是台共與國際東方局、中共中央之間的媒介，所有台共的消息都經由翁澤生傳遞；而中共中央和東方局的指令也經由翁澤生起稿處理。但翁澤生對台共二大召開前的亂象推說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還指責他派人回台的指示，台灣都沒有回音，把責任推向台灣。而事實上，不但謝雪紅對成立改革同盟等台灣共產黨內出現的問題有向翁澤生抱怨，也向中共中央報告，翁澤生將責任推向台灣，蘇新後來也有誤解翁澤生的說詞，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但是，改造台灣共產黨，使新台共在有中共黨員身分的台共黨員領導下，已經成為事實。

其實，翁澤生對台共的想法轉移，也不是在松山會議後的情勢利用才開始。翁澤生的中華民族觀念，早在台共建黨以前已經存在。所以，他才會在台共發生劇變，黨員相繼被捕的時刻，仍然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兩廣當中共中央巡視員。他的行動是以中共馬首是瞻，在以中共為主的思想，也表現出來。所以，翁澤生在1930《環球半月刊》第六期所登〈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雖然還強調

²⁶⁴ 《警察沿革志》，頁1295。

²⁶⁵ 何池，《翁澤生傳》，頁237-238。

台共是「台灣前衛黨」²⁶⁶。這已經是少見的稱呼了，後來，翁澤生還一度稱台共為「協會」或帶著引號的「黨」。²⁶⁷翁澤生以中共為主體，漸漸地不再承認台共在共產國際的合法地位。

翁澤生從小的生活和教育過程都事祖國的想向，只有中華文化的偉大和涵蓋性，沒有台灣文化的存在。所以，他的行為是復興中華民族，是要台灣回歸到所謂的祖國懷抱。

翁澤生從小就被灌輸祖國觀，小學畢業後又被送回祖籍地接受中華文化的教育，使他的思想裡都是中華文化史觀。所以，他不能認同台灣不屬於中國的想法。因此也影響了他對台灣共產黨的看法，從迫於共產國際的規定，修改到以路線為題，實則是為了中共黨員可以順利改組台灣共產黨，駕馭台灣的解放運動。

所以，翁澤生給人的評價，單純到他只是一個忠貞的中國共產黨員。

小結

翁澤生雖然在台灣出生，但從家庭教育、家庭環境開始，接觸的都是祖國觀和中華文化的薰陶。稍長，又回到祖籍地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和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想。他的中國情結，比土生土長的謝雪紅深了很多。

翁澤生把台灣當作中國的一部份，他藉由瞿秋白的指示，在松山會議以後，以右傾機會主義為理由，展開對謝雪紅的鬥爭，導致上大派以誤會翁澤生的想法為藉口，籌組“改革同盟”，接著並召開台共二大，將謝雪紅除名，修改台共創黨宗旨，通過新的政治綱領。

翁澤生的共產主義奮鬥史，可以借用何池寫《翁澤生傳》裡〈未完的話〉中的一段，做為翁澤生一生所塑造出的形象做總結：²⁶⁸

「這是一個革命與反革命激烈搏鬥，進步與倒退劇烈較量的特殊時期，這一時期魚龍混雜、大浪淘沙，多少人頹唐，多少人彷徨，多少人迷惘，多少人墮落

²⁶⁶ 「前衛黨」乃「先鋒隊」的日式說法。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員，都自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²⁶⁷ 〈謝氏阿女豫審庭 二於ケル供述要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頁 687。

²⁶⁸ 何池，《翁澤生傳》，頁 348。

叛變。但還有許多人如本書主人公那樣，堅信黑暗必將過去，黎明終將到來，他們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了祖國的獨立、人民的幸福，在白色恐怖中，在敵人屠刀下，面不改色、至死不渝，他們是一批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第三節 李應章的評價

李應章的成長環境，在經濟上雖過著優渥，但因日本殖民推行西化，注重西醫，而李應章的父親雖然行醫，但沒有中醫執照，經常被日警罰款。因此，在精神上過著被凌虐的日子，種下了李應章反抗日本殖民的思想，以及回歸祖國的盼望。

所以，他因二林蔗農事件走投無路的時候，回到祖籍地廈門行醫，繼而參加中國共產黨，希望透過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以振興國家，也就讓人不難理解。

李應章的形象轉折，就不同立場有不一樣的解讀，但以時間序，可分三個時期：

一、中華民族意識的李應章

由於深植民族意識和受北京出版《新青年》雜誌的影響，對社會主義有進一步認識。所以，更加反對日本殖民台灣。1915年9、10月間，寫了一篇提到噶吧嘍事件的文章《嗚呼慘矣哉》，李應章差一點被學校開除。這是他不滿台灣被日本殖民，所採取的批判行為。1916年他考上台北醫科專門學校以後，隨著年齡漸長，知識漸開，接觸到大杉榮、山川均等人的著作，思想更加左傾。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台灣，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自決潮流的影響，奠定了他民族主義意識的基礎。後來，李應章以參加島恥紀念日活動、組織修業旅行團到革命根據地廣州、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籌備到組織蔗農組合的一連串反抗日本殖民活動，展開他對台灣政治與經濟的關心。

不過，仔細探討李應章這段時間的做為，也只是民族意識的養成和對台灣政

治社會的關心行動，其反抗日本殖民是事實，但反抗的思想還是模糊，在實際的行動上還是體制內改革，沒有強烈的反抗思想。茲以李應章參與最深又直接的「二林蔗農組合成立總會」為例說明²⁶⁹：

「台中州二林庄、自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起、在二林原製酒組合內開蔗農組合成立之總會、出席會員百七十二人、出委任狀者六十一人、缺席者百七十一人、旁聽者約百餘人、來賓也有遠自南投台中西螺而來、二林分室主任土橋警部及林糖之社員、亦見多數出席、可謂一時之盛會矣、迨開會時李應章先敘開會辭、次者劉松甫氏報告經過、及說明下記之事件、嘆願之經過、蔗農組合之設立、蔗農組合之必要、組合原之團結、總總團結力之比較、地方害蟲之驅除、結論、然後修正定矣、選舉職員、洪能傳氏述就任詞、詹奕侯是披讀各地之祝電。來賓之中、泉風浪氏、張紹賢氏、魏朝昌氏、均述祝詞及感想談、劉松甫氏述閉幕詞、最後一齊高呼二林蔗農組合萬歲、始散會、其所選職員儒左、

理事：李應章、劉松甫、詹奕侯、詹仁華、蔡淵騰、王芽、謝日新、邱菊花、曾得明、戴成、諸氏十名中互選李氏為總理。

監事：謝黨、陳萬勤、謝月、詹忠、洪珍、詹昌寶。

各庄之代議員五十名、因時間迫切、故俟後日再行選舉。」

從台灣民報所登載的上述選舉過程和結果，可看出幾點現象：

- 一、蔗農組合成立總會是獲得殖民政府允許的。所以，土橋警部、泉風浪都出席成立大會。
- 二、林糖社員也多數出席，顯見蔗農組合最初對甘蔗收購價格訴求的合理性。
- 三、最重要的是蔗農組合的成立及訴求都在體制內，所以，日本殖民政府及林糖沒有反對的理由。

大正十四年台灣民報第二卷（旬刊）第六號社論〈改換糖業政策的急務〉，呼應了體制內改革的必要，其內容分幾大要點：

²⁶⁹ 《台灣民報》，大正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第六十一號。

一、糖是台灣四個大產物的一種、自未被割讓以前各地已經有設了糖廠。設糖廠的資本家和植蔗的農夫，雙方契約將蔗糖均分，皆是合意的沒有聽見了何等的公平了。割讓後施行糖業保護政策，招了本國的資本家渡台，設大工業組織的製糖會社，許與會社有一定的採收區域、在區域內不准再設別的工廠、並不準區域內所植的蔗、賣出別的工廠、又且實收價格皆是會社決定、然後得了地方官廳的認可、就隨便可以收買。

二、大工廠創設之當初植蔗的人很少、原料不足以供壓榨、於是官廳出強硬的手段、使景官強制農民廢止種稻改換植蔗了。

日本殖民台灣的糖業政策，就是剝削蔗農，保護了資本家，截然不同於日本殖民以前，資本家予蔗農共存共榮的台灣糖業時代。所以，社論有以下的決論：

「如上所說、台糖有今日的發達全在政府的保護、和犧牲許多島民的利益-----。於是當這個轉機、應使會社和蔗農有調和的、共存的互相理解他們是密接的關係、利益不可偏於一方面、須互相保持利益如車之兩輪不可缺一、始能堅固糖業的基礎了-----。」

李應章在台灣所做最為轟轟烈烈的蔗農事件，就當時的蔗農訴求活動看來，沒有偏離他原先參加台灣文化協會，以體制內改革台灣的想法。這時期的李應章和其領導蔗農對林本源要求增加收購價格的運動，在日人今村義夫看來，在他的〈台灣的農民運動〉文章這樣表示²⁷⁰：

「本島蔗農民的運動，集團的進行的、而且具備所謂農民運動的型態的、是大正十二年末的對林本源製糖的二林庄蔗農的甘蔗收買價格增家要求的運動。-----。然最近二林庄農民對林本源製糖的收買價格增家要求的運動、因為會社拒絕她們的要求、所以選出代表者對官廳請願運動、由那結果之何如漸漸的會呈出政治的色彩的傾向-----。台灣的農民運動、由這點看來、或者會容易進展於政治的。」

²⁷⁰今村義夫，《台灣民報》〈台灣農民運動〉，第三卷第十五號，大正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所以，今村義夫的結論²⁷¹：

「縱使台灣的農民運動、由經濟的要求進於政治的要求、然決不出現集團的暴動的運動、無論到甚麼時候、能夠使他像健實的英國式的秩序的組合運動與否、是全在關係當局者有理解的對策之如何呢！」

正如台灣民報於大正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登載今村義夫〈台灣的農民運動〉結論指出，農民運動由經濟走向政治，只要總督府處置得宜，也不會出現集體的暴動。可是，殖民政府偏袒資本家，六個月後終於發生集體反抗的二林蔗農事件，由經濟的訴求走向政治訴求，還發生今村義夫早在六個月前的忠告。從這一事實的演變過程了解，農民運動的要求，本來只是體制內的經濟訴求而已，會發展成集體暴動，統治者的殖民政策，偏袒資本家，剝削蔗農是重要原因。

照二林蔗農組合的發展分析，其要求也都在經濟問題的公平性。那麼，可見得二林蔗農事件的節外生枝並非組合所願。所以，二林蔗農事件發生後，組合幹部李應章等人也大出意外，趕緊滅火。

李應章是想在體制內尋求救濟的，從他關心蔗農問題，展開對甘蔗生產、銷售的成本調查，都是在蒐集資料，為體制內力爭蔗農利益做準備。所以，就算二林蔗農事件擦槍走火爆發了，也可以從他知道後的第一時間處理方式，瞭解李應章的想法：²⁷²

「聚集在鬥爭本部門口的群眾們，大家齊聲歡呼“勝利萬歲”之後，異口同聲要求：一不做二不休，進軍再進軍，包圍警察局，搶奪武器，願在農組幹部領導下起義-----。急得李應章、謝黨、蔡淵騰、劉崧甫等跳到台上高呼曰：“千萬不可亂動！毫無準備、以卵舉石、是白送肥肉給老虎-----。”

從這一臨場反應，雖說是知識分子的謹慎，但也反應出農組的領導成員，根本都沒有想到蔗農組合的要求，有可能擴大到政治效應，發展出集體暴動。蔗農組合只是在單純的請求殖民政府給予經濟重分配的考慮而已。這和台灣文化協會

²⁷¹ 同上

²⁷²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李偉光，〈台灣農民鬥爭史簡述〉，頁 42。

的林獻堂等訴求改革如出一轍，雖有殖民者不公平的民族自覺，但沒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只想苟延殘存的得到殖民者恩賜，在體制內獲得比較合理的對待而已。

蔗農組合最後會成為共黨組織的重要溫床，成為台灣民族論的台灣共產黨重點發展對象，其實是殖民政府對蔗農問題處置不當的結果，落入了今村義夫的推論。

李應章的中產階級溫和的反對運動，在二林蔗農事見他被關出來後，雖然已經逐漸擺脫溫和主張和抗議路線，走向更激烈的民族解放運動。不過，他仍然沒有步入以連溫卿、王敏川為首的激進左派所高唱的農工階級運動的叢林，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還不是他的選項。他雖是中華民族的信仰者，但也是資產階級的苟安者。

二、走向鬥爭的第一步

李應章逃脫日警可能採取的逮捕行動到廈門以後，正式加入共產組織，成為共產黨員。李應章這才從跟隨林獻堂的中間偏右，以及蔣渭水的中間偏左，走向共產主義階級鬥爭路線，試圖拋開資產階級身影。台灣成為解放的目標，不再只是殖民體制下的政經改革標的。李應章在他的自傳這麼反省：²⁷³

「廈門時代的思想：初到廈門時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思想意識，及看到當權的國民黨腐敗無能，國家又那麼破爛不堪，民族又那麼萎靡不振，為民族良心所激發，堅決地要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組織。我雖然在台灣也有階級意識，也搞過農民運動，也仰慕共產黨的偉大，有做一名共產黨員多麼光榮的信念，但是當時還沒有達到一邊倒的程度；另一方面，又被國民黨的如何實行三民主義的虛偽宣傳所蒙蔽。而一到廈門，一切的真實情景，打消了我對國民黨僅有的一些幻想，更加堅定了對於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信念。所以對工作始終抱著熱情與積極的態度，勇敢、冒險的為黨工作。」

鼓浪嶼神州醫院是李應章從中產階級出發，試圖體制內說服殖民者的反對運

²⁷³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李偉光（應章）自傳〉，頁 148。

動，變身為無產階級共產黨員的開始。

李應章於 1932 年 1 月離開台灣到廈門後，跟外甥洪允廉²⁷⁴商量在廈門開設醫院維持生計。經同鄉張水松介紹，於 3 月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互濟會。4 月，由中共廈門市委組織負責人嚴壯貞介紹加入共產黨。²⁷⁵

這段時間，主要是為游擊區出來的同志治病、以神州醫院掩護往來同志。比較特別的是李應章創設金門黨組織，擴展共黨組織範圍。不過，李偉光的自傳以及口述都沒有提到發展金門黨組織的事。金門黨組織的發展，是許文辛在他的著作《心血留痕》所提：

「1933 年 2 月，中共廈門中心市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壞，先後被捕二十多人，40 個黨支部只剩下 7 個。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仍繼續戰鬥，工作逐漸恢復，並交給應章同志一個任務，開闢金門縣新區，在那裡建立黨的基層組織。-----。1933 年秋天，成立第一個中共金門縣支部。」²⁷⁶

2010 年 3 月 4 日，筆者到廈門拜訪許文新老先生。當年許老先生已近九十高齡，但還能從自家三樓下街運動，精神狀況很好。他簽名送了《新血留痕 許文辛藝文選》上、下冊給我，表示筆者想知道的事都在書中。

許文辛是金門人，出生於 1921 年 7 月 8 日。1938 年 8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城工部廈門市委會常委。李應章在金門發展中共組織，就是他根據中共黨史資料披露，並登載於 2003 年 3 月的《廈門黨史通訊》第一期。

許文辛住在廈門離休幹部宿舍，小小的客廳放著一台鋼琴，許老先生原來會彈鋼琴。一個從小從事地下工作的反抗者會彈鋼琴，出乎筆者意料之外，但也因筆者同樣會彈琴，喜歡音樂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他拿著《心血留痕》指著裡面的內容，以二·二八事件後，上海《文匯報》於 3 月 13 日舉行的座談會為例，

²⁷⁴ 台大教授洪永泰的父親。筆者外祖母家的後面緊鄰的是洪允廉家前面的兩個大池塘，筆者小時候住外祖母家很多年，經常和洪永泰及筆者表哥李根培等以竹竿當武士刀在池塘邊學宮本武藏格鬥。洪允廉家的芭樂是紅心，跟筆者外祖母家不一樣。筆者小時候看得洪允廉，好像都沒有笑過。今年十月，台大教授洪永泰會發表一篇他父親的文章。

²⁷⁵ 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

²⁷⁶ 許文辛，《心血留痕》〈李應章（李偉光）同志向金門撒播紅色種子〉，頁 30。

說明李應章的為人和思想：²⁷⁷

「台灣問題不能單獨解決。只有當台灣人民配合著中國全體人民爭取整個中國的民主政治的建立之後，台灣問題才能徹底解決。」

他的論述，說明李應章所屬的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問題解決，是有別於台共的民族自治主張和撤換陳儀的國民黨思維下的辦法。中國共產黨在1947年是否能戰勝國民黨，進而解放台灣都八字沒一撇，但李應章等中國共產黨員已經把台灣中國化了，並且展開對國民黨的全面挑戰。

三、中共解放台灣的旗手

中共對台灣地位的主張，從早先派蔡孝乾等在台灣成立中共組織的支部，以及中共黨員翁澤生對台共黨稱呼的改變，已經有兩手策略的嫌疑。在香港會議時更明目張膽改變，不再認為台灣民族論和台灣獨立自治的主張。這時候的中共，為了對台宣傳統戰的關係，還不得不借重二·二八以後謝雪紅在國際與台灣島內的聲望，借由謝雪紅寄人籬下，以及時勢的改變，不得不做若干台灣獨立自主的主張修正，試圖讓謝雪紅成為中共解放台灣的代言人。

其實，以當時的政治現實，被中共器重的翁澤生已殉難，中共派到台灣的地下工作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被捕，中共對台灣的發言，找不到人，也找不到合乎中共理念的正當性發言，不得不透過謝雪紅的台灣民族高度自治，找到干預台灣的合理性。可是，中共對謝雪紅的台灣民族自治主張存有戒心，而在台灣人之中，勢力與聲望能和謝雪紅抗衡，又是中共的死心黨員也只有李應章了。剛好，謝雪紅又在上海同鄉會的理事長選舉上，捅了李應章一刀。中共要奪回對台灣的發言權，順理成章以李應章鬥上謝雪紅，展開宗派之爭，以致在台盟內掀起血雨腥風。

中共有政治現實不得不先找上謝雪紅這個合作對象，謝雪紅也有她的政治困境。1947年香港會議時，因為台灣局勢改變，統治台灣的政權由日本帝國轉到國民黨政權，謝雪紅在找上中國共產黨這個與國民黨對抗，而且是有實力的盟友後，

²⁷⁷ 陳上藩（化名辛鷹），《文匯報》〈台灣一頁傷心史—“二·二八”事件座談會上的發言〉，1947年3月17日《文匯報》星期座談。

因為人在中共支持的屋簷下，不得不調整台共的台灣民族與革命、自治的政治綱領，稍微修正成高度自治，以配合中共在延安發佈的〈台灣自治運動〉聲明。

只是，台灣高度民主自治的主張，所隱藏的台共政治主張「台灣獨立」，還是如影隨形附著在謝雪紅的身上。因此，不得不另起爐灶，培養翁澤生、蔡孝乾等一脈相傳的死忠中共黨員李應章，成為中共解放台灣的旗手。

李應章的崛起，就在於他掌握上海的台灣同鄉會。1945年11月成立的台灣同鄉會選舉過程和結果是個迷，參與競爭同鄉會理事長的李應章、楊肇嘉各有說法。根據台灣右翼政治運動者楊肇嘉回憶錄的說法：

「上海的台灣人希望以他為中心組織同鄉會，他也被推為台灣旅滬同鄉會的理事長。」

但李應章早在1943年與台灣青年施石青、郭星如等在上海成立「台灣解放聯盟」，他以這個基礎在1945年戰後，與短暫停留上海的楊肇嘉競選上海台灣同鄉會理事長職位，最後結果如何應該不難想像。

所以，楊肇嘉說：「上海台灣人認為應該團結組織起來」。這是一句上海台灣人分裂的象徵。其後又說：「同鄉會成立大會那一天，我仍被推為《台灣旅滬同鄉會》的理事長。」從語句分析，可以斷定這次台灣同鄉會的選舉充滿競爭，也充滿不確定性。

所以，李應章在其自傳的說法：「11月10日同鄉會成立大會的前一天晚上10點左右他被綁架，第二天被莫名其妙釋放後趕到同鄉會會場，大會還沒有結束，他被選為當天大會的主席，選舉結果楊肇嘉的人當選七個理事名額，李應章的人當選八個理事。」

雙方的說詞南轅北轍，根本兜不攏。不過，到底是誰當選台灣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克世2010年底，在其給筆者的通訊稿第四章值得注意：

「关于李伟光是旅沪台湾同乡会会长的事实，仅著者所看到的记述者就有上述吴克泰、叶纪东、许文辛、李韶东、刘毓兰、江浓、杜长庚、张志忠、苏新等众多台胞，可以说举不胜举；更有谢雪红、杨克煌等反对者的记述，以及新近为谢雪红“真正平反”的《啊！谢雪红》

的兩位主筆，還有保存於台盟中央的「旅滬台灣同鄉會」向當年的救濟總署申請撥船、發放救濟款的報告書等原始文件，上面蓋有「旅滬台灣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之印。」

更重要的是接下來台灣旅滬同鄉會所做的幾件事，成就了李應章在台灣解放運動的崛起，也間接證明他在台灣旅滬同鄉會的重要性：

- 一、1946年1月，台灣同鄉會接洽美國船“藍美斯”號，第一次遣送台灣籍難民1800人返台。
- 二、3月，共諜張志忠等五人由同鄉會掩護進台灣。
- 三、7月，蔡孝乾帶馬惠玲進台灣，李應章和蔡孝乾相約隨後返台工作。
- 四、9月，李應章回台，受到長官公署邀宴，認識了嚴家淦、葛敬恩、李翼中、周一鶚等。

中共利用台灣旅滬同鄉會在做解放台灣的準備，這就給予李應章表現和崛起的機會。如果李應章不是台灣旅滬同鄉會的理事長，以李應章在上海的醫生身份要得到長官公署邀宴洗塵，恐怕不可能。這又間接證明李應章負責中共地下工作運送地工到台灣的成功，李應章確實掌握了台灣旅滬同鄉會，並成功的扮演中共解放台灣的重要角色。

綜觀李應章三個階段的歷史轉折，其實可歸納兩點評價：

- 一、他不是道地的革命家，而是有慈善心的知識分子。
- 二、他不是道地的共產主義者，但他有理想性，從社會主義入門，卻又有資本主義的經營之道。

小結

不論在台灣時期，還是到大陸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李應章都是資產階級文化人。在台灣時期，李應章參與創立以資產階級為背景的台灣文化協會，或是組織蔗農組合，都是要在體制內尋求起碼的正義和殖民社會政治制度的改變。李應章雖然有民族主義的主張，對所謂的祖國有相對的親切。不過，資產階級的背景，

使得他所走的路線很像林獻堂。在台灣的最後幾年，由於被關和父親憂憤而死的刺激，他和蔣渭水一樣，逐漸轉變成走中間偏左路線，在台灣民眾黨彰化會議中有了「寧願玉碎，不願瓦全」的演說，在殖民統治下有了較激烈的抗爭。不過，他並沒有要放棄資產利益做革命性的搏鬥，仍然在體制內做比較激烈反抗而已，距離徹底的革命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被迫離開台灣到廈門，變成一無所有的李應章，在加入共產黨後，對抗的視野擴大，不再只關心台灣島內的問題，對中國大陸的革命形勢，對國民黨的鬥爭，開啟了他另一段的人生。

但是，對筆者的姑婆祖（李應章的元配）而言，卻是難堪度日的歲月。筆者回憶兒時看到的姑婆祖，眼神好像能看透一切，但又靜靜地好像沒有看到她笑過。在台灣的筆者長輩，筆者聽到的也都是為姑婆祖抱不平，對李應章的印象不好。

由於李應章善於經營醫院，很快又在上海成為資產階級。謝雪紅鬥爭李應章時，就是找到李應章是資產階級成份的問題，迫使李應章最後不得不捐醫院房地產權，解了被攻擊的危機。

李應章的一生，都是在體系內求發展的一個社會關懷者。在台灣時期，是在日本殖民體系內，為蔗農發聲，要求殖民政府比較公平的對待蔗農，提高蔗農被資本家剝削的收入。二林蔗農事件的爆發是意外，不是李應章組織蔗農組合的目的。在中國大陸，不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復興中國，改善社會公平正義而努力，或者自力經營醫院事業而工作，他都有資產知識分子影子，審時度勢在做事，是一個社會問題的關懷者，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追隨者。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以李應章等三人，討論它們的路線和國家認同，著眼點在於他們三人的革命路線和國家認同其實都有差異；而他們的鬥爭過程，又有過很大的爭執和關聯。在那個時代的人物，固然有很多類似他們差異性的人物，但整體上的落差還是李應章等三人最大，牽連性最為關鍵。所以，本論文就以他們為例，藉以透視日治以降，台灣問題的本質。

探討台灣問題的本質，最大的用意在於了解台灣何去何從？李應章等三人的路線與國家認同觀察比較，已經提供了多個層面的經驗供參考：

一、謝雪紅提供了：(一) 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選項；(二) 台灣自治的聯邦型態選項。

二、李應章提供了：(一) 政治管轄與民族認同分開，成為日本統治的一部分選項；(二)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台灣人成為台灣地區負責人選項。

三、翁澤生提供了：中國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領導大中國選項。

歷史人物的是非對錯，端要看是站在甚麼立場。但書寫歷史人物，最重要的還是人性化，不能因為立場而神格化。本論文從人性的觀察出發，對於歷史人物的勇敢或懦弱，只就他處理該問題時的態度和時代背景論述。譬如謝雪紅的台獨立場，就是按照不同的時間點和背景因素，論述了她對此一問題差異性表態。因此，本論文搗破了一些歷史書寫對李應章、謝雪紅、翁澤生過度美化的論述，讓歷史事件及個人行為去凸顯他們的特徵，而不去特意強化他們的貢獻。

李應章、翁澤生和謝雪紅三人，選擇不同的人生路線和對國家、族群的認同，如果是有立場的看待歷史，他們都有對的也有錯的，端看批評與論述的角度。其實，只要是撰寫路線或國家認同，都會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和雜音。而且，撰寫者為了強化己見，往往美化自己論述的對象，導致歷史被扭曲而不知。本論文從李應章等人的歷史背景、抗爭路線到國家認同及其行為在歷史上所呈現的形象，抽絲剝繭，藉由對他們的觀察比較，讓台灣前途的問題解決，有更多的參考。

全文完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洪麗完，《二林鎮志》，彰化縣二林鎮：二林鎮公所，2000。
- 牛津，《內戰前夕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台北：巴比倫，1993。
-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王振勳，《林獻堂的社會思想與社會活動新論》，台北：稻田，2005.3。
- 朱雙一，《台灣文學與中華地域文化》，廈門：鷺江出版，2008.9。
-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台北：玉山，1999.10。
- 李筱峰，《島嶼新胎記》，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3。
- 李子麟，《李氏祖譜》，2005.4。
- 李玲虹，《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 李偉光〈上、下集〉》，北京：台海，2006.9
- 李克世，《一個台灣人〈上、下集〉》，廈門：藍海，2008.12。
- 李克世，《台灣醫生李應章》，廈門：藍海出版社，2009.10。
- 朱豔聖，《冷戰後的社會主義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 朱雙一，《台灣文學與中華地域文化》，廈門：鷺江出版，2008.9。
- 邱坤良，《漂流萬里陳大禹》，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8.6。
- 邱錢牧，《中國政黨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 汪毅夫，《閩台緣與閩南風》，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 汪毅夫，《閩台地方史研究》，福州市：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何池，《翁澤生傳》，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9。
- 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10。
- 呂思勉，《中國文化史-北京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
- 余雲波、吳雲鄉、趙壽龍，《中國民主黨派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
-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人間，2002.8。
- 林美容，《台灣文化與歷史重構》，台北，前衛，1996.8。

- 林書揚、劉昭勇、藍博州編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台灣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31—1936〉》，台北：海峽，2006。
- 施正鋒，《臺灣民族主義》，臺北：前衛。
- 孫其明，《和談、內戰交響曲—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初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約瑟夫·格登，《朝鮮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3。
- 侯樹棟、辛國安，《馬克司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洪永固主編，《李玲虹〈玉惠〉的人生歷程》，台北：海峽，2010.4。
- 洪長源、魏金絨，《殖民地的怒吼 二林蔗農事件》，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1.11。
- 秦國生、胡治安主編，《中國民主黨派 歷史政綱人物》，山東：山東新華，1990.11。
-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縣：稻鄉，1988.10。
- 國防部總政治部，1958，《謝雪紅的悲劇》，國防部總政治部印。
- 舒揚，《當代文化的生成機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10。
- 郭杰、白安娜，《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台北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6。
- 徐國章譯注，台灣總督府景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2007.12.31。
-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 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1998.10.1。
-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2009.3.1。
- 陳芳明，《左翼台灣 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1998/10/1。
- 陳芳明，《左翼台灣》，台北：城邦文化事業。
- 陳芳明，《楊奎的文學生涯》，台北：前衛，1988。
-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遠流，2008.8.1。
-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 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台北：時報出版，1995。
- 陳儀深、林美容、葉海煙、林有土，《台灣的移民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台北：財團法人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

- 陳小冲，《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 陳總統水扁先生九十三年言論選集〈上〉，行政院新聞局：文盛，94.9。
-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
- 陳孔立，《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北京：九州，。
- 舒揚，《當代文化的生成機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10。
- 許文辛，《心血留痕 許文辛藝文選〈上、下集〉》，香港：香港通行，2008.12。
- 許雪姬、詹素娟、鍾淑敏，《向左一轉》，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0.10。
- 許慶雄，《台灣的國家定位》，台北：知音文化，1995.5。
- 張傳仁，《謝雪紅與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5。
- 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台北：海峽，1999.10。
- 楊克煌筆錄，《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2005.2.28。
- 楊碧川，《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台北縣：稻鄉，1988.11。
- 楊彥麒，《百年糖紀》，台北：貓頭鷹，2001。
- 楊渡，《簡吉 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台北：南方家園 2009/01。
- 葉紀東，《海峽兩岸皆我祖鄉》，台北：聯經，2000.9。
- 張克輝，《啊！謝雪紅》，台北：愛鄉，2007.2。
- 蔡國裕，《中共黨史—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台北縣：國史館，1994。
- 蔡淵潔，《思與言》，26卷1期，1988年5月。
- 許進發，《簡吉案史料彙編》，台北縣：國史館，2008。
- 潘英，《台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台北：自立晚報出版。
-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
1997.12.19。
-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2006.4 第四刷。
- 鍾逸人，《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上下
冊，台北：前衛，1995。
- 簡吉，《簡吉獄中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5/2。

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台北：海峽，2006.8.20。

羅文棟、吳波、代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論》，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最新版全譯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滬上臺灣人1、2冊》，上海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2005。

蘇新，《永遠的望鄉》，台北：時報文化，1994.9.20。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十報文化，1993.4.10。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1993.3.30。

二、論文

1、碩博士論文

徐相文，2《毛澤東與韓戰：介入背景、決策過程與動機》，國立政治大學歷經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許淑真，《政治與傳記書寫：謝雪紅形象的變遷》，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廖秋紅，《日治末期台灣人身分認同的演化進程—以台籍作家的志願兵題材小說為中心。

周宜慶〈2008〉。「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對台灣與韓國身分認同的影響—兼論台灣族群共識的建構」，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2、研討會、期刊論文

許俊雅教授，《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婦女問題》。

謝世海，〈二林蔗農事件的時代背景與對台灣農運的影響〉，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2010

林瓊華，〈流亡、自治與民主：試論陳芳明著作《謝雪紅評傳》之貢獻及爭議〉，台灣風物六十卷二期。

- 孟樊，〈九〇年代台灣有了資本論〉，中國論壇三一卷四期。
- 蘇紹智，〈《資本論》在台出版的意義〉，中國論壇三一卷四期。
- 陳芳明，〈台灣抗日運動的左翼路線〉，中國論壇三一卷四期。
- 林書揚，〈滾滾紅塵〉，〈中國論壇〉三一卷四期。
- 李英明，〈馬克思主義在台的滄桑歷程〉，〈中國論壇〉三一卷四期。
- 陳映真，〈馬先生來了〉，中國論壇三一卷四期。
- 伊藤 幹彥，〈台灣社會主義思想之研究—連溫卿與謝雪紅—〉，〈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二期。
- 洪英雪，〈從性政治突圍而出—論謝雪紅書寫以及李昂〈自傳的小說〉〉，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 鄭義，〈踩不死的野花：謝雪紅〉，傳記文學第九十八卷第五期。
- 1958，《謝雪紅的悲劇》，國防部總政治部印。
- 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 早期留俄的台灣人：戰後的謝雪紅女士與醫界人士〉，台灣醫界 2008，VOL.No.3、4。
- 周茂春，〈台灣真女人一代奇女謝雪紅〉，歷史月刊第二四八期。
- 施懿琳、王婉容，〈雪地中綻放的血色之花施懿琳、王婉容談汪其楣的謝雪紅〉，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0.09 NO28。
- 徐宗懋，專題報導〈他 日本極右派令人氣憤〉，亞洲週刊 1999 年 12 月 6 日_12 月 12 日。
- 伊藤幹彥，〈簡吉的台灣農民運動與資源動員理論—以簡吉的台灣民族主義思想為中心〉，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2。
- 林炳炎，〈航向「勞動階級天堂」之旅〉，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2。
- 江昺崙，〈農村出代誌：台灣農村文學的抵殖民「騷動」論述〉，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2。

- 吳人，〈戰前與戰後臺灣左翼思想之連續、斷裂與變形—以臺共為觀察對象〉，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2。
- 張素玠，〈濁水溪出大誌—經濟環境變遷下的社會運動〉，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2。
- 林蘭芳，〈新高製糖與蔗農〉，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2。
- 黃文源，〈蘇新在東亞共產運動的矛盾與困境〉，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3。
- 趙惠敏，〈死牢歌聲—葉陶的二二八〉，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3。
- 蘇瑞鏘，〈1950年代台灣國民黨當局對異己的整肅—以整肅政治犯為中心的討論〉，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3。
- 施幸妙，〈階級對立與煽動憧憬〉《三字集》對農民的魅惑，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3。
- 王妙花，〈日治與國府獄政之比較—以簡吉與柏楊獄中觀察為例〉，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3。
- 林邑軒，〈「革命」是唯一的答案：戰後初期臺灣地下反抗運動初探〉，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3。
- 薛淵元〈吳謠訪談錄〉呈現之「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高雄縣為例，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3。
- 秦賢次，〈臺共的中堅人物—翁澤生〉，《台北畫刊》：〈臺北人物誌特刊〉
- 伊藤幹彥，〈臺灣社會主義思想之研究—連溫卿與謝雪紅—〉，思與言第42卷第2期，頁43-47。
- 邱士杰，〈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若干考訂之辨析—以翁澤生新建逸文〈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為中心討論〉，史原復刊第一期 總二

十二期。

莊萬壽主編，《第四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萬卷樓，台北。

許雪姬，〈左翼人士與白色恐怖事件〉，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2。

陳翠蓮，〈戰前與戰後的台灣共產黨〉，台南大學：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3。

3、報紙

劍如，〈論蔗農組合設置的必要〉，《台灣民報》，〈台北：1924年10月11日〉。

劍如，〈改換糖業政策的急務—須撤廢採收區域、買收價格要和農民定協〉，《台灣民報》，〈台北：1925第二卷第六號〉。

今村義夫，〈台灣農民運動〉，《台灣民報》，〈台北：1925年5月11日〉。

譯大阪朝日，〈中大之台灣農民運動 製作組合問題勃興 製糖會冊大受威脅〉，《台灣民報》，〈台北：1925年6月21日〉。

評論，〈拂下地爭議解決如何〉，《台灣民報》，〈台北：1926年12月19日〉。

矢內原，〈全島各地雖受無理之夾攻 但德不孤人道終是不滅之真理〉，《台灣民報》，〈台北：1927年5月8日〉。

布施，〈言論自由與法律〉，《台灣民報》，〈台北：1927年4月24日〉。

〈二林事件第二審公判〉，《台灣民報》，〈台北：1927年4月17日〉。

〈二林事件一審判決〉，《台灣民報》，〈台北：1926年10月10日〉。

〈論評〉，〈鳳山事件的考察 依然是警察挑出來的〉，《台灣民報》，〈台北：1926年10月10日〉。

〈過去與現在的台灣政治運動〉，《台灣民報》，1927〈昭和二年1月2日〉。

蔡孝乾，〈轉換時期的文化運動〉，《台灣民報》，1927〈昭和二年2月13日〉。

〈台灣解放運動的考察〉，《台灣民報》，1927〈昭和二年1月30日〉。

〈二林事件的考察〉，《台灣民報》，1926〈大正十五年9月12日〉。

〈二林蔗農與林糖爭議事件的公判〉，《台灣民報》，1926〈大正十五年9月12日〉。

李應章，〈蔗農爭議的回顧〉，《台灣民報》，1927〈昭和二年4月17日〉。

蔣渭水，〈對台灣農民組合聲明書的聲明〉，《台灣民報》，1927〈昭和二年6月12日〉。

〈台灣唯一的政治結社 台灣民眾黨〉，《台灣民報》，1927〈昭和二年6月12日〉。



附錄

李克世著 《謝雪紅的真面目》通訊稿目次（內文太多省略）

目次

序	3
第一章 得宠于“唯成份论”，自命不凡，人生悲剧由此产生	7
一、穷则思变，为了什么而变？	
二、抱住共产国际的任命，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唯恐丢权	
三、立党为私，专横跋扈，目无组织，导致台共全党覆没	
第二章 自首变节，对簿公堂，诋毁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声誉	42
〔附录〕1、谢氏阿女于预审庭供述要旨	
〔附录〕2、翁泽生供述有关与谢氏阿女的关系	
第三章 自吹自擂，实为二·二八逃兵	68
一、略谈台湾地位早已定，回归祖国	
二、从期望到失望，山雨欲来风满楼	
三、官逼民反「二·二八」	
四、自吹自擂，实为「二·二八」逃兵	
五、这位「二·二八」“武装斗争”的典范！	
第四章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招降纳叛、拉帮结派	105 - 1 -
第五章 不学无术、谬论百出，贻笑大方	135
一批：“台湾人无汉奸”论	
二批：“台湾民族”、“半民族”论	
三批：“外省人不了解台湾，不能当台湾省长”、“要民主党派轮流执政”论	
四批：谢雪红渲染别人「红之恋」，而自身放荡无伦	

第六章 翁泽生/李伟光（应章）与谢雪红的矛盾

——试析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164

第七章 一个真实的历史史实——

谢雪红与其第二次入党介绍人李伟光,.....,206

第八章 历史不容篡改 ,.....,222

〔附录〕《凤凰卫视》『红流——台湾共产党沉浮录』澄清了一些史实

〔以上第六、七、八章转载自《台湾医生李应章》略有修订〕

以下重點是李應章之子李錫凱與林江〈此人希望隱名〉於 2010/10/12

寫給我近兩萬字的部分重點，主要在鬥爭謝雪紅，兼及左翼運動

- 谢雪红自称出身于“茶婆杆仔跃踞为天然的“无产阶级”由于不是为了主义真在翁泽生、蔡孝乾、苏新、王万得、李应章等革命知识分子包围之下，自卑有余，
- 台湾现代史学者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以下简称《谢评》）将翁泽生、蔡孝乾/李伟光与谢雪红之间的矛盾分析为宗派斗争
- 1986年9月15日，谢雪红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在移放仪式上，中共中央统战部武廉元副部长代表中央的讲话作出对谢雪红的平反，
- 2007年3月15日“谢雪红非‘台独鼻祖’”一文，否定“宗派斗争”论，又不正视翁泽生/李伟光与谢雪红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
- “宗派斗争”论者，更贴近于史实的谢雪红（至少基本符合史实），没有过多篡改，只是最大的缺陷在于回避了与翁泽生“对簿公堂”的叛徒行为；
- 翁泽生于1933年3月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引渡至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进入台北监狱，
- 翁泽生已知道她也转了“向”，而且是第一个“转向”，
谢雪红竟然在法庭上，在敌人面前把台共内部路线斗争的情况全部抖落出来，她大骂翁泽生，“揭发”翁在台共中的所谓“分裂”活动，把台共遭到破坏的责任推到了翁的身上谢氏阿女的这一发言，全文被法庭记录下来，收载于《台湾警

察沿革志》第 682 页。也转载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之中。全文共 6000 多字。

- 翁泽生不了解台湾情况，说台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鼓励王万得在党内成立改革同盟，分裂台共。我曾要求中共中央查清事实。
- 翁泽生/李伟光（应章）与谢雪红的矛盾、斗争，不是宗派斗争，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翁、李与谢的斗争是围绕着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不是宗派斗争。
- 谢雪红这种极端个人英雄主义“当然领袖”欲之骨子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一切为了革命
- 1949 年上海解放后不久，为迎接台湾的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台盟”内的共产党员整风，谢雪红唯恐李伟光在上海解放前地下党工作上的成绩可能成为她“当然领袖”就恶意攻击李“讨小老婆”，“有一所大疗养院，是资本家”，“台湾同乡会募捐款有贪污嫌疑”等等
- 《半生记》笔录者杨克焯在 281 页还得意地注析：“台湾文化协会于 1927 年分裂，有‘玉碎派’的左派和‘瓦全派’的右派。左派（左翼）：主张阶级斗争。
- 在 1930 年 10 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开会，（李应章）因谢南光之邀请，前往出席。在会上主张‘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极力揭露统治阶级的假面具，言论激烈，未被部分与会者接受，
- 台湾民族”论或“半民族”论。世上哪有“半民族”之说，真是荒诞透顶！不值得一驳。至于“台湾民族”的提法，已在 1948 年 6 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召开台湾主要干部会议上刘晓作了总结：“‘台湾民族’的提法是错误的，决定予以取消。过去提‘台湾民族’是抗日的需要，现在台湾已光复，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
- 陈炳基所述的日据时期河北省的伪县长杨克培，汉奸伪县长郭良，日据时期“新民会”、汪伪时的“奉公会”会长林建文；林政汉是日本特务，后又是国民党特务，

上海的张添梅是日本“黑龙会”成员，是历史反革命，林世昌也是日本特务，柯政和、谢京生均为日本特务机构成员；更有汪伪政府教育部长肖正谊，国民党军统特务黄炬等；解放初期有名的“炮打天安门”案件策划者之一陈信德不是汉奸、台奸，是什么？

- 谢雪红在 1950 年时称，曾经截收到军统的遇报，将暗杀中共领导者三十人，名单上有陈毅与谢雪红。他说，谢雪红诬指他是「暗杀团团长」，并招北京公安局人员来逮捕。后来，组织的人事科长进行了解，认为并没有暗杀团的存在。
- 中共在一九七九年以后，决定要与国民党谈判，这对于谢雪红而言，已是一种叛徒的行为。
- 讲到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一战线，翁泽生、李伟光都自始至终，团结一切可靠的同盟军，共同对敌。那是为全台湾人民的利益而着想的，截然不同于谢雪红为了其个人野心幻想当“领袖”、冲着其拢络对象的弱点
- 李应章他为了开启民智，先在二林成立“农村问题研究会”，继在二林举办“农村讲座”，聘请石锡勋、吴清波、吴石麟、林笃勋到二林演讲。石锡勋讲《农村之进化史》。吴清波讲《农村与产业组合》。吴石麟讲《农民之自觉》。林笃勋讲《农民与卫生》。李应章自己讲《农村之将来》。晚上又继续举办文化讲演。讲者有洪明辉、詹奕候、林伯廷、陈宗道等人，至晚间 10 时才闭会。1925 年 4 月 19 日，李应章又邀请林献堂、杨肇嘉、叶荣钟、陈虚谷、庄遂性等人到二林举行文化讲演。林献堂讲《初会感辞》。杨肇嘉讲《教育之必要》。叶荣钟讲《农村振兴与产业组合》。陈虚谷讲《人的生活》。庄遂性讲《自由之道》。
- 成立于 1921 年的文化协会至 1926 年已有会员数千人于是文化协会内部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导致派别分化，矛盾逐渐集中在文化协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两个问题上，形成三个势力，即以蔡培火、林献堂为代表的受日本国内民主运动的影响，认为文协的任务就是文化启蒙、文化运动，反对插手工农运动，他们

是文协中的改良主义派；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受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影响，也认为文协应以文化运动为主，对工农运动持观望态度，他们是文协中的中间势力；以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的受到苏俄革命和祖国大陆革命运动的影响，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大众文化，积极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他们是文协中的左派力量。

- 1927年1月将召开文协理事会、全会，修改章程、改选理事会，连、王感到岛内力量较弱，写信向翁泽生求援，要求翁联络在沪的台籍学子回台助阵，参加即将召开的文协改组活动。翁泽生汇报了党组织（1925年7月入党），接受指示，“争取改选的领导权，使文协左翼化。”于是组织“台湾无产青年会”号召大家分头发展会员，积极参加文协临时理事会和总会，支持连温卿、王敏川，团结和争取蒋渭水一派（即中间派）以期达到表决中的优势，对于改选中获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总而言之，翁泽生、李伟光与谢雪红的斗争，绝不是宗派斗争，而是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翁、李一切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奋不顾身，积极进取，展开对敌斗争而谢是“当然领袖”自居、极端个人野心的政治路线，右倾守势；组织上的关门主义、排斥异己，招降纳叛、拉帮结派，以致台湾共产主义运动未闯出一步，未能形成打击敌人的力量，就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错误在于谢雪红，责任完全在于她。

翁泽生/李伟光（应章）与谢雪红的矛盾

——试析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李克世（锡恺）

孔子有句名言——批判人生的哲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见人有私心者，为自己着想，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在当今社会上，在我们身边，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谋取暴利、制造假货甚至毒货、造假币，诈骗、行贿、收贿，贪赃枉法、以

权谋私，买官卖官，屡见不鲜；转移赃款逃到国外，只图自己痛快、不问别人安全、飏车，交通事故频发，天天有人被撞死；诲人师表者教学留一手、好捞课外补习费，清水衙门，水不清，举不胜举。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也有不平凡人物、英雄辈出。大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还有中国民族革命先驱孙中山，他们就超脱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一心一意为劳苦大众，为民族争独立，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成了无产阶级求自身解放的革命导师、领袖，民族民主独立的先驱。而我们身边也有熟悉的平凡人物，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如翁泽生、李应章（伟光）。他们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置自身之安危于度外，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不论是大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孙中山等领袖人物，或是革命群众中的杰出领导人翁泽生、李应章，一个共同特点，革命不为个人而是信奉主义真，为革命前赴后继；他们的出身家境都不差，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列宁的父亲是中央政府教育巡视官，毛泽东父亲为私塾老师、富裕农家；而翁泽生父亲久年在台北市茶叶批发行任茶师（相当于现代高级工程师）为高级职员；李应章出身于中医家庭，按解放后“土改”时的阶级划分应为“自由职业者”，有人在文章里说出身于资产阶级，不缺吃、不缺穿不假，但大不了只能说是“中产阶级”。然而，其祖父李森浮是“正港”（台语）的雇工，穷则思变 16 岁从福建冒险飘海到台湾二林谋生，到药店当徒工，只不过遇到好老板，收为召门女婿，终于接替了店主打造了几代李氏家族。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中有句名言：“穷则思变”赞颂农民运动，几千年的农民运动，就是因劳苦大众被残酷剥削，过着贫穷生活，他们思变，理所当然。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学说如此，也是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印证了“穷则思变”。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没有一个是过着贫穷的家庭生活，为自己“思变”，而是想着穷苦大众之所想，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民主独立的“三民主义”。

李应章为的是看到种蔗农民受到日本殖民当局重重剥削，过着贫穷生活，为他们“思变”，组织夜校，分析日本殖民主义的苛刻剥削，劳苦大众只有组织起蔗农组合，团结起来要回自身的民主权力、生活权益，丝毫不是为了自己，倒是自己贴了不少钱为农民闹民主、要权益，是替农民“思变”。台湾黄煌雄先生说的好：“当时一个医生若要求享受，一定可以有高楼大厦，山珍海味。李应章当年也落得要出亡，两人（与蒋渭水）的境遇相同。这就是他们这一代的精神；为了这一块土地，自己的事业都可以不顾。这就是他们留下来的风范。”是不折不扣地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思变”，超脱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精神世界。因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奉无产阶级革命，舍身为劳苦大众，“自己的事业都可以不顾。”

事物还是一分为二的，在我们熟悉的风流人物中，谢雪红也是“穷则思变”的。她卖身到富商家抵葬父债务，自称出身于“茶婆杆仔”（台语：女佣），跃踞为天然的“无产阶级。”由于不是为了主义真，自觉的改造、革命，在翁泽生、蔡孝乾、苏新、王万得、李应章等革命知识分子包围之下，自卑有余，只得依仗于共产国际的委派，“筹组台湾共产党”之桂冠，拉帮结派，以竭力保住其“当然领袖”地位。近日有大陆籍记者前来采访，一语破的：倘若说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出现谢雪红，台湾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或许全然改观，不是现在这个样。我说：欢迎更多的大陆籍文史学者参与台湾近代史、尤其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因为有的台湾籍的学者往往带有其倾向性，人为地枉加解释，渗加政治倾向，篡改历史，甚至可笑地以“唯成份论”来美化谢雪红，非得把她装扮成台湾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不可；即使有正直者写台湾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史，也被横加指责，百般束缚、扼杀。

近年来，围绕台湾近代史上的“女英雄”“茶婆杆仔”（女佣）出身的谢雪红之功过，海峡两岸史学界、大陆的群众团体有所议论、撰著，煞有介事。台湾现代史学者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以下简称《谢评》）将翁泽生、蔡孝乾/李伟光

与谢雪红之间的矛盾分析为宗派斗争，在扉页照片上乱点鸳鸯谱，激怒了被点为“李伟光派”的人，急于撰文洗刷自己不是李伟光派。但不知是为了说明不存在李伟光派（其“大作”未阐明，但依其解放前、解放后初期，与李伟光的接触、受李伟光的启重、照顾，按点米花著者的标准划为“李派”，并不冤枉），还是唯恐与“李伟光派”沾亲念故，是不识时务，与己不利？更为了“矫枉过正”，甚至目无党中央，狂妄至极，投稿香港《凤凰》周刊杂志上说：1986年9月15日，谢雪红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在移放仪式上，中共中央统战部武廉元副部长代表中央的讲话作出对谢雪红的平反，“不是彻底的平反，大陆首次出版（自己参与撰写的）关于她的电影文学剧本，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才是真正的平反。”（引自2007年3月15日“谢雪红非‘台独鼻祖’”一文——以下简称《鼻祖》）岂有党中央“新的”平反通过电影剧本而不以正式行文，且发议论至香港，却不在境内《人民日报》上发表？躲躲闪闪为哪般？持此论者既不否定“宗派斗争”论，又不正视翁泽生/李伟光与谢雪红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倘若承认是路线斗争，肯定的谢是错误路线代表者无疑，达不到与“宗派斗争”论者辩明是非，更使“宗派斗争”论者理直气壮，只好一味歌颂“主人公”（是实名的，而不是艺术塑造的），弄得与史实处处矛盾，未及其原意——塑造一个完美的谢雪红，也不如“宗派斗争”论者，更贴近于史实的谢雪红（至少基本符合史实），没有过多篡改，只是最大的缺陷在于回避了与翁泽生“对簿公堂”的叛徒行为；但歌颂论者为什么在此事的笔墨更不及“宗派斗争”论者，又退了几大步啊？难道是没有“对簿公堂”？否！当事者苏新、王万得均有笔字为据，更有当时的台湾《警察沿革志》为证。回避不得，螃蟹钻穴，屁股还露在外面呢！你想掩盖的，人们更觉得那才是要害，非究其根底不可。

何池著《翁泽生传》（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翁传』）318页对于翁泽生于1933年3月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引渡至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进入台北监狱，日本殖民统治者安排他与谢雪红在法庭上无奈地“对簿公堂”，谢在监狱里、法庭上的表现，有如下详述：

截至翁泽生进入台北监狱之时，台湾日本当局对“台共事件”捕获人员的预审还在进行之中。这一“预审”一直延续至1934年7月20日才结束。预审之所以延迟这么久，“是由于每位被捕者的说词（口供）不一致，而为了能达到人证、物证都能相互印证之目的，就必须对每位‘犯人’进行‘刑求’（即用严刑取得口供）”

敌人还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千方百计逼使台共成员“转向”、“自首”。

王万得说：“当时在狱中，如果有悔过的表现，写了表示悔过的文章，日本人就会把他从单人牢房放到工场去，单人牢房很苦，政治犯都是坐在单人牢。工场比较好些。谢雪红是第一个放到工场去劳动的人。我写了学习佛教的体会后，也放出单人牢到工场去了。判刑的三、四十人多数都先后到工场去劳动。”

敌人抓到了久已通缉在案的翁泽生，并已从谢雪红口供中知道了翁泽生不仅是台共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身负重任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共产党联络指导台共的重要人物。尽管此时敌人手中已掌握几乎所有有关台共机密的文件，但他们仍想从翁泽生口中进一步了解台湾党组织的新情况，寻找新的“漏网人物”。

翁泽生用沉默来回答敌人的审问。

“公判”（除翁以外的人）过后，一出翁泽生与谢雪红“对簿公堂”的“剧目”在台北地方法庭开场了。

这是谢雪红在上海成立台共后与翁泽生的第一次见面。翁泽生压根儿没想到，他与她会是在这种情景中见面。他已知道她也转了“向”，而且是第一个“转向”，他仍友善地向她招了招手。但他看到了她眼中的愤恨。

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谢雪红竟然在法庭上，在敌人面前把台共内部路线斗争的情况全部抖落出来，她大骂翁泽生，“揭发”翁在台共中的所谓“分裂”活动，把台

共遭到破坏的责任推到了翁的身上，甚至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对翁泽生进行了逼供。

翁泽生怎么也想不到，在敌人法庭上居然有来自内部同志的攻击。翁泽生听了她在敌人面前滔滔不绝的“演说”，这些攻击不仅矛头直指翁泽生，还丑化了台湾党组织，也涉及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翁泽生的心在滴血：谢雪红啊！你对我翁泽生有什么意见怎么骂怎么批评都可以，千不该万不该把党内的矛盾、争论甚至党内的机密都在敌人的面前全盘托出，甚至还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形象问题。他觉得，谢雪红已经从偏执走上极端，发展到了不惜违背党内组织纪律和出卖同志出卖党内机密的地步。

谢氏阿女的这一发言，全文被法庭记录下来，收载于《台湾警察沿革志》第682页。也转载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之中。全文共6000多字。

面对敌人法庭上谢的突然发难和抖落出党内机密，翁在气愤之余很快冷静下来，本来对自己的诬告攻击他已多次领教，并已经党中央得以洗刷清白，今天她这些旧话重提，翁泽生实在感到并无再次反驳之必要，考虑到党内这些矛盾与争端已由谢公开化，再无秘密可言，而且面对谢的攻击，也确有再次作一说明之必要，而且对她发言中关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之事只要不涉及新的机密，也应予以简单澄清。最后还应乘势而上截断敌人所要打听的台湾党组织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后来的联系等机密事宜。

翁泽生经过快速思考已胸有成竹地作了一个大约2分钟的简短发言，这一仅有五六百字的发言也被全文记录在上述同样的档案史册之中。《警察沿革志》编

者对这篇短文加了个标题：“翁泽生供述有关与谢氏阿女的关系。”发言的主旨正是围绕上述三个问题作简要的澄清与巧妙的回旋。

绝大多数的台共成员对这次的“对簿公堂”早有共同的想法。苏新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说：“翁泽生在敌人面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坚守党的秘密，拒绝承认与台共的一切关系。最后迫得敌人不得不把谢雪红拉出来作证，谢在敌人面前，揭发了翁泽生的一切活动，并诬蔑翁阴谋煽动一部分党员起来反对她等等。使得翁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也因此加重了敌人对翁的迫害。翁就是这样死去的。”

（以上摘录自《翁传》318~330页）

看了《翁传》中的“对簿公堂”一章，一位大陆籍的厦门大学老校友说：谢雪红这是叛党行为；而一位台籍的淡水中学时代的老同学看了我写的回忆录《一个台湾人》第25章（包含有“对簿公堂”内容的“台湾近代革命史上两人擦肩而过——翁泽生与李应章/谢雪红”一文后，来信抒发读后感说：以往不被人所了解的真相清楚了，尤其对谢雪红的问题，感到有必要再作评价了。

岂有这般的“宗派斗争”？要说是“宗派斗争”，总不能说是翁泽生与日本殖民统治警方结成“宗派”斗谢雪红，更无从说起“翁、蔡派”与谢雪红斗，因为现场只有翁泽生一人，不可称其为派，况且事先毫无准备与同志洽商对策斗嘴；然而，电影剧本又如何草率几句走过场呢？不妨摘录于下：

法官：“谢雪红，你在审讯中多次提到翁泽生，说他支持改革同盟反对你。你再说说吧。”

雪红：“台共已无机密可言了。翁泽生与我同是台共中央后补委员。日共在四·一六事件后，与我们失去联系，于是我们台共就派人找翁泽生，通过他与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

法官：“翁泽生，这段话可以做为证据吗？”

泽生：“可以。”

法官：“谢雪红，再说。”

雪红：“翁泽生不了解台湾情况，说台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鼓励王万得在党内成立改革同盟，分裂台共。我曾要求中共中央查清事实。”

泽生：“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部长问过我，我断然否定与改革同盟有任何关系。后来，我接到‘解散改革同盟’的报告。”（121页）

这般岂能填满谢氏阿女滔滔不绝的“演说”被《台湾警察沿革志》第 682 页收录、又转载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的全文共 6000 多字内容呢？

至于谢雪红 1970 年口述、杨克煌笔录、由其女杨翠华在台湾 1997 年出版一书《我的半生记》（以下简称“半生记”）在“对簿公堂”之前就夭折，有意不续载，借以蒙混过关。倒是别有用心地在书中第 275 页，行其恶意中伤之惯技道：

“1921 年，李应章和林糊一样参加了文化协会的活动，是当地的负责人；1927 年左右翼分裂时，李投靠右翼，而林却站在左翼方面。约在 1926 年李应章领导过二林地方的蔗农反对制糖会社的争议事件，曾被日帝抓去坐牢。”

真是信口雌黄，不知其左右翼分析的标准是以何为准？岂有 1925 年 1 月组织起台湾第一个“蔗农组合”（而不是谢故意推迟的 1926 年），为贫苦蔗农奔波、散财为农民运动的“文协”理事、二林地区干事李应章是投靠“右翼”？倒有史实记载：1925 年“二林蔗农组合”成立不久，在台中的一次“文协”总会上，李应章提议与詹奕候、刘崧甫联名向大会上提出“农村实际斗争案”，声援种蔗农民运动。有这样的“文协”右翼吗？况且“文协”分裂为左右翼时，李应章已被日本统治者抓去蹲冤狱，何从投靠右翼？倒是左翼的简吉、赵港为李奔波找日共律师辩护，而谢在干啥？本来，看过《谢评》，著者将李应章写为“文协右派”原以为是出版社校对有误，不相信是著者笔误，因著者对李伟光扑墨尚称客观事实。如今扑朔迷离，“原凶”是谢雪红“台湾妈妈”，可以任意侮辱人，篡改历史。或许依其立场、好恶、拉不进为自己结成帮派的就打入“右翼”。不过莫怪，她自己对待“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是站在右翼的立场，与之相反的右翼，正好是真正的左翼，真是反其道而行之也。

原台共中央委员苏新在其人生最后一段时间，可以说拼出其毕生精力留下笔墨《书信一笺致鲍利黎》说：

“<王添灯>这一篇，是我的《台湾外史》中的一篇。我打算写二、三十个人这样的东西。有长有短的，连温卿、王敏川……都放进去。《外史》里面，也可能有些坏人，例如谢雪红，可能要写几万字。（引自苏新著《未归的台共斗魂》323 页。以下简称《斗魂》）

苏新到了晚年，仍如此耿耿于怀，可见受谢雪红之灾难到何等地步！对谢透澈地分辨为坏人，是何等贴切又有据！苏新是谢雪红介绍在香港加入中共的，可谓关系非凡，却又为何矛盾到如此不可调和的地步？

挥动棍棒诬说李应章是“文协”“右翼”的谢雪红与“文协”的左翼代表人物连温卿、王敏川又如何呢？岂不因为他们反对谢在对敌斗争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取守

势”，不同意其守势也就守不住，于是谢飞扬跋扈、家长式作风专断独行，乱加指责。按当时台共的上级指导机构中共中央的意图要使“台湾文协”左倾化，乱打别人“右翼”的谢雪红执行了吗？

翁泽生/李伟光（应章）与谢雪红的矛盾、斗争，不是宗派斗争，而是两条路线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则不能各打五十大板，而错误在于谢。《谢评》分析翁泽生、蔡孝乾/李伟光与谢雪红之间的矛盾、斗争，只是从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关系来解释为闹小宗派、派系斗争。

他们之间，是有斗争，不错。

大陆的老干部、首长，也都说台湾人爱闹宗派，堆不到一起，所以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夭折，似乎闹小宗派是台湾人的“专利”。这完全不对，也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有人搞宗派活动，是事实。那是谢雪红为其极端个人英雄主义、错误的领袖欲，而拉帮结派，借以企图满足个人野心，而翁泽生、李伟光并没有拉派结帮。

翁、李与谢的斗争是围绕着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不是宗派斗争。正如杜长庚（上海暨南大学“台湾公费生”）曾问李伟光：“你们有没有调和的余地？”李答：“不可能。”（引自杜在2008年4月，致笔者的信函）

中共的历史证明，路线斗争中站在错误路线上的总是搞宗派活动、机会主义，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确立的，他并没有搞宗派，而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

那么，谢，当然无法与此相比拟，小巫见大巫，她还没有任何的革命实践，仅依仗着共产国际东方局（经东方大学学习）嘱咐她回到上海创建台湾共产党（经日共指导，后转为中共指导）就以当然“领袖”来到上海，目空一切，只要她看不顺

眼的，唯恐有人比她威信高一点，可能成为自己占据领导地位的竞争对手，就发起突然袭击，恶意攻击、借以确立其“当然领袖”地位。

这种极端个人英雄主义“当然领袖”欲之骨子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一切为了革命，是她的错误政治路线，悲剧也就出在这里。她自以为“茶婆杆仔”就是终身的政治资本，人们都得把自己供为“领袖”才行，她看不顺眼的，可能成为她的竞争对手，就都设法拉帮结派打击之。

其历史上出手相似者有：

1928年4月13日，台湾共产党成立筹备大会上对翁的突然攻击：说翁是什么“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者”啦（引自《翁传》160页11行）。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为迎接台湾的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台盟”内的共产党员整风时，谢雪红唯恐李伟光在上海解放前地下党工作上的成绩可能成为她“当然领袖”地位的确立构成威胁，趁人们对她在日据时期监狱中的丑恶历史尚不清楚时，袭用1928年台共成立大会以攻为守，恶毒攻击翁泽生的老手法，抓不到类似“无政府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恶意攻击李“讨小老婆”，“有一所大疗养院，是资本家”，“台湾同乡会募捐款有贪污嫌疑”等等，还怂恿杨克煌向外界捅出李伟光的共产党员身份，借以在上海台胞中煽起“群众组织，不受共产党员控制”的歪风，抗拒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仍保留“旅沪台湾同乡会”组织，仍由李伟光担任理事长，保证选举时得以通过。详情请参阅（本书 页）李韶东『先父李乔松与李伟光』一文。

就是这样，谢雪红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仍不收敛，竟然在其《半生记》，行其恶毒攻击之能事，锋芒对其“当然领袖”“极端个人野心”之障碍人物——翁泽生、李伟光、苏新、王万得、蔡孝乾等，说：

“回顾这些往事，这次（1927年底）碰巧遇到翁（泽生），对台共建党起了顺利的作用，但也由此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半生记》228页）

“这次我回上海，第一个认识翁泽生，接着又认识张茂良，谢玉鹃，也见过林松水一面；透过翁泽生的介绍又认识一批曾加入中共的台湾青年——当时在台的有：林大汉（即林日高，台北板桥人）、洪朝宗（台北市人）、庄春火（基隆人），蔡孝乾（即后来的“蔡乾”，彰化人，上大派）、李晓芳（嘉义人，上大派）、庄泗川（嘉义人，上大派）等；在厦门的有潘钦信（台北人）等；另外，翁还介绍王万得（台北人）给我，王最近才由武汉来到上海。

“翁介绍的这些人，除林大汉、庄春火、李晓芳、庄泗川外都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包括翁本人；而且，他们因过去背景的关系，形成一个小团体，互相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同上 230 页）

仅受共产国际委派筹建台湾共产党之命则自奉为“当然领袖”又不检点的谢雪红，且看着翁泽生、蔡孝乾、王万得等早已入了中共，唯恐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又与其不投合就乱棍打人是“上大派”耸人听闻地攻击其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甚至在1928年4月13日台共成立筹备会上责问翁，以致对于如此理论性重大问题，一时半句不能澄清的情况下，翁得选票少，而谢如此对待同志，也引起与会者对谢有看法，同样得票少，两人都只当选为台共中央后补委员。

对于扯不上“无政府主义”问题的潘钦信，即侮蔑说：

“潘钦信来上海后，就和翁他们在一起，关系特别亲密；翁、潘、谢玉鹃又共睡一张床，可能这时潘和谢已发生男女关系。此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谈性生活问题，大概是受苏联柯罗索泰著的《红恋》影响，信奉所谓‘杯水主义’。在谈话中时常讲‘性的解放’！”（同上 244 页）

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谢雪红看到他们乱伦啦？在经费无着落的情况下，即使是三人真睡在一张床上，患得着你在生命最后时刻在个人的传记上抹上这一笔吗？而谢雪红自己乱伦行为还少吗？知情人在他们的个人传记里写过你吗？1952年台盟中央在上海办公时，李乔松为秘书长，有一天下大雨，谢雪红脱口而出叫李：

“乔松，下大雨就别回家啦，在这里陪我睡觉。”（引自杜长庚致笔者2009年12月17日信函）这又是什么主义？

这样的谢雪红，有什么资格任意给人涂炭抹黑？又据台盟中央秘书长徐萌山对杜长庚说：谢雪红与（在北京）司机李启良关系暧昧，李还不知哪里弄来的呢质制服（五十年代初期，只有师、地级以上干部才有配给）。如此，她有什么资格议论别人生活作风上的是非？就凭她的“台湾妈妈”、“当然领袖”就可以肆意中伤、污蔑别人？正因如此，她就是不够格当什么“台湾省主席”，又如何令人心服口服？更不可能团结得了正直的人去共同为台湾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她能够拢络到的人，自然而然就是因为需要她作“保护伞”的人，岂不再清楚不过的啦。试问哪一个省的最高领导有像谢雪红这样品性的？如此，谢雪红哪一点够得上当什么“台湾省主席”？还不脸红，真说得出口！可悲的是，迄今仍有人亟力想为她树碑立传，只因为她是“台盟第一任主席，总不能这个样。”不知要怎样才如意？故人已不在，是多高就多高，再拔也拔不高的，莫非弄巧成拙。

1947年6月，“二·二八事件”后，谢雪红从台湾逃出，经厦门落脚到上海，隐蔽入李伟光的“伟光医院疗养院”，时适暑假，笔者（念高二、升高三）探亲，也住在“疗养院”，一次与父亲同赴“伟光医院门诊部”，三楼主住有从台湾逃出来避难的李乔松，与父亲用台湾话交谈，并不回避我在场说：

“她住在疗养院有没有纠缠你？”

“没有，当年在台中打官司时就碰了我一鼻子灰。”

“她为什么那么厉害，一刻也不能离开男人。难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们没点名，但我一听就明白，讲的是谢雪红。当年，谢雪红与杨克煌是一起逃出台湾的，到了上海，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指示分居两家，且不许谢外出一、会外客。

以上，前一桩事是杜长庚来信中提及，事后杜还问李乔松：“那，你怎么不睡她一下？”答说：“她是台盟主席，我怎么敢。”笔者曾与李韶东通电话时问及这两桩事，答：确有此事。可见，该洁身的不是别人，而是谢雪红自己，有什么资格诽谤别人！

二说翁、蔡等人的“曾信奉无政府主义”问题，《翁传》里有记载：

“‘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原则问题，于是，翁泽生进行了必要的反驳和解释，讲明他在集美中学时就反对无政府主义，跟无政府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林日高等人也据理力争，为翁洗刷‘莫须有’的‘罪名’，多数人也不相信翁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思想上的东西一时也难以查证，故有‘候补中委’的选举结果。”（《翁传》160页）

就是退一万步说翁泽生以外其他人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也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情况下，否定该殖民统治政权、权威之前提下的信仰，至少是否定日本殖民统治，是对反动政权的反动，总比谢雪红在殖民统治者的法庭，投其所求与翁泽生“对簿公堂”谩骂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得以托病提前五年释放，出狱后很快就康复，主动改名为彻头彻尾的日本姓名——山根美子开“KAFE 大华”为日本兵招妓效劳，不知他们的革命性要比谢好了几倍！

谢雪红在《半生记》第三篇第三章“台共的农民运动”有这么一段叙述：

“台湾农民运动始于 1925 年前后，在凤山、大肚等地方成立了地方性的农民组合。1926 年成立了全岛统一的‘台湾农民组合’简称‘农组’；到了 1928 年下半年，所属的地方支部已有四十多个。该组合的创始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简吉、赵港等人，本部设在台中市（参阅第 274 页插图）。1927 年至 1928 年，正是该组合最活跃的时期。”（《半生记》第 273 页）

可见，谢雪红的记忆是非常清楚的，连“农组本部”的地理位置都能画得出来，就是台湾的农民运动开始于 1925 年 1 月 1 日在彰化县二林，李应章组织“二林蔗农组合”，带动了全台湾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请参阅本书《代序》黄煌雄撰述），这一历史事实有意“埋没”、篡改；而随后凤山、大肚等地方成立了农组，“二林蔗农事件”发生，简吉的凤山农组积极声援，找到在日本东京的苏新，聘请日共律师布施辰治、麻生久赶来台湾，为李应章等“二林蔗农事件”的农运主要领导人作义务辩护，而自命“我也觉得自己在台（湾）是举着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旗手”（引自《半生记》273 页）谢雪红，照理应该是冲在前面保护农运领导干部的，又为他们尽了什么义务？其实，当时谢雪红还没有到莫斯科领得共产国际的任命，这里仅不过因为她侃侃于怀她那个“旗手”，而顺其桂冠逆时责问罢了。

谢雪红又在其《半生记》275 页有以下拙劣表演：

农民组合因各地争议的发展，急切需要解决经费困难的问题，于是，决定争取广大民众的同情来支援争议和解决财政困难。简吉要我负担一大部分这个任务。有一天，李乔松（农组大屯郡支部负责人之一）带我到雾峰见林幼春（大地主，思想较进步），中午林请我们在他家吃饭。我向他说明了农组的一些近况，说服他对农组及农民争议给予同情；通过我的工作，农组干部随后再去向他募捐。当

天，还顺道去见林枫（雾峰开明地主，李乔松后来和他一个守寡的嫂子发生恋情）等，李乔松又带我上他家，下午就回台中。

另一回，李乔松和我去员林找林糊先生（开业医生，文化协会员林的负责人，较进步），我同他谈了较长的时间。还去找一位姓高的医生。然后，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二林找李应章医生。1921年，李应章和林糊一样参加了文化协会的活动，是当地的负责人；1927年左右翼分裂时，李投靠右翼，而林却站在左翼方面。约在1926年李应章领导过二林地方的蔗农反对制糖会社的争议事件，曾被日帝抓去坐牢。

当晚，我住在李应章家，他去通知了几位当地人士来同我谈话，隔日才回台中。（李应章，1929年到大陆后改名为李伟光）。

如此恶毒诬蔑，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李乔松即使是与“一个守寡的（林枫）嫂子发生恋情”，总比你谢雪红把杨克煌从已正式结婚的妻子手里夺人所爱，不知高尚多少？

李应章不仅“参加了文化协会的活动，是当地的负责人”，按黄煌雄的本书『代序』中撰述：“照蒋（渭水）先生文章所写，文化协会是在李应章等一群人希望他带动而成立的。”“1923年9月台湾文化协会彰化支部开会，与詹奕候共同向大会提出‘台湾农村问题实际斗争案’，开始以知识份子的革命宣传理论与农民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然此案被否决。文化协会内部对于革命内容与方法开始分歧。”（引自《先驱者》185页“年谱”）。有这样的文化协会“右翼”吗？又有谢雪红自述的“约在1926年李应章领导过二林地方的蔗农反对制糖会社的争议事件，曾被日帝抓去坐牢”的文化协会“右翼”？那么“左翼”倒是投靠日帝的一心想当议员者啦！简直是信口雌黄，行侮蔑之能事，还为了淹没李应章是全台湾首先组织农民组合——“二林蔗农组合”的历史，将1925年10月22日的二林蔗农“争议事件”，记忆别事清晰

的谢雪红却胡编为 1926 年……。真是临进棺材了，还不忘诬蔑这，谩骂那，歪曲历史，颠倒黑白！

说李应章是文化协会的“右翼”，我看所有的台湾史学家都不会同意，只有陈芳明著《谢评》中，或许受谢雪红的这一谬论影响导致的笔误。

《半生记》笔录者杨克煌在 281 页还得意地注析：“台湾文化协会于 1927 年分裂，有‘玉碎派’的左派和‘瓦全派’的右派。左派（左翼）：主张阶级斗争。”

这里，暂且不究明“玉碎”、“瓦全”的剖析是不是李应章首先提出的，但“在 1930 年 10 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开会，（李应章）因谢南光之邀请，前往出席。在会上主张‘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极力揭露统治阶级的假面具，言论激烈，未被部分与会者接受，竟告不欢而散。后遂分裂，终于解散。”（引自《先驱者》‘年谱’188 页）是有历史记载的。如此，李应章不是“玉碎派”（左派）而是“瓦全派”（右派）？造谣中伤，也得技术高明一点，别把读者（群众）当阿斗，即使谢雪红可以胡弄人一时，也不可能将史实改写一世，除非有人为了树自己，扯其虎皮当大旗，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告终。

三说谢雪红攻击：李伟光讨小老婆，是蛊惑民众，转移视线的老伎俩而已。她明知李伟光当时是在日本殖民主义者最后再次将搜捕的威胁下，不得已只身逃离台湾、糟糠妻子又身缠五个孩子，无法同行，而在厦门只呆了三年，转移到上海长期男人单身只会引起反动当局注意，与台湾的通信联系又异常紧张，全家无法团聚，经地下党的负责人吴成方作媒劝导之下，1940 年正式迎娶第二任夫人倪振寰，何谓“小老婆”？况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通信正常化了，李随即送信说明缘由，取得结发妻子的谅解，相好于事。

上海解放，随即李伟光以五名台湾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首届政协会议，念及台湾仍在蒋政权统治之下，结发妻子之安全或受威胁，李伟光着笔者设法通知其随胞弟李锡光一起经香港来上海团聚，足以说明李园好家庭关系之实意。至到婚姻法（草案）公布，1952年夏季，笔者从福建出差南京，途经上海住家一天，李伟光特地约笔者在诊察室单独征求意见说：

“这次，你母亲没有跟锡光一起出来，错过了好机会。但是，你妈（指振寰二代夫人）还是说早晚台湾会解放，我和她还是办一下离婚手续。她只有一个奢望，究竟已有几年生活在一起，与你们大家都有感情了，只要让她每礼拜天回来聚餐，就心满意足，一个人单独住去，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他知道，当时在大陆的我们兄弟四人中只有我已入了党，只要我这一关通过了，其他几个兄弟也就不成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全大陆解放了，是迟早将要面对的问题，我事前也都有所考虑，应该如何对待。但万万没料到一个老子，找自己的儿子，征求其意见，似乎求救似的，因为他们多年的共同生活，是有感情的。

顿时，我的心酸了，更高兴父亲如此器重我，究竟念到糟糠夫妻之情，同时也感到父亲这时已受谢雪红的恶意攻击，被威逼到何等地步，不得不忍痛割爱，做违心的决策。这使我内心顿时绞痛起来，刷然泪盈眼帘毫不犹豫地，半颤半抖地最后才拼出几句话：

“爸，这就不必要啦。母亲早就认同您与妈的结合，是历史的原因，要算账应算到日本殖民统治者身上，我们几个兄弟也都对您理解的。再说，您也不能这样对待妈妈。您的结合是革命的需要，妈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过您革命活动的。我们总不能，因为现在没这必要了，就让她一人孤伶伶度日吧。”说完，如释重负。我发现从来顽强的父亲，双眼凝出泪珠，轻轻点头，父子俩再无需任何语言了。

此事，以往未曾在家人中谈论过，也没人知道，仅在此撰写他一生纪事，再不能不说他一生中也算是一桩大事吧。可见，当年已遭谢雪红攻击到何等地步，世上还有老子向儿子征求自己婚姻处理意见，求得同情之理？这岂能成为李伟光“讨小老婆”？

四说谢雪红攻击：李伟光是资本家，有一大套房产——伟光医院疗养院。不假，李在上海泰安路 84 号（前劳利育路——参阅《先驱者》360 页插图，）有一大套房产。那是他营医所得，长年支援新四军、八路军经费、药械后结余下来，省吃俭用才集攒下来，更为了避开反动当局追究其赚那么多钱送到哪里去啦？花了二十根金条购买下来，一做住家二做掩护地下党重要人物之便购置的，先后掩护过前上海市第一任副市长曹荻秋以及王锡珍（解放后“台委会”组织科长），知名作家田汉、前北京卫戍司令温玉成、新四军师、地级高级干部数人，谢雪红自己不也在 1947 年夏住过个把月吗？还有中共中央与“台湾工委”的联络站——台北“永安行”不是李出的钱，是谢弄来的资金？就不讲这些对革命的贡献，按当时已开始土改并公布的阶级划分，李伟光也不该属于“资本家”，而是“自由职业者”（医生）。造谣过市到如此地步，居心叵测，昭然若揭。

五说谢雪红眼看台湾解放在即，为包揽其“台共领袖”、“台湾省主席”“台湾妈妈”美梦于一身，谋求万无一失，甚至连一个群众性团体——旅沪台湾同乡会的领导权都妄图从李伟光手里剥夺，转到其亲信手里，指使杨克煌进行抗拒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大肆进行宗派活动，终究以失败而告终，杨克煌由此受到了党纪处分。有关详情，当时参加华东局的“台盟内共产党员整风”学习、与李伟光同一小组的李韶东有详细叙述，请参阅『先父李乔松与李伟光』一文（本书 页）。

至于谢雪红胡说旅沪台湾同乡会的募捐款使用上有贪污问题，兴师动众清查了帐目，结果是李伟光反倒为同乡会垫支了私房钱等等，谢雪红为了实现其个人野心，真是绞尽了脑汁，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1957

年以为时机已到，铤而走险，发表严重错误言论，绝不是偶然的。其典型的错误言论有：“台湾人对共产党没有感情，对台盟有感情，”“要民主党派轮流执政。”这与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乃器的“行政设计院”等严重错误言论，是“永不得翻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2006 年语）一脉相承的。“对人的平反，不等于言论是对的。”（同上教授语）

2007 年 5 月 24 日 27 日，笔者两次走访北京的陈炳基（原台盟中央办公室主任、副主席）征求其对文稿的意见，有如下所述，整理于下：

谢雪红是个人野心家、个人英雄主义导致其不正常的领袖欲，推行错误的组织路线，拉帮结派。千方百计想控制上海的台湾同乡会，就依靠坏人打击李伟光，要从李手中夺去同乡会的领导权，执意抗拒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解放初期，鉴于社会情况复杂，决定保留台湾同乡会的决议于不顾，先是中伤李伟光领导下的同乡会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应予以废除；等到群众倾向于保留同乡会了，华东局也决定、并内定设法在选举时理事长仍保留为李伟光时，她却阳奉阴违，拢络依靠一些人企图选掉李。这个阴谋，杨克焯在 1951 年整风时都承认交代了。而谢雪红心目中的理事长是郭子春，其妻是日本人，上海铅笔厂的老板资本家。所以，1954 年李伟光逝世后，一直当副手做了不少工作的谢雪堂继任同乡会理事长。谢雪红又拉人反对谢雪堂，弄得大家都反对谢雪红，因为她坏。郭子春当副理事长是可以的，但她为的是一心想打掉李。包括组织抗美援朝委员会时，也不惜依靠一些坏人打压李伟光。

在组织路线上，谢雪红依靠拉拢的都是一些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甚至是坏人。在北京，杨克培只因为是旧台共的成员，找来就安排工作。其实，他是日伪时期河北的伪县长，其妻是谭家菜的女儿，而谭是汉奸；还有汉奸伪县长郭良，这两人成了台盟华北支部骨干。而华北台盟支部的人选上，我们都提议由北京大学教授陈文彬担任，谢雪红却拢络林铿生（甚至为 1949 年新政协台湾代表团的候补代

表)。林后来因走私、奸商，加之政治问题被抓起来。林手下台盟华北支部宣传部长陈信德是东京帝大毕业的，日本投降后在美国领事馆工作。解放初期有名的“炮打天安门”案件，各国特务集结到他家中开会。在北京市公安局二楼展览会，迄今还有此大案的要犯名单，写着陈信德原台盟华北支部宣传处长几个大字。

又如林建文，谢安排其担任华北台盟的干事，是日本新民会——汪伪时的“奉公会”秘书长，带日本兵抓人的。柯政和是北京师大的音乐家，日伪时期的“维持会常务理事”，为汉奸，被抓了起来，谢又去设法放出来成为其亲信。谢京生（日本新民会成员），属地方县秘书长以上者，则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黄炬（军统特务）也被谢发展为台盟盟员，其父黄秦禧系伪邮电监察所长，文化大革命中畏罪自杀；又如肖正谊，是伪汪精卫的教育部长，建议创设反共国际大学者，也被谢拉帮；刘振宇是福建省公安厅抓住的特务；李启良原为谢在北京时的司机，特务身份暴露后，谢将他掩护送走，回到福建后被抓住了，镇压反革命时被枪决。

而上海的张添梅是日本“黑龙会”成员，是被认定的；林世昌也是日本特务；林政汉是日本特务，后又是国民党特务的双料。谢就依靠这些坏人来打击李伟光正派人。这三人后来都被判刑，谢即去活动设法将他们保出。

谢雪红之这样做，绝不是协助党落实政策，而是借以拉帮结派，为其个人领袖欲服务，纵容这些人追随其。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政协开会，到了保定，擅离车厢，下站台去买烧鸡，结果火车开了，掉了队。到了北京站，发动一帮人拿着旗子写“谢主席万岁！”被胡立教批评。而在上海，当人们议论：台湾解放后是谁当省主席时，谢即说“他们（指非台湾省籍的老干部）不能当，不了解台湾，要台湾人来当。”言外之意，非她莫属。更狂妄到了目中无党中央，1952年日共领导人志贺义雄来华访问，我从上海调来北京工作，她要我向中央统战部提出要求拜访志贺，汇报旧台共问题，中央未同意。

以上，谢雪红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正常的当然领袖欲”个人野心已膨胀到了登峰造极，即其错误的政治路线；而为实现其个人野心，除了以上所述有其错误的组织路线，更有其拉帮结派的系统理论与“组织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招降纳叛，排斥异己。其典型理论如下：

1、“台湾民族”论或“半民族”论。世上哪有“半民族”之说，真是荒诞透顶！不值得一驳。至于“台湾民族”的提法，已在1948年6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召开台湾主要干部会议上刘晓作了总结：“‘台湾民族’的提法是错误的，决定予以取消。过去提‘台湾民族’是抗日的需要，现在台湾已光复，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台湾只有阶级差异，没有民族差异。”会议有章汉夫、张执一参加。参加者有台湾的蔡孝乾、张志中、张明显、洪幼樵、郭琮（琮秀）、计梅真等；香港谢雪红、杨克煌、苏新、周明；上海有李伟光。

“台湾民族”论站不住了，谢雪红并不就此放弃其独占“台湾领袖”野心，解放初期，台湾解放即可待，为了使其个人野心实现，只有拉派结帮，才能使之于万无一失，于是抛出毫无阶级分析的一系列错误理论。

2、谢雪红抛出“台湾人无汉奸”“无台奸”论，借以拉帮结派，拢络亲信，如前陈炳基所述的日据时期河北省的伪县长杨克培，汉奸伪县长郭良，日据时期“新民会”、汪伪时的“奉公会”会长林建文；林政汉是日本特务，后又是国民党特务，上海的张添梅是日本“黑龙会”成员，是历史反革命，林世昌也是日本特务，柯政和、谢京生均为日本特务机构成员；更有汪伪政府教育部长肖正谊，国民党军统特务黄炬等；解放初期有名的“炮打天安门”案件策划者之一陈信德不是汉奸、台奸，是什么？

谢雪红还沾沾自喜以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为这一帮喽啰鸣冤叫屈说什么：

“台湾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曾经发动过无数的反抗运动；但是，更大多数人为了生活必须与日本人有往来，也必须接受日本的教育。台湾的特殊环境，不能与中国社会相提并论。因此，要以「汉奸」的罪名来指控台湾人，是不能成立的。”（《谢评》606页）

何等之荒诞！首先没有人“要以「汉奸」的罪名来指控台湾人”，而只是指控台湾人中有某些「汉奸」、「台奸」。谢却拢而统之蛊惑民众胡编为“指控台湾人”。何以如此心虚？

我们暂不细说谢雪红以“台湾人无汉奸论”四处拉拢的人、保下来的人是不是汉奸、台奸，就评其这一理论，是何等荒谬。谢的论点之惟一根据就说台湾人受过重重异国统治者之压迫，有反抗之骨气。

论“骨气”，日本民族之“骨气”何止台湾人所能比拟。然而，到了盟军开始发动总攻了，不就出现了不少“日奸”，发情报协助盟军作战者？德国希特勒的党卫军够“铁打”的顽固，不亦有叛逆者？历史上任何敌对两阵营，必有奸细，唯独谢雪红所谓的台湾人，仅有左、中、右之分，无一汉奸、台奸？其用意欲盖弥彰，在于谢雪红唯恐自己的上述三件大是大非之重大原则错误，实质上离“汉奸”、“台奸”之线已不远，加之“二·二八事变”时，将“二·七部队”交托给一个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海军大尉吴振武，吴逃走后，谢随之丢下部队，胆小怕死弃下部队逃离，两天后部队溃散。《谢评》338页有如下记述：

“参加过二七部队的黄金岛与古瑞云（后改名周明），对于谢雪红的离开，都认为是「抛弃他们」。一位领导者未能与同志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必然是受到谴责的。直到三月十六日，二七部队仍然还在埔里坚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搏斗。但是，谢雪红在这之前的两天，就已经与杨克煌离开。在一些为谢雪红说话的记录里，对于这段史实都语焉不详。”

且慢，新近出版的有关谢雪红《电影文学剧本》则语焉有详写道（159页）：

李乔松到作战本部来找谢雪红。

雪红：“乔松兄来了，稀客，稀客。”

乔松：“我们是老朋友了，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

雪红：“说吧，这有什么客气的。”

乔松：“我是来传达党的省工委指示的，省工委要把武装指挥权交给处理委员会。”

遗憾的是作者忘了这时李乔松并未入党。按上海台联会2005年夏出版的《沪上台湾人》一书第2册78页，其子李韶东写道：

同年（1947年——引注）12月，父亲在上海办理了入党手续，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位未入党的人怎么传达台工委蔡孝乾的指令？而一贯抗拒蔡领导的谢雪红，这时却一反常态听从“交军权”的指令？《电影文学剧本》又有如下描写（161页）：

李乔松与谢富来到作战本部。

乔松对雪红说：“要你交军权是蔡孝乾的命令，不服从会犯错误的。”

.....

雪红低声问克煌：“这是蔡孝乾的命令，事变后不来联系，现在却急忙要我交军权，怎么办？”

克煌无奈地说：“服从就服从吧。军令如山，党令如山。”

多么牵强，非党人士来传达省工委的指令都能使谢雪红这自命不凡的“台湾妈妈”、当之“无愧的谢主席”如此顺从，且是“党令如山”！言外之意，她不是抛弃部下头一个逃的。但这一事实是否定不了的。否则，为什么 1951 年在上海台盟的共产党员整风时，人们追问谢时，却未将蔡孝乾指示其退出武装斗争一事搬出来，而连古瑞云都说谢抛弃部队了。

诚然依其文学剧本“形式”，适当作秀何尝不可。但究竟是真名实姓纪事性质的文学作品，且自封为“这次才是真正的彻底平反”的“代行党中央”之名，岂能出尔反尔？想美化谢雪红就捧起“党令如山”以掩盖其“二·二八逃兵”之实，这时发挥其文学作品之功能；想替代其“真正的彻底平反”之政治可行性时，又说成是“代行中央”之文，似乎是历史事实。然而，螃蟹钻洞，屁股却露在外，与李乔松的入党时间不相符。如此实用主义，实为罕见，如何说服得了人？只会是欲盖弥彰，越抹越像是真正的“二·二八逃兵”。

“江浓曾经指出，谢雪红的领导方式是一种「家长作风」又说她「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过浓。在领导台盟期间，「曾经四处打小报告」制造不少「黑材料」。他说，在谢雪红的诬告下，有两位受害最深的，一是吴克泰，一是张连。

“对于被谢雪红打小报告的事，吴克泰说，他与叶经东都被指控是「国民党的暗杀团」。他回忆说，谢雪红在 1950 年时称，曾经截收到军统的遇报，将暗杀中共领导者三十人，名单上有陈毅与谢雪红。他说，谢雪红诬指他是「暗杀团团长」，

并招北京公安局人员来逮捕。后来，组织的人事科长进行了解，认为并没有暗杀团的存在。（《谢评》560~561页）

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谢雪红之“台湾人无汉奸论”是用于其拢络亲信、为其扩大个人势力、搞小宗派所用，绝不是什么“高明的统战政策”。吴克泰、叶经东认为她所推行的错误路线有害于革命，没有投入到她的小集团，她就吝惜地舍弃其“法宝”——“台湾人无汉奸论”，妄图诬陷，将吴、叶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好在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梅益局长站出来拒绝公安局捕人，才免于遭害。

3、排斥异己，招降纳叛就是谢雪红打着“台湾人无汉奸、台奸”抱住“台湾民族”论的要害所在。凡是成为其野心当“领袖”的障碍者，就设法排斥、打击、中伤诬陷，受其害者还有不少，仅再举几个例子。

（1927年底）“谢雪红到了日本，见到了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德田球一、组织部长渡边政之辅以及佐野学、锅山贞亲等日共中央领导人，并与林木顺会了面，认识了东京的几个台湾进步青年。原来，林木顺到了东京之后，找到了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留学时任东京台湾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部长、日共党员、台南人苏新，向他了解台籍留日学生情况，商量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准备向即将成立的台湾共产党输送人才。苏新向林木顺推荐了陈来旺、林添进、何火炎。这样，一共5人成立了东京‘台湾马克思主义小组’，由林木顺同志负责。谢雪红来东京后，林木顺就把这几个同志介绍给了她。之后，谢雪红、林木顺就开始与渡边、佐野学讨论起草台湾共产党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草案。”（摘录自《翁传》149页）

可见苏新加入日本共党组织的时间，严格计算不比谢雪红晚（迄今《半生记》也罢，《谢评》等记载，均无明确说谢是什么时候入日共）而谢所依仗的“日共台湾民族支部”，对于苏新说来是有力的组织依靠，这就成了谢雪红眼中可能构成的竞争对手，于是在香港当“台盟”的筹备工作在中共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不言

而喻苏新将是一个主力成员，“（苏新）到香港不久后，石霜湖就给我介绍了几个人（庄希泉、李自修、施万青、刘雪渔等），我们计划组织「台湾问题研究会」和「香港台湾同乡会」。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这些人常集合漫谈，并开过一次座谈会。（出席者20多人），作为组织同乡会的开端。但后来这些人对组织同乡会问题表现消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觉得很奇怪。后来施万青问我：‘你在二·二八事变后，有没有做过中央社台中分社社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更加感觉得奇怪。后来施万青和石霜湖对我说：‘谢雪红和杨克煌现在也在香港，他们说你是国民党的特务，专门追他们。说他们到上海，你也到上海；他们到香港，你也到香港。这可能有什么误会。’”（《斗魂》72页）

真是草木皆兵，四处扩散，唯恐苏新的影响力扩大。

1928年2月，台共正在筹组，谢雪红唯恐翁泽生的势力过于威胁自己的“当然领袖”地位，就捕风捉影，

“谢雪红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她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王万得可能是特务。”（《翁传》152页）随即，王万得就从筹备会被清除出去。（同上153页）“对读书会遭破坏之事，谢雪红‘很怀疑和王万得有关’。但翁泽生很快从法国领事馆中的朝鲜同志得到的内部消息，消除了对王万得的怀疑。”（同上154页）

于是4月13日台共成立预备会上翁泽生提出：“王万得的问题现在已经查清，不是日本领事馆的特务，应该让他参加。”却遭到谢雪红的亟力反对而未成。

那么，台湾人中有没有“汉奸、台奸、特务”？

有！但绝不是反对谢之错误路线的吴克泰、叶纪东、王万得，而是上述被谢招降纳叛者！

这，不就不再清楚不过啦！其实谢本身倒是已离这一条杆杆不远者，臭味相投！

1、谢雪红在日帝监狱里第一个“转向”是什么脸谱？谢自我辩解说：“都‘转向’了”？可是翁泽生就没有“转向”，至到生命垂危时才给保释，出狱后则身亡（《翁传》）；苏新也没办过“转向”手续，以至关到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重见天日。（《斗魂》）

2、谢佯称：是看了狱方给看的佐野学、锅山贞亲劝党员“转向”借以保存实力，实际上是党中央的指示。其实，台共自创建就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进行活动的，谢之顶头上司是中共中央，通过联络员翁泽生，是惟一的指挥系统，他给谢传达了可以“转向”，借以保存实力啦？这时的“当然领袖”气慨哪里去啦？

3、谢与翁泽生在日帝法庭上“对簿公堂”，谢当庭谩骂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局，将党内矛盾公诸于敌人面前，是什么脸谱？那滔滔三十分钟六千多字“口供”不是投降状是什么？

以上，谢雪红自己不是已在叛徒线上了吗？那么叛徒线上的，不是“台奸”“汉奸”又是什么？至少，已是距之不远啦！

有一位为谢雪红涂脂磨粉的史学者，不惜背离唯物史观，对于中共中央于1986年9月15日举行谢雪红骨灰移放仪式上的平反——《生平》蓄意引评道：

“这段评语可以分成两点来看：第一、就反对外来侵略的史实而言，当然是指她从事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国帝国主义而言。但是，就在她去世之后，北京与日本于一九七二年建交，又与美国于一九七九年关系正常化。在中共宣传文字上，再也没有出现「反帝国主义」的字眼；相反的，中共对日本与美国的依赖，已越来越有不可自拔之势。如果谢雪红反对外来侵略是正确的；那么，中共与日本、美国的拥抱，等于是出卖谢雪红了。同理可证，中共在一九七九年以后，决

定要与国民党谈判，这对于谢雪红而言，已是一种叛徒的行为。如果中共要与国民党谈判，谢雪红与她那一时代的反抗者根本无需迢迢千里跑到北京求助。谢雪红大可留在台湾与国民党谈判，而不必等待北京的迂回谈判。（《谢评》702页）

依此来为谢雪红卸套，其拢络的人就不成其为“台奸”、“汉奸”、“特务”，而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早已走在半世纪前面。

此一时，彼一时也。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其推动发展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评论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与非，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评论历史最起码的原则，不能为了给历史人物树碑立传，就以现行的方针、政策来论是非，为其涂脂抹粉，娇装打扮，到头来，自己惹了一身腥，败坏学者名声。前面所述的被《谢评》画页乱点鸳鸯谱而被冤枉为“李伟光派”的台湾问题研究“学者”，在《鼻祖》一文中，对于这种最起码的史学研究的原则问题却一反常态，避而不驳，倒扬言有待撰文与《谢评》著者辩论等等，不知他想辩什么？

讲到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一战线，翁泽生、李伟光都自始至终，团结一切可靠的同盟军，共同对敌。那是为全台湾人民的利益而着想的，截然不同于谢雪红为了其个人野心幻想当“领袖”、冲着其拢络对象的弱点——历史上各有污点、弱点，急于找到保护伞，于是招揽为亲信，当做筹码借以巩固其地位，根本不成其为统一战线，而是招降纳叛。

李应章为组织“全台湾青年会”，1921年与吴海水、何礼栋、赖石传，需要筹集经费支持而找到了蒋渭水，后向林献堂、董欣、许丙、林雄征劝募。（《先驱者》136页）经蒋渭水的提议，扩大范围，共同筹办了“台湾文化协会”。这个统一战线的范围够大了吧。

台湾史学者林德政在“台湾农民运动的先驱李应章”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他为了开启民智，先在二林成立“农村问题研究会”，继在二林举办“农村讲座”，聘请石锡勋、吴清波、吴石麟、林笃勋到二林演讲。石锡勋讲《农村之进化史》。吴清波讲《农村与产业组合》。吴石麟讲《农民之自觉》。林笃勋讲《农民与卫生》。李应章自己讲《农村之将来》。这个讲座是在1924年12月20日举办的，从演讲题目看，可以知道李应章是把心力用在农民问题上面的。而活动的成功，也可以从参与的民众数目得知，总共有600多人参与听讲。晚上又继续举办文化讲演。讲者有洪明辉、詹奕候、林伯廷、陈宗道等人，至晚间10时才闭会。1925年4月19日，李应章又邀请林献堂、杨肇嘉、叶荣钟、陈虚谷、庄遂性等人到二林举行文化讲演。林献堂讲《初会感辞》。杨肇嘉讲《教育之必要》。叶荣钟讲《农村振兴与产业组合》。陈虚谷讲《人的生活》。庄遂性讲《自由之道》。李应章因关心农民进而领导农民运动，积极为农民争取权益，“二林事件”就是在他主导之下发动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医生而已。（《先驱者》210页）

可见当时，合作者不单有林献堂，更有后来到了上海（解放前）投靠国民党中统局的杨肇嘉，杨翻脸成了破坏筹组“旅沪台湾同乡会”的急先锋，就是谢雪红1947年6月逃到上海避难、置中共中央华东局地下组织的指示于不顾，肆意急于寻找的招降纳叛对象。是李应章真统战，还是谢出于个人野心的假统战，真招降？

至于林献堂，起初李应章敬他为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先辈，拥戴其为“台湾文化协会”总理，请他到二林演讲，动员会员、农民聆听，颇有师徒之礼。然而，涉及到“文协”该不该关心农民利益，支持农民运动问题上开始有了分歧。李应章遭到日帝镇压时，出来营救的是“文协”左翼势力简吉、赵港，通过留日的苏新请到日共律师来义务辩护。林献堂做了什么，而谢雪红又有什么举动？但，李应章之父李木生出殡，李应章还是邀请了林献堂写了挽联，特邀写挽联者还有蔡孝乾，这些

挽联均作为李应章“反骨”的证据，被日帝搜去。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9月5日“台湾伪总督府日敌派来林献堂、辜振甫、许丙、陈炳等四代表前来上海做政治性活动（台湾独立）时，我们（台湾人民解放同盟）特别加以反对，在报上揭露它、打击它。（《先驱者》159页“自传”）

同样的，翁泽生于“1921年寒假，回到台北从高两贵等太平公学同学那里了解了文化协会的宗旨及创办情况，当即与洪朝宗找到在离自己家不远、住在太平町他所认识的医师、文化协会理事蒋渭水，详细阅读了协会章程，并加入了协会。”（《翁传》24页）

成立于1921年的文化协会，经过几年的活动，已在台湾民众中产生积极影响，发展很快，至1926年已有会员数千人。随着队伍的扩大和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成员成份、思想的复杂性也日益呈现出来，于是文化协会内部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导致派别分化，矛盾逐渐集中在文化协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两个问题上，形成三个势力，即以蔡培火、林献堂为代表的受日本国内民主运动的影响，认为文协的任务就是文化启蒙、文化运动，反对插手工农运动，他们是文协中的改良主义派；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受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影响，也认为文协应以文化运动为主，对工农运动持观望态度，他们是文协中的中间势力；以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的受到苏俄革命和祖国大陆革命运动的影响，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大众文化，积极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他们是文协中的左派力量。

1927年1月将召开文协理事会、全会，修改章程、改选理事会，连、王感到岛内力量较弱，写信向翁泽生求援，要求翁联络在沪的台籍学子回台助阵，参加即将召开的文协改组活动。翁泽生汇报了党组织（1925年7月入党），接受指示，“争取改选的领导权，使文协左翼化。”于是组织“台湾无产青年会”号召大家分头发展会员，积极参加文协临时理事会和总会，支持连温卿、王敏川，团结和争取蒋

渭水一派（即中间派）以期达到表决中的优势，对于改选中获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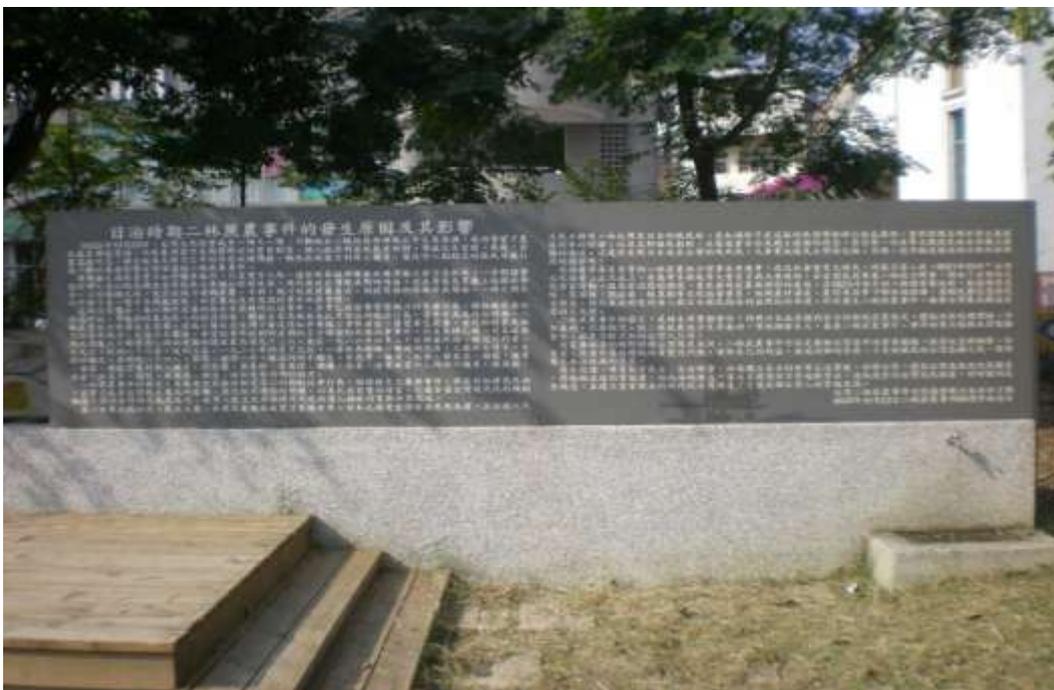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李伟光、翁泽生都先后不约而同地执行了以革命利益为前提的统一战线，而不同于谢雪红出于个人野心，招降纳叛、拉帮结派。那不是统一战线，是地道的宗派活动，风马牛不相及。

总而言之，翁泽生、李伟光与谢雪红的斗争，绝不是宗派斗争，而是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翁、李一切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奋不顾身，积极进取，展开对敌斗争；而谢是“当然领袖”自居、极端个人野心的政治路线，右倾守势；组织上的关门主义、排斥异己，招降纳叛、拉帮结派，以致台湾共产主义运动未闯出一步，未能形成打击敌人的力量，就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错误在于谢雪红，责任完全在于她。

圖片：



圖附-1 李應章在廈門鼓浪嶼開設醫院舊址洪世才攝



圖附-2 二林國民小學文化走廊李應章紀念碑文



圖附-3 1938年8月在漳州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白區秘密工作，曾任中
共城工部廈門市委會常委 洪世才於2010攝於其廈門住宅



圖附-4 影響翁澤生思想至深的廈門區集美中學 洪世才攝



圖附-5 陳炳基夫婦於 2010 年在台中烏日高鐵站留影 洪世才攝



圖附-6 陳炳基夫婦於 2010 在彰化二林鎮二林國民小學歷史走廊李應章碑文前
留影 洪世才攝



圖附-7 簡吉兒子簡明仁和農民組合旗幟（農民組合旗幟在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研究室成立時由簡明仁正式交還農民運動發起地所代表的二林蔗農協會，由筆者代

接收）。 洪世才攝



圖附-8 2010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研究室」在交大成立 洪世才攝



圖附-9 二林國小禮堂前李應章之女李玲虹（中）及（左二）二林蔗農事件蔡淵騰之孫蔡詩傑總幹事和（右二）筆者



圖附-10 謝雪紅彰化老家住宅小西向福德祠



圖附-11 謝雪紅彰化舊居已經變成窄巷 洪世才攝



圖附-12 李應章女兒李玲虹（住北京，年輕時任對台播音員），2011年在二林國小筆者書寫的李應章碑文前留影 洪世才攝